2020年COVID-19評論文章

|  |
| --- |
| 01.『武漢肺炎』裡的諸多管理意涵  02.關於「口罩之亂」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迷思  03.武漢疫情及其所對照之有情生命世界的愛憎情愫  04.擺盪在『去學校化』以及『復歸家庭化』之間的延後開學情事  05.從防疫地點的爆料以反思鄰避效應及其迎臂效應的典範移轉  06.從武漢疫情的跨專業自我以追索「災變照顧」的初步發想  07.關於發放「消費券」與「抵用券」的社會認知基模失調  08.糾結於「國籍選擇」以及「生命政治」背後所投射的社會性謬誤  09.疫情衝擊『志工荒』的志工人力運用思考  10.媽祖遶境活動延辦與否的宗教人文思索  11.從醫事人員出國禁令以擴及到社工師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12.從移工、黑工到防疫破功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13.「武漢肺炎潘朵拉盒子」裡的防疫、減疫、抗疫與止疫……  14.鑑往知來以檢視武漢肺炎的全球化生命共同體意涵  15.從口罩實名制的更迭演變到社區藥局的功能定位  16.武漢肺炎抗疫作戰裡的「最佳利益」意涵  17.疫情大作戰裡之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的權變措施思考  18.新冠狀病毒抗疫作戰裡的團體盲思與社會謬誤  19.擺盪在「人身自由」與「集體安全」的趴趴走和種植大麻思索  20.關於停班與停課之於線上教學因應對策的若干商榷  21.疫情擴散、失業危機及其弱勢勞動人口處境的議題現象觀察  22.從『肺炎病毒』到『社交病毒』的一線之隔－－關於防疫作戰裡的諸多拉扯……  23.從『吃人一口，還人一斗』以思索疫情傳愛的時代蛻變意義  24.關於「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抗疫提前部署思考……  25.關於出入公共場所要求強制配戴口罩的「公共性」思考  26.關於開放國人寄送防疫口罩給海外親人一事的錯置思考  27.豈止於單一「粉紅口罩」了得之多重論述考察……  28.吹皺一池春水的又豈止於『口罩無罪，懷璧其罪』了得……  29.從『有感』的現金入袋到『無感』的酷碰消費折抵  30.敦睦艦隊群聚擴大裡的「彼得原理」反思意義  31.阿中部長超強話術的金句思索  32.口罩購置之亂的實名制論述考察  33.關於急難紓困實施方案之左支右絀及其進退維谷的人文思索  34.迎接一個急難、紓困、急難紓困及其新興貧窮議題的「後COVID-19」時代  35.迎接一個「後COVID-19」時代的諸多重建變革課題  36.從北車嚴禁席地而坐以反思台灣大眾空間的友善、人文與公共性  37.關於發放振興券之於強渡關山的人文思索  38.關於『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的三倍劵另類思考  39.關於從馬偕一線牽到口罩我來捐的傳愛衍情  40.關於「邊境管制－商務人士、境外學生－小明們－反中情結」的政治命題思索  41.來自於『疫情－就業損失－階層惡化』命題意旨的若干發想……  42.新冠死亡的『老、男、病、窮』圖像勾勒和台灣一地的參照意義  43.從「貪嗔癡」與「戒定慧」以檢視「COVID-19」的因果論  44.買口罩和領三倍券背後的『排隊政治』迷思  45.讀您千變也不厭券－－亂象的又何止於三倍券  46.有樣學樣之大內宣的政府撒錢振興措施  47.口罩的購買及其諸多迷亂行徑的社會心理認知叢集  48.關於三倍券有42萬人沒領及其100億未用的延伸性思考  49.關於跨年晚會之於如期照辦、嘎然停辦與延後再辦的多重思考  50.關於COVID-19之「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綜融性討論  51.關於台灣燈會32年以來首度停辦的延伸性思考  52.關於人人自危且自保的封境行徑考察  53.關於『同島一命共悲』的迷思、弔詭……  54.關於部桃事件之於『個案－制度－環境』的考察意涵……  55. 從「防疫保單」的搶購到「防疫素養」的建構  56.關於部桃湧進大批物資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57.從「防火牆」、「保護傘」到「金鐘罩」的抗疫思考  58.關於「武漢肺炎」之於『稱謂政治』的針砭性思考  59.關於延後開學及其啟動防疫照顧假的延伸性思考  60.「注射疫苗，我ok，總統您先請!」 |

【其它綜合篇】（2020.01.31）

01.『武漢肺炎』裡的諸多管理意涵

關鍵字：武漢肺炎、疫情、風險管理

雖說年味已經是逐年淡去，但是，作為一項重要通過性儀式的年節，卻也因為這一場鋪天蓋地的『武漢肺炎』，而讓所被吹皺的又何止是那一池的春水，如此一來，相與衍生的風險管理意涵，就值得深究反思。

誠然，『武漢肺炎』之於『SARS』以及『SARS』之於瘟疫，這早已是人類賡續歷史裡一項難忘的集體記憶，只不過，相對的因應措施、風險分散、傷害停損等等的「認知基模管理」，並沒有隨著時空環境的進展，以提升應該要有的文明境界，連帶而來的是扣緊從不知、錯知到後知的社會集叢認知，多數人依舊是處於某種的『無知之幕』，任憑官能知覺以率行某種的從眾行為，遠地不說，口罩供應的如常、不足、屯積、缺貨到掃購所衍生出來的對峙態勢，這何嘗不是再一次突顯欠缺健康自主管理的反諷之處，畢竟，倘若是確切落實個人應有的自維或自保措施，那麼，使用口罩的尋常備量，早已成為規律作息的一部分，不至於會出現如此般的搶奪景象，至於，出於自危乃甚至自違的戕害行徑或是加惡的風險程度，那麼，不佳的身心狀況及其不優的非理性舉措，這也使得擺盪在健康與不健康之間的「身心管理」，就不僅止於原本是可以期待停損的外溢效果，反而是延伸出來更多難以管控的衝擊影響。

事實上，除了上述「認知基模管理」與「身心健康管理」的失調外，回應於生活世界裡的則是更多的脫序情事，以致於讓知識涵養或文明教育快速地毀於一旦，如此一來，這當中攸關到典型非或典型的『武漢肺炎』，就不再只是侷限在公共醫衛與流行病學的專業處遇，而是已經淪為某種社會調控的失靈現象，比如從治療的『藥方』到民間的『偏方』；從單純病毒株的『肺炎』到彷如是壞人害事之於口誅筆伐的『廢言』；以及從動物傳人的傳播管道到人傳人的擴散模式，進而無限上綱成為人防人、人害人抑或是人殺人的杯弓蛇影效應，如此一來，顯露出來的無非是應該要有的災變重建機制，並沒有因為過往重大的地震、洪水等天災，而強化偏屬於疫情性質的防疫措施或災變管理，畢竟，對照於地震之類的天災，瘟疫的另類人禍，則是因為關涉到是身當其事的當事者以及利害攸關的關係人，以至於各項悲天憫人的善行義舉，就不再是如此單純般的善行義舉。准此，面對無遠弗屆的全球化、地球村與國際人互動，那麼，要如何讓從全家到大家、國家以迄四海一家；從單打獨鬥從跨域整合；從醫護、公衛、交通、民政、警察、司法、勞動、社福、教育或其它；以迄於從戰略的定調到戰術的統合，藉以找出『疫情無國界、天下一家親』的風險管理應變機制，那麼，拋棄本位主義、專橫主觀以及追求您我共好的「斷捨離管理」，是有它的自為反思之處。

總之，『武漢肺炎』裡所隱含諸多的管理意涵，像是「認知基模管理」、「身心健康管理」、「人際關係管理」、「災害應變管理」以至於「全球化風險管理」和「斷捨離管理」，直指出來的乃是『武漢肺炎』絕非是空前絕後的單一特例，而是更多的『武漢肺炎們』，蠢蠢欲動以吞噬於人類無知、怯弱的心靈結構。

【其它綜合篇】（2020.02.07）

02.關於「口罩之亂」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迷思

關鍵字：武漢肺炎、口罩之亂、灰犀牛效應

一場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及其所誘發出來的「口罩之亂」，背後所糾結關於加減乘除的四則運算迷思，是有它足堪玩味之處。

首先，是關於加法與減法的對應運算，因應於武漢疫情可能的全面爆發，而採行戴上口罩的健康自主管理方式，本來就是一項初級預防的應有作為，也就是說，透過口罩的供輸和正確使用，藉以達到有效停損的防制作用，這理當有它決戰千里之外的戰術運用，只不過，除了欠缺運籌帷幄的戰略思維外，也逕自在第一時間裡過度突顯兩岸口罩政治學的意識形態，導致成為加速引爆「口罩之亂」的臨門一腳。誠然，恰逢連續假期的武漢疫情，年節期間的口罩供應數量，本來就是頗為吃緊和不足，因此，亡羊補牢的停損對策，乃是如何在第一時間內針對口罩市場的供需平準，以提出相關衝擊效應的停損措施，而非是採行限制輸出對岸但卻又無法完全自保的對峙方式，如此一來，不斷被特意挑起的敵對情緒，更使得供需失調的預期心理及其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心理集叢，終究是讓「口罩之亂」成為兼具綜融意義的一項整體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

連帶地，諸多假性需求或非理性的搶購囤積行徑，這又何嘗不是某種『怨嘸不怨有、多少加減買』的社會荒謬投射。准此，在這裡的針砭之處，斷然不在於訴諸於口罩之數量、價格、限額、等級、規格、上架、供貨等等的官方話術，而是一旦市民社會出現買不著、搶不到抑或是售價過高等等的預期心理落差，那麼，加總而來的人身怨懟，將會招致更多正當性不足的社會信心危機。

其次，是關於乘法與除法的對應運算，誠然，疫情性質的風險事故，本來就具備普遍性、未來性、不確定性、機率性以及損害性等等的屬性特質，連帶地，侷限於疫情資訊不正確、不及時、不完整、不充分和不對稱的結構性限制，更是讓武漢肺炎所可能對於生命和身體的人身傷害，產生更多不安、恐懼的認知心理，就此而言，標舉『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灰犀牛效應，自當是要有從疫情控管的「疾管」、口罩配送的「經濟」、學生權益的「教育」、國家考試的「考選」、防疫照顧的「勞動」、航班載具的「交通」、疫情發布的「通訊傳播」、囤積發財的「警政」、謠言四起的「司法」、撤僑台商的「陸委會」、世衛組織的「外交」、災難心理衛生的「衛福」抑或是消災祈願的「文化」等等跨部會的任務編制小組，換言之，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的防疫機制設計實屬必要，進而要有分類分級且分階分段的專業分工和目標管理，藉以避免出現擠牙膏、頭痛醫頭或是急於想要立馬解決的『打地鼠』作為。

冀此，倘若武漢肺炎係有它冰凍三尺的滾動效應，那麼，針對該項蘊含極大殺傷力的武漢肺炎，現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統整效能和防疫效益，更要有防範灰犀牛效應的通盤考量。最後，附帶一提的是，觀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召開的記者會，固然是配搭現場手語的同步翻譯，但是，電視台所傳送出來的取鏡畫面，要不是半遮半掩，便是直接跳過不見，建議應該要強制規定全畫面或分格畫面，藉以保障聽損者閱聽的基本權益。

【其它綜合篇】（2020.02.07）

03.武漢疫情及其所對照之有情生命世界的愛憎情愫

關鍵字：武漢肺炎、毛家人、動物權

一則關於歲末寒冬裡建議要給家中的寵物進行必要的禦寒措施藉以避冬的花絮報導，相較於近日以來武漢肺炎背後所可能糾結的動物疫情，此一兩廂對照的愛憎情愫，這使得從動物疫情到毛家人相處，是有它揆諸於有情生命之延伸性思考的必要。

話說，跳脫有待進一步釐清的冠狀病毒株，對於武漢肺炎此一人人驚恐且自危的超級疫情，這當中所可能涉及到魚鮮、野禽之類的進食，多少提供了一個對於「動物」全面性關照的切入角度，誠然，隨其人類歷史的文明進化，從動物疫情到毛小孩的角色定位與功能運作，是有它包括從犬、貓到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從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到寵愛動物及其他動物；從戰爭、展演、觀賞、檢疫、緝毒、搜救、輔具到療育；從野生到家畜犬或專門繁殖；以迄於從工具性到情感性等等的變異演進軌跡，特別是扣緊當今作為扶老攜幼重要憑藉之一的寵物陪伴，更是讓「動物」已然是從不同的類屬，逕自提升到類家人位階的毛小孩，如此一來，回應於從毛小孩到毛老頭的生命歷程，那麼，以「毛家人」為主體的市場商機，像是基本需求、衍生性需求、風險事故保險的諸多供給輸送，特別是寵物食品、美容保養、臨托喘息、長期照顧、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寵物保險，就彷如另類超高齡社會裡的生活場景般，需要加以正視背後的結構性意涵。

基本上，早於1998年便制定施行所謂的＜動物保護法＞，同時也歷經多次的增修工程，藉此完備對於保護動物所應該要有的文明對待，只是，該項的動物權內涵，還是有其從彈性措施到強制規定、從消極止惡到全面關懷、從基本訴求到積極性差別待遇等等不同的分殊內涵，如此一來，從注射疫苗、植入晶片、生育結紮、寵物繁殖、捕捉宰殺到棄養虐待抑或是安寧終老，似乎也說明了關乎到落實保障動物權一事的操作性定義，是有它亟待拓展的奮進空間。

遠地不說，僅以上述寒冬來幫寵物添加衣物或禦寒措施一事為例，這當中所要表述的意義乃是如何換位思考並以人道方式來對待周遭的動物夥伴，至於，保暖衣物的增加，背後所涉及到不同犬隻、品種、耐寒、飼養的連續性關係，更是指陳出來保暖禦寒的該項舉措，已然是針對有情生命賦予同理關心所必要的相濡對待，如此一來，從基本需求的滿足到風險事故的停損，『毛－孩小－毛小孩－毛老頭』的演進發展，其所要被顛覆的又何止是照顧型態的調整，而是動物認知基模的翻轉、解構和重塑，連帶而來的是少子女化之於「毛小孩」的保育呵護以及高齡化之於「毛老頭」的長照守護，也就不應該僅止於人類社會運作模式的復刻重製，而是藉此去思索動物權之於人權，在其本性、性質或體質上的分殊和合；最後，人類本身所履行之社會責任與第三人生的自為期許，這使得對於扮演輔助療育關鍵角色的犬隻動物，更須進一步爬梳這當中所隱含相與互動的主體意義，特別是從『權控關係』到『犬控關係』所糾結的互動意義。

總之，一場可能因為進食動物帶來的疫情浩劫，也會因為激情過後，而再度賦予動物陪伴的重要角色扮演，這多少也點明出來逕自於以人類至上的我執主義，那麼，相迎於花草世界或有情動物天地的人類無知之幕，悲慘故事的又豈止是來自於疫情的人類自為戕害。

【其它綜合篇】（2020.02.07）

04.擺盪在『去學校化』以及『復歸家庭化』之間的延後開學情事

關鍵字：疫情、防疫照顧假、復歸家庭化

因應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不斷擴散，教育部斷然採取包括暫停寒輔、延後開學以及縮短暑假的權變措施，這也使得相與衍生出來的衝擊影響，便有它進行通盤檢討的必要。

事實上，這項的權宜作法除了高中職以下的學校，將延後至2月25日才正式開學外，也鼓勵家長們去請所謂的「防疫照顧假」，藉此避免逕自送往安親班所可能造成的群聚感染現象，只不過，倘若未能有其整體的戰略布局和戰術運用，那麼，覬覦該項在家性質的防疫手段，恐將喪失原本的期待美意；連帶地，如果還是出現一改再延期開學的突兀景象，除了更加突顯手足無措的制度運作失靈外，也會營生更多的擾人民怨，這是因為：

首先，基本的提問在於是否將開學的上課日延後到二月底，這對於疫情掌控的目標管理，是否就可以迎刃而解？抑或是在疫情擴散的惡化情況尚未明朗之際，延後開學的應變措施，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及其問題有所紓困的同時，又會衍生出來那些預期與非預期性的發展後果？無疑地，從這個角度切入，暫停寒輔、延後開學以及縮短暑假的權宜作法，宜有它另案規劃的配套思考，特別是落實在工具範疇的技術性操作，那麼，若干商榷的議論之處，還是要有設置停損的防範之道。

比如：以高中職以下的學校為其延後開學的標地對象，就其回應於生活世界的如常運作，那麼，糾結於從學齡前到學童期；從居家保母到機構托育；從托嬰中心到幼兒園；從小學到安親班；從中學到補習班；從國高中到大學以至於從學制學生到推廣教育的不同受教組成，就不應該只是侷限在正規、體制以及常態性質的受教人口族群身上，而是要進一步擴及到保育、幼教、大專以及終身學習的受教人口，理應都要有一視同仁的防護措施，以此觀之，倘若延後開學的『去機構化』，是一項既定的政策方向，那麼，長者在地老化的日照、托老等機構屬性的照顧方式，依舊還是存在某種的風險機率，而需要加以正視因應。

准此，全面性的延後開學，當只是將原本可以掌控的透明化管理，逕自淪為某種四處流竄的失控脫序情境，也就是說，正本清源之道，理當是要導入以年齡別、身心狀況別為先的健康風險管理策略，畢竟，從不同場所到同樣的疫情風險以迄於從中度危險到高度危險的老幼族群，點明出來該項『去學校化』的因應對策，是要有從可行性到不妥當性的併同思考。

其次，扣緊「人」（從特定學生族群到一般社會大眾）、「事」（從檢疫到防疫）、「時」（因應於疫情演變的確切開學日期）、「地」（從去學校化到四處流竄）以及「物」（從口罩、酒精到其它的搶購行徑），那麼，該項率然延後開學的『復歸家庭化』舉措，相與牽動的利害相關人，也就不僅止於各級學校及其學生族群的當事者，而是當前以雙薪家庭為主的勞動型態，究竟有無能力、能量和能耐，去撐托起至少二周的照顧空窗期？

以此觀之，在這裡就不單單只是訴諸於鼓勵父母親去請防疫照顧假以及依舊保留全勤的職工福利，而是擺盪在從公領域到私領域；從個人成本到外部代價；從企業成本到社會成本；從事假到公假或病假；從不給薪到給薪；從部分給薪到支付全薪以及從交易成本到機會成本之間的父母雙親請假與否，何以此一理性選擇行為，已然變質成為照顧責任之私領域化、家戶化、父母親職化以及風險自保化的『去公共化』行徑？

總之，鋸箭療傷的打地鼠作法，這使得上述的延後開學政策，比較側重於教育本位的自為思維，畢竟，孩子的開學上課與否，所牽動的乃是一個家庭如何得以正常如序的生活運作，連帶地，「防疫照顧假」的申請，更不在於需要與否以及有無勇氣，而是要回歸到制度性保障的相關提問，以此觀之，延後開學的『去機構化』，除了有『復歸家庭化』之虞外，安親班之類的替代方案及其『再機構化』的運作風險，也不亞於如常開學的成本代價，這其中更有因應疫情延後開學的風險規避化，到衍生需求要如何確切滿足的國家機器該有作為？

冀此，攸關到公共事務，更是需要三思而後行的決策管理機制。

【其它綜合篇】（2020.02.07）

05.從防疫地點的爆料以反思鄰避效應及其迎臂效應的典範移轉

關鍵字：鄰避效應、文化大學、迎臂效應

報載台北市長主動爆料滯留於大陸武漢的台灣人，一旦順利回到台灣的話，部分的返國民眾將會被安置在陽明山的台銀宿舍，藉此進行必要的隔離管制，消息一經傳開，卻也引來文化大學的學生會表達強烈的關切，只是，該項舉措背後所糾結的社會心理認知集叢，亦有它加以廓清與確認的必要。

誠然，就其文化大學學生會所發表的聲明內容來看，多少也可以窺見到若干有待釐清的觀念溝通，誠然，一方面由於文化與台銀宿舍過於鄰近，再加上文大招收的陸生頗多，因此，倘若是將隔離的場所設置在只有一線之隔的文大對街，這恐將會引發文大師生的緊張恐慌，如此一來，自然是不利於防疫工作的順利進行，只是，上述本位主義出發的我執想法，就其法理情的綜融角度而言，還是有它進一步議論之處，畢竟，倘若該項安置地點有其理性客觀的綜合考量，那麼，依法行政的舉措辦理，文大校方抑或是附近的居民，是沒有加以拒絕的權利，僅剩下的只有社區排除和集體抵制的情感訴求，因此，回到就事論事的以直說理，那麼，挑中台銀宿舍作為安置場所的標準為何，特別是從事前的需求到隔離過程以及安置之後，相與關聯的效益評估機制有無建置完備？

連帶地，該項從文大到市府的「當事者」，進而擴充至被隔離的民眾或就讀文大的陸生以及周遭的居民等所謂的「利害關係人」，基本的思辨之處還是在於：倘若安置係屬必要的話，那麼，以有效隔離為其目標管理的策略運用，癥結點就不在於安置地點的本身，而是該項隔離處所資訊的正確、完整、及時、透明、充分，是否有達到對稱與否的基本提問，連帶而來的是該項有效管理的策進作為，更是超脫場所設置地點的檢視重點所在，至於，出自於恐慌或汙名化的集叢心理或者從眾行為，相當程度上乃是所謂『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Effect，簡稱為NIMBY Effect）的直接發酵，誠然，安置場所以及隔離民眾，只因為對於冠狀病毒的無名恐懼，而被視為另類的嫌惡設施，以此觀之，藉由安置隔離的必要之惡，以為廣大的民眾降低損害，此一權衡輕重的比例原則，直指的還是某種公民德行的文明素養。准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乃是要如何藉由文大或周圍居民的抗議舉措，以反思某種理性對話的言談情境，是否有被建構甚至於進行某種社區融合、典範建構的可能？

總之，不同於核電廠、焚化爐、監獄、掩埋場等等常態性的嫌惡設施，對於此一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作為知識傳授的大學殿堂以及世代接班的莘莘學子，要如何藉由公民責任、風險認知、決策模式、管理措施等建置機制，以讓『鄰避情結』的問題糾葛，得以轉型成為『迎臂效應』（Yes In My Backyard Effect，簡稱 YIMBY Effect）」的正面影響，無疑地，從「換位思考」、「相對同理」、「資訊透明」、「有效管理」到「成熟公民」的文明指標，這將會是激情過後的自為反思課題。

最後，「人－文－地－產－景」所構築出來陽明山的獨特性，這使得夏秋之際的狂風、豪雨所帶來的風險事故，相關聯的人身戕害，更是不亞於這一次的肺炎疫情，如此一來，劍及履及的策進作為，文大校方理當是要有不同於台北市政府對於停課、停班的運作標準，至少，這種的改變訴求，對於文大師生來說，是多了些的實惠與受益。

【其它綜合篇】（2020.02.07）

06.從武漢疫情的跨專業自我以追索「災變照顧」的初步發想

關鍵字：武漢肺炎、生命政治、災變照顧

一場冠狀病毒株所造成的全球性危害，除了提供關於疾病治療、流行病醫、預防科學等專業侷限的因應挑戰外，也讓長久以來關於「災變照顧」的典範建構，是有它進行解構與新構的另類發想。

基本上，因應於當代天災、人禍所產生的各項風險事故，這使得瞬間、大量以及集體的災變事件，一舉顛覆了過往慣常的救災動員模式，這其中也包括助人服務的社會工作，如何讓專業自我的增進能夠與時俱變，甚至於產生必要性的典範移轉，畢竟，隨著文明化的進展，人群服務和社會工作的概念內涵已然是產生極大的改變，遠地不說，過往著重於個案本位、個案工作以及個案處遇的介入路徑，如何得以因應變遷社會底下「人－事－時－地－物」以及「人－文－地－產－景」的分殊差異，以進行必要的結構性調控；連帶地，從問題解決到任務中心的殘補干預型態，「社工」又要如何因應風險事件對於生命以及身體範疇所帶來的可能戕害，藉此展現應該要有的專業性突破，如此一來，正當人類世界的家庭組成、勞動型態、所得維持、經濟安全、社會資本以及全球化擴散產生巨大的轉變，以至於讓人群服務的相關知能出現專業困境，進而突顯「災變照顧」的多重性弔詭。

事實上，僅以這一波的武漢肺炎疫情為例，此一有其普遍性、不可預測性、無法確定性以及攸關到性命交關的風險事故，自然是在其疫情現象從醞釀、發微、爆發、擴散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演進過程，就無法如同過去遠地或他方所發的洪水、地震、樓崩、塵爆般，得以迅速產生同體大悲的社會集氣力量，相反地，就其可能的擴散模式、危及程度和影響範圍，反而是形成某種杯弓蛇影且人人自危的社會排除效應，如此一來，謹就疫情性質的災變社工，其所攸關到角色定位、功能運作、危機處理、社區培力、觀念充權、災區重建，已經是和過往的社工服恃，有其天差地別的對比映照，畢竟，扣緊狂風、豪雨、土石流而來的複合性災變，比較像是財產損失、燃眉之急、物資湧入，相形之下的瘟疫災情，則是糾結某種生命關卡、大規模傳染、物資搶購和難以設置停損點的風險辨識模糊情境。

總之，值此武漢疫情尚未告一段落，除了是讓社工角色的功能發揮，還是有所限制外，一旦必須要去面臨到從個人到團體的社區群聚感染；從染疾、亡故到病癒、重建；從人身標籤到社會烙印；從邁向死亡之旅到尋求身心復原；從避免感染疫病到災變停損，那麼，訴諸於檢疫或防疫事務裡的跨域整合團隊，社工又要如何從專業分工抑或是跨域界線裡，以找到屬於社工特有的專業角色，對此，思考『災變照顧』典範建構的必要性，特別是涵蓋生理、心理、社會、文化以及靈性等等整全多層和分頭並進的因應對策，換言之，除了醫療、公衛、衛福、經濟、教育、勞動、交通、警政、司法這些比較是硬性的災變控制手段外，心理、諮商、輔導、社工、文化、宗教等偏向軟性的安頓力量，也是要有隨後跟進的策略性規劃。

最後，從「災變照顧」的關懷旨趣出發，那麼，終究是會暫告一段落的武漢肺炎疫情，伴隨而來的分配正義、正當程序、生命政治、身體倫理、生物資本、健康免疫、人道救援、利他行為、專業實踐、生活復原、重建機制、災難應變、典\*範移轉，是有它加以重新檢視的必要，這其中也直指從傳統的社工專業自我以進化到發展性社會工作，要如何在諸多的專業領域及其界限維護範疇裡另闢蹊徑。

【其它綜合篇】（2020.02.29）

07.關於發放「消費券」與「抵用券」的社會認知基模失調

關鍵字：抗疫、抵用券、消費券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對於國內產業所造成的重大衝擊，行政院會通過經濟內需型產業、農業、交通相關產業的紓困、輔導、復甦與振興方案，特別是將會等待疫情結束後，透過政府所提供的振興抵用券措施，以刺激國內市場消費。

基本上，2020年的「抵用券」和2009年的「消費券」，兩者之間倒頗有幾分神似之處，上一次發放消費券是在2009年，當時係為了因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所產生的消費緊縮效應，馬政府決定發行每人3,600元消費專用券，並且透過特別預算共舉債新台幣858億元，不過，效益分析的專業研究卻也指出「消費券」的發行和使用，並沒有達到推動百工百業所該有的乘數效果。准此，先不去論斷各自時空條件的殊異環境，但是，難的是這項是從台灣經驗出發，並且有其縱貫發展的軌跡探索及其可能演進結果的近距離觀察，因此，最終的效益評估似乎也有朝不證自明的方向發展。

遠地不說，即使「抵用券」和「消費券」有其和本質、性質的分殊差異，但卻是忘記了過去曾經使用的那一方，依舊還是停留在不花白不花之當初「消費券」時期的認知基模，以此觀之，這一次發放「抵用券」的官方說貼，也不就能只是侷限於單純之『紓困』問題解決或『振興』任務中心的狹隘思維，更是要進一步地擴及到認知行為的概念範疇，以進行包括價值澄清、態度重整及其觀念模塑的配套作為。

畢竟，未能同步對一般民眾進行觀念充權的機會教育，那麼，從白吃午餐到道德危險、從眾行為、社會心理集叢等等所充斥弱化的心靈結構，所謂的「抵用券」抵掉的終究只是限縮於民眾逕自消費之於折抵現金的『個體節賸範疇』，而非是藉由差額消費、組合消費、連續消費、大量消費和樂於消費，藉以帶動紓困與振興的多重作用及其要被建構的『社會連帶範疇』，換言之，就在等待這一波冠狀病毒的灰飛煙滅之際，政府機關也要記取口罩之亂的歸因事由、應對手法和配套措施，畢竟，任何的官方說貼或文宣包裝，是要有站在民眾、廠商以及店家換位思考的必要，如此一來，扣緊發放振興抵用券一事，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事？可以紓困或振興到什麼程度？以及是否也會衍生出來那些衝擊影響？連帶地，『紓困』以及『振興』此一對的重大事件，又要如何嫁接在妥適的手段方法、合宜的切入時機、謹慎的財政風險及其避免因為發放規定的資訊不正確、不完整、不對稱所招致的社會怨懟效應。

總之，欣見念茲在茲的政府，願意嚴肅思索該項武漢起疫的善後難題，誠然，

無論是『用兵一時』抑或是『決戰千里』，『謀定而後動』方屬上策，不需要為逞一時的口舌之快而流為枝微、片斷、討好、口實、話術的民粹統治，特別是這一次「抵用券」的發放對象如果還是如同過往般的全體公民，那麼，對於這群集體記憶猶新的「消費券們」，政府就不僅止於單純發放該項獲得免費好康的「抵用券們」，而是「消費券」以及「抵用券」背後所實有的社會認知基模失調，要如何被有效導引，藉此找出破解人性市場之於消費市場、經濟市場、內需市場、實體市場抑或是平台市場之間的供需失衡機轉。

最後，也因為民眾對於「抵用券」的使用，並不盡然是停留在諸如紓困、復甦與振興之類的道德說詞，相反地，被突顯的乃是公民資格的福利待遇，這也使得該項「抵用券」的規劃作業，尤須審慎作為，畢竟，『怨嘸不怨有，加減再加碼』的社會認知基模依舊是「消費券」或「抵用券」的固守底線，更何況這一次不再是天外飛來一筆的「消費券」，而是消費者自付現金折扣的「抵用券」，因此，社會大眾更會用放大鏡來檢視政府的相關策進作為。

【其它綜合篇】（2020.02.29）

08.糾結於「國籍選擇」以及「生命政治」背後所投射的社會性謬誤

關鍵字：陸配子女、兒童權利公約、生命政治

報載武漢肺炎（COVID-19，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蔓延全球，陸委會先前宣布有條件的開放陸配子女入境，卻也引起反彈的聲浪，對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即撤回該項的措施決定，乃至於身兼衛福部長和指揮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部長，說出一番當初選擇的國籍就要自己承擔的話語，同時也受到網友的齊聲讚爆，無疑地，面對此一刻痕逐漸模糊不清的社會一把尺，這將會是檢視『國籍選擇自己擔』口語風波的針砭所在。

基本上，對於該項有條件開放陸配子女入境的考察重點，理當是要針對所謂『有條件』的操作性定義，去深究是否適法、合理和符合正義，而不是以『有條件開放』，來作為兩岸爾虞我詐的疫情對戰籌碼，誠然，倘若是基於檢疫的必要作為，那麼，在此一非常時期的該項權變措施，應該也是要一視同仁於從陸配到台商抑或是不同國籍別家庭的任何子女，否則，在子女隨其母親一同入境來台一事，理應是不能夾帶任何人為、特定以及有所意圖的權力交換，這是因為：扣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為CRC）而來之禁止歧視、兒童最佳利益、生存及發展權、尊重兒童意見的四大普遍性原則，那麼，如此粗暴的逕自阻止陸配子女入境，又要如何面對所標舉『不與父母分離權利』、『不應喪失家庭環境』的基本運作原則？

如此一來，從『國籍選擇自己擔』率性談話所呈現圖窮匕見的意涵，顯露出來：這些年來，政府總是汲汲營營為了宣示台灣主權與國際接軌，而努力將兩公約、CRPD、CEDAW以及CRC等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但是，萬萬沒有料想到會出現今日的這一場全球化疫情，以至於當下做了自相矛盾的不得體發言，如此一來，小則顯得不够大器，大則是將這些年下來為了與CRC接軌的相關努力毀於一旦，導致失去所應該要有的國格尊嚴，事實上，事情往往是發展到最後，真相或本意才被迫顯露出來，這固然是令人扼腕，但是，鄉民網友的一片叫好讚爆，又是透發出來社會變遷的那些時代意涵？

平心而論，對於投胎選擇要去當誰的小孩，孩子是處於完全的被動狀況，反觀，成人世界的喜怒哀樂，卻經常會翻轉並且成為無辜子女的悲歡離合，特別是此一「成人」已經是從自然人的「一般大人」，乃甚至於變身成為某種霸權和霸凌機制設計的「國家機器」，如此一來，在這裡的驚悚之處就不在於一般大人對其自己子女的人身戕害，而是糾結於「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命題旨趣，導致任何年齡層的生命、生存或死亡，必須要權控於國家機器的特定目的或遂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如此一來，才會出現從當紅抗疫英雄嘴中所脫口而出的『國籍選擇自己擔』的反諷與不堪，特別是身兼衛生福利部長的管轄業務，又要如何面對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的精神原則。

人權，終究是抵擋不過權力的糾結拉扯，任何人，也都是政治神台上的祭品，此一赤裸裸的生命政治交易，陸配子女的最佳利益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特別是一遍喝采所投射出來的諸多社會性謬誤。

【其它綜合篇】（2020.02.29）

09.疫情衝擊『志工荒』的志工人力運用思考

關鍵字：志工、運用單位、志工管理

報導指出：隨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升溫，不只是學校開學、國家考試被迫要延期，一般民眾參與公益活動的意願也大幅降低，導致不少的社福團體大鬧志工荒，原訂的義賣、體驗活動更是被迫要取消，除此之外，還有社福機構缺配給第一線人員的額溫槍等防疫物資，造成對於社福行政作業的運作牽絆。

基本上，疫情所造成的衝擊影響，已經是鋪天蓋地於包括社福團體在內的百工百業，因此，在人力、物資抑或是金流等等公共資源皆是有限的前提底下，如何進行最適性的資源配置，這會是用以檢視從營利企業到非營利組織的針砭之道，就此而言，上述的志工荒或防疫物資不足等實務運用的諸多難題，便有它進行結構性深究的必要，而非只是單純搭著疫情加溫的順風車，以逕自某種組織能見度的議題行銷，這是因為：

首先，關乎到志工荒的議題思辨，姑且不去細分不同屬性、場域和性質的志工及其志願服務，但是，在這裡需要先行加以廓清的乃是，究竟志工的定位係屬於不可或缺的常態性，還是機動使用的補充性？如果係屬於前者的話，就其天災與人禍等危機處理的應變對策，社福團體內部早有一套備案的因應措施，畢竟，對於志工人力運用的不充足、不穩定及其服務品質性，一直都是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的一項重要蛻變課題，以此觀之，即便是醫療院所出現志工的人力短缺情形，比較可行的權宜作法，還是要以退休醫護員工的志工為主，藉此設置可能戕害的停損點。

再則，倘若志工的人力運作是偏向於大型活動的現場支援性質，那麼，這裡要加以檢討的反而這些以戶外環境或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值此一疫情的風險辨識未清之際，這些活動辦理的必要性為何？連帶地，假設是因應於＜公開採購法＞的委外經營，那麼，這些依法辦理的既定項目，更是有它彈性伸縮的應變之道，更何況這些公私協力的方案執行主力，終究還是要回歸到社工自身的專業自我。

准此，社福單位因為肺炎疫情的所導致『志工荒』的道德訴求，相當程度上，是一項有待商榷的議題現象，畢竟，正處於人人自危的疫情管控之際，缺工的又豈止是社福單位的志願人力，其它百工百業的衝擊影響，更是不在話下，如此一來，順勢而來的權變措施，倒是可以透過目前活動辦理或方案執行的空窗期，藉此重新盤點運用單位啟動志工以推動人群服務，所必須要面對的各項外部性，畢竟，長久以來，漠視志工運用及其績效管理的各項『可為』與『不可為』；『可行』與『不可行』以及『預期性』與『非預期性』，致使志工的適任性議題，經常是機構尾大不掉的運作難題。

最後，訴諸於社福機構缺配給第一線人員的額溫槍等防疫物資，導致某種的運作失靈情事，實則有其釐清之處，誠然，穩健運作或依約而行的社福機構，對於包括額溫槍、口罩、手套與酒精等防疫物資，早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的操作準則，因此，在安全備用量的前提底下，防疫物資的可能不足，就比較是偏向於中長期的應變措施，如此一來，癥結點就不在於對外的物資募集，而是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迄於從母機構到分支單位，究竟有無一套物資管理的機制設計，否則，任憑本事的資源勸募行徑，無非是再一次坐實了當前台灣一地非營利組織所不樂於見到之大者恆大和小者越小的「馬太效應」現象。

【其它綜合篇】（2020.02.29）

10.媽祖遶境活動延辦與否的宗教人文思索

關鍵字：大甲媽、繞境、宗教

一年一度大甲鎮瀾宮的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將於3月19日起駕，不過，今年（2020年）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擴散，致使外界出現要求暫停舉辦遶境活動的輿論聲音，對此，鎮瀾宮的主事者表示還是會如期的舉辦，但是，也會從善如流取消起駕宴等宗教儀式，至於，倘若中央政府嚴禁辦理的話，宮廟則是會全力配合。

誠然，該起偏屬於神聖領域的宗教活動，因為是涉及到超越理性及其超克宗教的『無知之幕』，這使得能否果斷嘎然喊停或是由政府介入禁制停辦，相關的考量因素及其決策模式，就絕非是一般性質的群眾活動，便可以加以定奪或有所裁決的；連帶地，在這裡的論述真義也不僅止於針對大甲媽遶境活動的特定事件，而是要如何從單一的大甲媽到其它的馬祖信仰抑或是不同神祇的宗教活動；從宗教性到非宗教範疇的事務活動；從寺廟到其它的公共場所；從室內集會到戶外活動；從常態性到非固定性的活動辦理；從非參加不可到有所選擇；從萬人空巷到中小型規模的聚眾活動；以迄於從自為保護措施到他為約制管理機制等，換言之，無論是大甲媽的廟方或是國家機器的政府端，對於如期或延後辦理的思維準則，就不應該只是陷入於二擇一的對峙思考，而是要回到廟方對於信眾以及政府對於公民，就其疫情風險辨識與防疫風險管理的溝通機制，是否建置完備和有效運作？

事實上，「大甲媽」已然是當前華人世界從祭祀圈以延展到信仰圈的一項重要文化集叢活動或是宗教嘉年華會，只是，這部分比較是隸屬於風土民情之類的「民俗」或「民德」，因此，倘若是直接援引來自於相關法令的依法禁制或防治作為，自然是會衝擊到常民生活文化底蘊的社會認知基模，就此而言，在遶境活動尚未正式啟動之際，如何在認知行為的介面上進行觀念充權的積極機會教育，抑或是針對信仰的心靈結構以思索親自參與宗教活動的全人關懷意義；連帶地，從可行性的前置作業到不可行的對應備案，更是需要兩軌並行於所應該要有的通盤性考量，這是因為：倘若，疫情減緩或是獲得控制，那麼，即使遶境活動可以如期的辦理，能否藉此確切落實簡化相關的宗教行止，從而達到群聚感染或擴散的停損設置，如此一來，武漢肺炎當可被視為某種轉化機制的轉轍器作用，以讓宗教信仰得以回歸到當事者自身的主體意義上。

冀此，從民俗民德的觀點來看，對宗教信仰的自由權行使，自然是要謙卑與敬畏，但是，對於一個法治國家而言，國家機器的專業行政作為與必要裁決，這也應該是要讓一般民眾得以有所期盼和安全保障，弔詭的是，就連最為普及的「搏杯」，在此時此刻，似乎也沒有人敢去承擔停辦與否的宗教責任，這也使得公民社會的子民信眾及其自己心中的一把尺，需要的是更多的精進作為。

總之，「宗教」不會消失在人類社會的生活世界裡，充其量只是藉由不同的形貌內涵或神聖活動，藉以展現「宗教」本身的深邃、複雜和不可知性；連帶地，「宗教」要如何與時俱變於社會變遷的具實需求，藉此進行制度調整和功能調適，那麼，作為每年一項如常通過性儀式的大甲媽遶境活動，顯現於外的將會是對於不同信眾各自宗教救贖的終極關懷和實踐手段，至於，內蘊於內的則是如何借力使力於發揮宗教的隱性功能，藉以達到創造性轉化的積極作用，換言之，從勸人為善的道德指稱到身體保健的自主管理，包括媽祖在內的宗教性轉化和機會教育，這或許可以成為大甲媽遶境活動的檢視考察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2.29）

11.從醫事人員出國禁令以擴及到社工師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出國禁令、醫事人員、醫務社工

報載針對新冠肺炎期間醫事人員的出國禁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日昨召集醫事人員團體與工會團體開會，而最新的規定也同時出爐，這其中適用的對象除了醫事人員外，另新增社工人員，除此之外，紓困條例的相關補償，也不再是侷限於第一二三級的限制地區，只要是因為配合防疫而取消出國者，所導致的損失都能予以補助或補償。

基本上，該項事前防制性質的禁令作為，主要是著眼於當前的疫情風險未明，甚至於一旦出現全面性爆發的話，一線的醫事人員要如何在人力資源妥適配置的前提底下，進行停損設置的安全管控，就此而言，該項係屬非常期間的必要之惡，無論是從戰略到戰術的範疇運用，都有它進一步深究之處，這是因為：首先，該項禁令所鎖定的標地對象，還是以醫院端的醫事人員為主，至於，因為同屬於醫療生態的勞動職場環境，這也讓醫務社工員或醫務社工師（「醫務社工」）要被含蓋納入進來，無疑地，此一任務中心或問題解決導向的決策思維，比較是偏向於短期、枝微、零散、消極和效用取向，如此一來，就待疫情稍緩的激情過後，醫務社工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運作，依然還是處於次級、二等的邊緣身分，還是被框架於事務範疇的行政人員，而非是因為國家證照的社會工作師考取，去正視所應該要有的勞動權益和社會認可。准此，在這裡的針砭所在理當是要順勢利導於重新檢視，從傳統到目前以迄於未來關乎到「醫務社工」角色功能的基進蛻變，從而找出當代「醫務社工」作為一種發展性社會工作的重新詮釋。

其次，回應於工具層次的技術操作，那麼，除了是將「醫務社工」納入禁令的適用對象外，是否也要通盤考量到醫院裡從直接到間接以及從一線到後勤之所有醫務工作同仁的權益保障議題，以此觀之，出境旅遊禁令及其相關的補助或補償，理當是要一視同仁於在醫院場域工作的所有醫務工作人員，畢竟，就其工作場域及其作業運作甚或是傳播方式和群聚接觸，這些不分屬性、職務的所有醫務工作人員，都是在環環相扣的運作流程底下，才得以為病患提供完整的醫事服務，因此，自然是不能將其他非醫事人員的醫院工作人員逕自排除在外？連帶地，出國旅遊休憩如果是一種身心放鬆的舒壓方式，那麼，除了去思考禁令出國的配套措施外，更是要去回應該高工作壓力環境的所有醫務工作人員，如何有其常態性的舒壓作為，就此而言，祭之於禁令出國的損失補償，除了侷限在物質條件的『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外，也忽略了像是專業承諾、社會認可、賞識尊重、團隊關係、情緒負荷、工作成就和使命責任等等無形之『激勵因素』（motivator factor）的配套措施，更遑論於對於「醫務社工」所應該要有基本的制度性保障。

最後，扣緊分級醫療的運作真義，民眾有病應先至家庭醫師或附近診所就醫，倘若是經醫師專業診療後，如有病情治療的需要，再行轉診至其他專科診所或醫院照護，以讓醫院專注於急、重症病患的照顧，順此邏輯，那麼，對於醫事人員的出國禁令，又豈可將直接接觸到病患的診所及其第一線的醫事人員排除在外？無疑地，出國禁令背後所隱含的另類「生命政治」議題，是此一單純的出國禁令會變為更形複雜的盤根糾結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3.06）

12.從移工、黑工到防疫破功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移工、黑工

因應於第一起移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可能造成的社區傳播，致使逃逸移工的整體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再度被搬上檯面，只是，嫁接在當前人人自危及其社會性恐慌之際，這使得對於國際勞工、逃逸移工抑或相關的勞動權益，是有其訴諸於戰略與戰術之併進思考的必要。

基本上，逃逸且失聯的移工轉進到醫院、住家當非法看護，這些現象早就由來已久，即便是政府祭之雇用非法移工的病患或家屬，最少要罰以新台幣十五萬元，同時，被查獲者還會被限期兩年之內不得再聘用移工等嚴厲懲罰，只不過，縣市政府查獲的件數卻是逐年攀升，這也點明出來，此一逃不勝逃和抓不勝抓的突兀現象，自當是有其待解的結構意含，而非只是單純訴諸於依法究辦的司法手段，便可了事，這是因為：首先，需求創造供給，供給進而衍生出更多的需求，這使得逃逸移工的黑工市場，又豈止流竄於醫院或住家的看護，還進一步地擴及到農耕、茶園、工廠等等的邊緣勞務協助甚或是已然成為重要的勞動力來源，就此而言，在這裡的針砭所在直指的乃是長久以來對於移工市場的不當干預以及薪資工作的勞權管制問題，以至於讓供給、需求和媒合、輸送的多造，已經是形成某種環鏈共生的弔詭關係，該項牽一髮動全身的齒唇相依鑲箝關係，自然也就不是單純的逮捕、查獲、罰緩或遣送，便可迎刃而解。

就此而言，癥結點是要回歸到合法入境的這些移工，何以要選擇逃逸以及逮捕之後所要付出的人身代價，倘若兩廂比較之後，逃逸移工是可以有更多利得的交易成本，再加上非法聘僱者也可以擁有較佳的機會成本，那麼，逕自逃逸一事的論述考察，就有它綜融以對的必要，畢竟，這當中所糾結的除了是移工政策及其欠缺制度性保障的壓迫結構所招致的結構性被害外，扣緊從交易成本到機會成本以迄於從「供給端」的移工到「需求端」的業者或家戶抑或是「媒合端」的中介再加上「管理端」的政府失靈，此一緊緊環扣的共犯結構，直指出來冰凍三尺之於尾大不掉的各種衝擊影響，又豈止於這一次逃逸移工作為超級傳播者所造成疫情破口的大失控。

冀此，面對來自於共存共生之利益或利害相關人士（stakeholders）的移工逃逸現象，是有必要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的論述思考，也就是說，宜是要有整體、全面、通盤、綜融、跨部會以及跨層級的整合機制設計，誠然，慣常的社會認知基模，國人早就將移工視為是廉價、低薪與全部概括的次級勞動人口，此一制度性歧視或剝削的社會標記，自然是預伏可能爆發的發展性危機，如此一來，選擇逃跑以另謀生路，理應也是勞雇兩造各自人性誘因之於相互拉扯的一項預期性後果（intended consequences）；連帶地，逃逸與否的推拉效應，更會因為國內『3K』（骯髒、危險、辛苦）的勞動人力難覓或是居家看護申請門檻過高，而形成某種的市場扭曲或市場失靈現象，藉此加速逃逸移工以填補勞力缺口的迷亂情形。

總之，揆諸於「合法引進非法使用」的逃逸黑工現象，那麼，從勞動力填補缺口到疫情失控缺口，這一路下來的演變歷程，就不僅止於武漢肺炎所造成的生理戕害，而是隱含無所不在的社會性發展危機，像是地下經濟、人流管理、公共秩序或社會安全等，至於，非法移工的不處分、不遣返抑或是違法雇主或仲介的不處罰等權宜措施，理當也是要從群聚感染擴散的公共衛生角度切入，藉此突破利益糾葛的共生關係，實則隱藏的是一旦罹病傳染之後，也將會是利害相依的共存命運，至少，先要攜手過渡生命關卡之後，再行共同一起面對生命的出口，以此觀之，現行鋪天蓋地不斷傳送的防疫總動員官方教育，像是正確洗手的7步驟「內、外、夾、弓、大、立、腕」或正確配戴口罩的四要訣「開、戴、壓、密」等，自然是不能漠視或忽略這一群多元文族群防疫知能的觀念充權。

最後，『落難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疫情無國際、玉石也俱焚』，當可作為防疫總動員的最佳註解，特別是在疫情的缺口處，找到生命的可能出口。

【其它綜合篇】（2020.03.06）

13.「武漢肺炎潘朵拉盒子」裡的防疫、減疫、抗疫與止疫……

關鍵字：武漢肺炎、潘朵拉盒子、無知之幕

台灣一地將近一個多月的抗疫作戰，即使未到曲終人散的時候，但是，驀然回首之際，「武漢肺炎潘朵拉盒子」裡的防疫、減疫、抗疫與止疫工程，卻是隱含諸多的深究之處。

基本上，不同於地震、颱風之類的天災或是所造成的複合性災變，這一次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就其措手不及的同時，更顯得人類的抗疫文明史，還是需要更多有待補強的抗疫史篇，藉此告誡過往關涉到風險危機、風險辨識、風險處遇以及風險管理等機制設計，要如何與時增進於明天過後所要面對的巨變生態環境；連帶地，無論是全球化、地球村或是頻繁往來的國際流動，更是指陳出來所謂的『落難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疫情無國際、玉石也俱焚』，不全然只是單純祭出鎖國、封村之類的極端手段，便可全身而退，而是生命共同體的操作性定義，已經是從過往的家庭、國族，一舉延伸到區域、跨境和無遠弗屆的天涯海角，如此一來，要如何找出跨國度、跨區域、跨人群乃至於跨物種的共生共存關係，這更是人類社會要如何得以持盈保泰及其所需要嚴肅面對的一項地球賡續課題。

事實上，僅就這一個月下來的疫情演變歷程，多少也窺見到面對武漢疫情之於「無知之幕」所顯露出來的各種人性誘因和結構環境限制，如此一來，糾結於「武漢肺炎潘朵拉盒子」裡的防疫、減疫、抗疫與止疫工程，更要有瞻前與顧後的併進思考，以此觀之，整個月下來的疫情發展史，包括：從境外感染到國內傳播；從重症到輕症或是無症狀；從明確感染源到無直接感染源；從一次陰性到二次陰性或復陽性；從人群聚集到醫院或社區的不同場域；從國人到移工或黑工的各自類別屬性；從公民到多元文化族群的分殊組合；從三級的疾管署到二級的衛福部以迄於開設一級的跨部會層級；從海外國家之一級提醒到二級警示以及三級警告的分級疫情資訊；從居家隔離到居家防疫或自主管理；從學校延後開學到各行各業的共度難關；以及從醫事人員的禁制出境到社工師的全員列管。

連帶地，從口罩、酒精、衛生紙到其他的風險止惡；從洗手到戴口罩、換穿衣服的健康自為管理；從市場、辦公室、居家、公共場所的防疫總動員；從社區感染到醫院群聚感染的傳播模式；從中高齡到老年或幼年人口的世代流行病學；從北部到中南部的區域擴散分布；從常態性的社交活動到特定性的通過儀式活動；從不必戴口罩到出入公共場所都要戴口罩的自保之道；從搶購口罩到實名制的購買口罩；從一般民眾的口罩使用到安置機構的口罩供需吃緊；從正港台灣人到跨國婚姻公民或暫時身分未明的生命政治；從剎那間的天災到情勢未明疫情的災變照顧機制；乃甚至於從疫病治療到海外國人的全民健保公平權益等議題發想，其所指涉出來乃是：被掀開的「潘朵拉盒子」，又豈止於武漢肺炎的病毒株，而是已經擴及到諸如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勞動、警察、內政、衛福、人文、宗教以迄於從個體、集體、整體到全體等等休戚相關且相濡以沫的共存命運。

誠然，我們共同正在書寫這一場的疫情史篇，只不過，更為艱難的不會是病毒株的對抗，而是要如何用文明來說服您、我，藉由理性的文明態度，以面對脆弱的人性誘因，而非是逕自某種一分為二之所謂『我群』與『他群』的撕裂、對立和仇視。

【其它綜合篇】（2020.03.13）

14.鑑往知來以檢視武漢肺炎的全球化生命共同體意涵

關鍵字：武漢肺炎、全球化、生命共同體

不到一週期間的武漢肺炎演變發展，這使得相與關聯的全球化生命共同體意涵，是有它值得深究與探討之處。

誠然，基於『無知之幕』的肺炎抗疫歷程，這也讓從單純的中國、亞洲地區，一舉地蔓延並且蛻變成為全球化的地球村擴散型態，如此一來，相關的議題現象及其因應對策，自然也就不再只是侷限在生理範疇的就醫治療或是社會範疇的口罩風波，而是鋪天蓋地於從個人到家庭；從家庭到社群；從社會到國家；從地方到區域；從區域到兩岸；從兩岸到全球；從開發中國家到已開發國家；從個體到集體；從集體到整體；從微視到巨視；從下游到上游；從尾端到終端；從環鏈到斷鏈；從生理到心理；從社會到經濟；從文化到宗教；抑或是從生命到政治等等牽連廣大、盤根糾結以及骨牌效應的全面性衝擊影響。

遠地不說，僅就這一周下來不同型態、性質或地域的各項時事新聞報導，究竟是得以叫人稍有舒緩還是更加惡化的人人自危趨勢；甚或是已經產生某種連動影響的杯弓蛇影效應，特別是要如何就其疫情本身發展的階段性變化，以思索從自衛到他為及其國家機器所應該要有的策進作為，對此，截至本周二（2020.03.10）為止的一週期間，與武漢疫情相關的時事新聞，報導內容的結構性分析包括：是否有從人類染病到犬隻中標的「新冠肺炎毛小孩」；是否有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檢驗、治療而去深究台灣一地醫療制度可能失靈的「全民健保破產中」；是否最初亞洲地區延後開學的停損模式也成為全球「三億學生不上課」的移植經驗，連帶地，諸如「一盒索價千歐元」、「澳洲鬥亂衛生紙」、「宣布鎖國義大利」、「海上郵輪孤兒般」等，也彷如是亞洲經驗現象的複製重貼。

再則，是否因應疫情風險未明而必須啟動百工百業和庶民生活的減損優惠與應變措施，像是「缺工斷料無藥醫」、「表演藝術梅花座」、「職棒開幕要延期」、「减班休息無薪假」、「網路預售實名制」。總之，藉由以一週為限的縱貫性時事新聞考察，突顯出來的乃是：武漢肺炎早已經不僅止於某種病毒株的生理醫療範疇，而是直指一項整全多層的社會事實，如此一來，更是需要有戰略與戰術、政策定調與策進作為以及停損止惡和效益評估等等綜融性質的因應機制設計。

總而言之，鑑往知來以檢視武漢肺炎的全球化生命共同體意涵，點明出來的會是一種『落難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疫情無國界、玉石俱共焚』的共存共生關係，至於，疫情暫告一段落的激情過後，攸關到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區域以迄於全球的重建工程，更不應該限縮於短視近利的有無染病、逃過一劫抑或是等待天候轉熱之後的苟且心態，而是要去嚴肅思考：一種從家族到國族以及從地域到區域以迄於從人種到物種的連帶共生關係，是如何得以可能、要如何模塑建構及其能否有效運作，抑或只是被動以等待下一次『明天過後』更大疫情災變的到來。

【其它綜合篇】（2020.03.16）

15.從口罩實名制的更迭演變到社區藥局的功能定位

關鍵字：口罩、實名制、健保藥局

因應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的各項停損止惡措施，但是，卻也傳來某婦人因為還錯健保卡而飆罵社區藥局的女藥師，乃甚至要求該名藥師下跪磕頭道歉，雖然，事情已經正式進入司法程序，但是，此一情緒對決的背後，卻是隱含從口罩實名制的更迭演變到社區藥局的功能定位諸多的思辨論述。

誠然，約莫近二個月前，正當武漢肺炎蠢蠢欲動之際，祭之於的卻是以穿戴口罩來進行抗疫作戰的權變措施，這是否有出現將「防疫檢疫化」的戰略失調誤判，本該有它值得商榷之處，畢竟，疫情爆發之初，理當是要決戰千里以阻擋境外人士抑或是對於高危民眾的有效隔離，而非是將全民視為馬上會染病的標地對象，以至於任由口罩搶購風波，惡化成為某種的社會脫序現象；連帶地，接踵而來之搶購口罩的全民運動及其改由國家接手的實名制，更是讓疫情的調控機制被簡化為穿戴口罩和測量體溫的單一化約主義，如此一來，可以預見到的是：日後還是會出現不同編號的口罩購買實名制，以讓「口罩全民化、全民口罩化」成為抗疫的唯一因應準則。

事實上，單就實名制1.0到2.0的更迭，無論是戰略或是戰術的範疇與操作，都有它的議論之處，對此，1.0版本的推動上路，是否有考量到一般民眾的上班不便，而讓家中長者當街排隊以曝露於可能染病的風險環境之虞？再則，藉由網絡科技的2.0版本，終究還是要面臨到每周一次重新下單的搶購迴圈，更遑論於從1.0到2.0的版本轉換，不變的還是有迫切需求者，不一定能夠順利購買到及其口罩配置不均之整體資源分配的結構性難題，以此觀之，是演變而非演進的1.0到2.0實名制，就不能只是限縮在從實體藥局進化到網絡世界的購買通路上，而是如何扣緊不同人口對象的「分類」和不同危險程度的「分級」，以思考口罩如何確切購置和有效分配的基本提問，更非是想方設法藉由不同的管道，像是健保卡、出入境、財稅等資料的勾記串連，以讓個人的相關資料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此一有可能踩踏到比例原則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將會是資料曝露之後的一項尾大不掉課題。

至於，從早先的超商到藥局的購買措施變革，癥結點也不在於購買的通路設計上，而是此一背離供需原則的市場運作法則，其所造成的四起民怨，就不全然只是聚焦在口罩的能否順利購買，而是從能否買到的有無，以進一步延伸到從幼幼口罩到兒童口罩、成人口罩、聽損者透明口罩等等不同需求屬性的確切滿足；連帶地，如何針對社區感染、社區擴散的提前部署，以思索包括藥局在內的在地社區中介資源，如何讓防疫、防疫物資及其防疫作戰，得以有效地決戰和阻隔於社區之外，無疑地，從這個角度切入，「分階」與「分段」的防疫工程，就不能只是被過度放大在口罩的購置或確診的人數等等枝微末節的工具層次上？

最後，採介可近性、可及性、整合性、便利性以及可接受性等等服務輸送的運作優勢，也使得這一波改弦易轍的實名制度，健保藥局著實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只不過，勞苦功高的同時，更是要去正視藥局所相與衍生的實作困境甚或是長期以來的結構性限制難題，畢竟，盈虧自負的藥局，謹守的還是市場生存的不變法則，因此，與其是祭之於道德勸說的大力相挺，倒不如積極規劃應有且合理的誘因條件及其擴充從藥方調劑到藥事服務以迄於長期照顧的中介平台機制，就此而言，從口罩實名制到社區藥局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運作，宜是要有通盤的觀照視野，特別是正視「社區藥局」背後分殊差異的生態環境，比如說：改由到藥局購買口罩，固然有可能因為來客量增加或是提升藥局形象，而讓藥局的業績有所受惠，但是，從前置作業到集中時段的人力部署，相關的隱藏成本，國家機器是否也要有積極性差別補償的配套措施。

畢竟，很多一人式的家庭藥局，因為包口罩、分口罩和賣口罩的繁瑣工作，而影響到處方簽的調劑業務及其原本就是頗為吃緊的人力負荷，更遑論於後來醫院紛紛成立所謂的『慢簽得來速』，鼓勵民眾回醫院領藥，而讓藥局的處方簽下降，顯然，此一不甚友善的搶食行徑，除了導致藥師們的抱怨連連外，更加顯現藥局或藥師作為國家抗疫作戰成員的一分子，如何兼顧到他們所應該要有的尊崇和報酬，更非是變相淪落成為道德加給的廉價勞工。

【其它綜合篇】（2020.03.19）

16.武漢肺炎抗疫作戰裡的「最佳利益」意涵

關鍵字：武漢肺炎、最佳利益、生命政治

隨著武漢肺炎的另類全球化布局，這使得任何的防疫舉措，總是招來動見觀瞻的放大鏡檢視，如此一來，武漢肺炎抗疫的這一場作戰，背後所潛藏的「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意涵，便有它深入探究之必要。

誠然，在這裡所扣緊的乃是「最佳利益」的關懷旨趣，只不過，該項抽象性質的規範層次，一旦是落實在技術操作的工具範疇，那麼，從抽象到具體以迄於從應然到實然，彼此之間的貫通與落差，是有必要回歸到對於結構環境綜融性考察的必要，這是因為：首先，僅就不到二個月的演變歷程，雖然是可以從醞釀、發微、爆發到不可收拾的不同階段，以檢視各自的因應對策，但是，就其整體抗疫作戰的發展脈絡，還是可以窺見到若干的發展軌跡，比如說最近與最新的疫情圖像，全球的確診人數已經突破20萬例，死亡人數更是高達有7千多名，特別是若干後續染病國家的死亡率，也出現偏高的失控態勢；連帶地，從剛開始對於亞州國家的敵視排他，相當程度上，也直接複製貼上成為亞洲國家對於這些歐美地區的禁止入境，此一從「全球化」到「去全球化」抑或是從「搭橋」到「築牆」的反差對比，某種程度上，突顯的乃是奠基於物質條件和經濟利益的脆弱基礎上，要如何尋找一種地球村生命共同體的連帶關係，這將會是『後武漢肺炎』一項嚴肅的重建課題。

事實上，環視國內本土的自我防疫作戰，依舊布滿著「最佳利益」的迷思與弔詭，畢竟，從事發的初始到逐漸擴散的演變過程，早已脫離單純的醫療保命範疇，而是擁有資源配置權力的國家機器，如何就其整體、通盤、宏觀以及巨視的關照角度，以尋找停損設置的一個適切平衡點，如此一來，糾結於抗疫作戰的『潘朵拉盒子』，究竟在意的是黎民百姓的生死交關，還是要顧及到地緣政治的國際關係權謀？連帶地，攬責在身的國家機器，又是否有去深究作為一種複合性變項的「最佳利益」，自當是要有從一種權利、一種原則、一種程序規定、一種自主能力、一種決策時機點到更多社會性代價的分殊考量，以此觀之，從剛開始所聚焦於口罩的禁止輸出到口罩實名制的版本翻新，多少點明出來國家機器的『法人』，依然是無異於俗民百姓的『自然人』，這兩者都是處於某種無知之幕的問題解決模式，以至於出現父子騎驢與捉襟見肘的運作困境。

冀此，就其捍衛「最佳利益」的應有權利，政府機關要如何尊重民眾意見權益、生存與發展權益以及不可歧視權益，這部份自當更是要有從自主權利到自主能力以迄於自主責任的內在性貫通，無疑地，在這個層次，從鎖國、封城到閉關的自主管理；從三級疫區國家到不分級的禁制出國抑或是強制公布姓名等等所謂依法行政的率行作為，背後所糾結之國家機器的霸權管制，多少映照出來的會是：當代台灣一地欠缺對於公共事務的理想言談情境及其羸弱的公民政治環境，以至於讓這一場的抗疫作戰，恐將淪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治神壇。

總之，武漢肺炎抗疫作戰裡的「最佳利益」意涵，表述的乃是搭橋或築牆以及表意權或國家主義等等的諸多迷思，特別是直指「生命政治」的多重弔詭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3.19）

17.疫情大作戰裡之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的權變措施思考

關鍵字：疫情、分組上課、梅花座

隨著臺灣地區新冠狀病毒的確診人數已經正式突破一百人，這使得鋪天蓋而來的各項權變措施因運而起，這其中除了是啟動非本國籍人士不得入境的管制措施外，也同步要求非得必要學生不可出國；連帶地，相繼於上一波的搶購口罩行徑，一般民眾更是瘋狂於民生物資的大量囤積，至於，攸關到百工百業的應變之道，更是想方設法於如何得以減少災損，藉此渡過生存的難關，就此而言，這當中關涉到從開學、上學到自主學習的權宜對策，更有它回應於包括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等等彈性作法的論述思考。

簡言之，加強健康自主管理以及減少人群的近距離接觸，當為一種面對疫情擴散之由下而上的己身保護措施，就此而言，以大專校院的停止到校上課抑或是改採在家自主學習的備案措施，便有它議論之處，這是因為：首先，全面停止上課的初衷用意，乃是在於避免因為在校園裡的人群接觸，所可能會出現的感染之虞，只不過，從不到校到居家隔離的相互串聯，此一側重在學生自身的自危意識和自為管理，這一點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從客觀風險到主觀風險以及從靜態風險到動態風險等等的風險辨識與風險管理，尚未內化成為包括新生世代在內的一種慣性認知基模，如此一來，不用到校聽課的時間管理、作息管理以及自主學習管理，就不應該對賭新生世代脆弱的心靈結構。

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也不應該只是聚焦在遠距教學的技術性操作，而是除了停止到校上課外，有無通盤檢討目前校園裡相關的防疫管制措施，究竟有無出現運作失效的執行不足之處，就此而言，用以檢視所謂「自主學習」的真義，也就不應該只是單純限縮在不到校上課的在家線上學習，而是一種帶著走的應變能力，要如何在課堂教室、社團活動、打工場所以及居家宿舍等不同的生活環境，有所應變和權變於各種可能的突發情狀況；連帶地，揆諸於大學生的人口族群，早已是將到不到校和上不上課，視為某種基本的學生權益，至於，這其中到校或上課與否的自主權益、自主能力及其自主責任之間的衡平關係，卻是並未被納入以成為新生世代公民德行的素養內含，如此一來，攸關到分組上課、梅花座以及全面停課的因應對策，是有它更進一步的思忖之處，特別是不同決策選項背後的外部成本考量。

對此，相與對應的選項決策思維，是有它多元的發想思考，這其中包括：

（一）維持校園裡往昔的正常運作，一方面尊重大學生是否到校或上課的自我決定，特別是放寬處理防疫期間的出缺席記錄；另一方面則是強化校園裡的防疫措施，彈是，也不是將預備性質的防疫舉措，無限上綱於每位學生都即將染病的檢疫隔離。

（二）學校僅作所有生存或生活環境的其中一個環節，因此，絕非是將學生阻絕於校園教室之外，便可迎刃而解於疫情的有效防堵或避免加惡擴散，就此而言，除非是採行全面戒嚴的居家式閉關隔離方式，否則，不到校停課的定調決定，是否也要有相較完整的配套措施及其成熟的公民素養，這一點的預期或非預期性發展後果，更是需要提早思索所應該要有的效益評估機制。

（三）攸關到梅花座、分組上課以及全面停課的權宜措施，一方面是以修課學生的總數為其参數的門檻，係採行60人、80人或是100人的修課人數為準？係為全班分成兩組以隔週上課，或是分為四組一個月來校上課一次即可？還是上課應出席人數的教室座位安排，有無達到執行梅花座編排的有效阻絕效果？

（四）最後，即使是祭之於全面停課的必要之惡手段，也不應該只是侷限於如何補滿為期18週的一學期基本要求及其相與關聯的成績評核標準，而是如何因勢利導於全面檢視或檢討大專校院的養成教育，究竟是潛藏那些失能或失靈之處，畢竟，四年為限的學習生涯，舉凡從課堂到圖書館、社團、打工、師長、同儕抑或是一般他人，處處充滿著學習元素的蛻變能量，如此一來，順勢宣布全面性停課，並於七月份才開始恢復上學或是回歸到師生之間的自主『教—學』管理，是存在著另類選項的反向思考。

總之，疫情大作戰裡之分組上課、梅花座或全面停課的權變措施思考，所糾結的乃是：從風險辨識的「自覺」、到校上課的「自決」到學習成長的「自主」；從自我決定的「自主權益」、權衡利害關係的「自主能力」到後果自負的「自主責任」；以迄於從國家機器或學校當局的「霸權」、民眾自身或教職老師的「還權」到學生權利義務對稱的「減權」或「少權」等等的綜融思辨。

【其它綜合篇】（2020.03.26）

18.新冠狀病毒抗疫作戰裡的團體盲思與社會謬誤

關鍵字：新冠狀病毒、團體盲思、社會謬誤

時至2020.03.23的今日為止，新冠狀病毒所造成的戕害，已經成為一項名實相符的全球化共同趨勢，只是，環視不同發展階段的演變歷程，那麼，這一場新冠狀病毒的抗疫作戰背後所糾結的諸多結構性意涵，著實有它深究之處。

基本上，因為有限的抗疫經驗，也讓幾近乎是人類浩劫的這一場病毒疫情，造成難以收拾的國破人亡處境，如此一來，扣緊疫情演變歷程的發展脈絡考察，便有它顧後與瞻前的多重論述意義，特別是回應於「人－事－時－地－物」的關懷旨趣，這是因為：

首先，追溯於近二個月之前的事發之際，雖然是迅速成立中央層級的防疫中心，藉此讓各項的權變措施得以提前部署，但是，欠缺縝密、周詳與完備的防疫戰略定調，轉而是側重在抗疫措施的工具範疇，以至於，一個多月過後疫情缺口的失控情形，自然這也是一項預料之中的發展性後果，就此而言，撇開專業把關不足的行政究責，如何記取教訓並且重新佈建與部署，就有它通盤檢討的必要，畢竟，事發的當下，未能掌握「分類－分級」、「時－程」以及「分階－分段」的處遇原則，導致關注的乃是國內確診人數進而忽略了國門敞開的檢疫漏洞、突顯的是對於一般人的過度防疫而輕忽居家隔離檢疫者的全控機制；以及強調的是社會效用且齊頭平等的口罩實名購買以至於忘卻對於高危或特定人口族群的積極性差別待遇，如此一來，映照於從防疫到檢疫從零疫到減疫的失誤戰術策略，那麼，當下疫情失控的迷亂現象，似乎也直指著從疫情控制之『對的事』、防疫措施之『對的手段』、抗疫作戰之『對的人』到瘟疫臨判之『對的決策時機點』，這當中環環緊扣的某一個環結，不是失靈便是有所脫落。

就此而言，將防疫中心的層級提升到最高行政首長位階的一級部署，那麼，原本是部會首長位階的二級層級指揮官，自當是要有人選必要替換的階段性任務考量，藉此才能讓各項防疫對策的因應措施，得以拉高到含蓋衛福、內政、經濟、勞動、交通、教育、司法、文化、外交以迄於兩岸的國家安全關照視野，更遑論對應於不同加惡的演變階段，更是不能陷入同溫層的團體盲思（Groupthink）。准此，當疫情蔓延且擴散並成為一項人身安危的風險事故，那麼，國家機器的科層組織與官僚體系，如何有所調整藉此能夠有效權變於從先發到中繼、救援以至於終結等等不同階段的投手人選和防守陣容。

至於，這一場撲朔迷亂且詭譎多變的新冠狀病毒疫情，多少也顯現出來若干值得深究的社會性謬誤，比如說：為了己身安全的自我保護之故，過往進出醫院的看診人數和聯結居家照顧的服務次數，明顯是出現減少的降幅趨勢，換言之，除非是萬不得已，否則，能免則免就不去就醫或尋求服務，就此而言，如何因勢利導以進行全包括民健保、居家照顧在內的變革措施，自當是要有同時兼顧人性誘因和制度設計的策進作為；連帶地，本土島內所蠢蠢欲動之確診人數的客觀風險或動態風險，相較於那時候歐美地區僅有零星確診個案的主觀風險與靜態風險，所謂逕自出國旅行的避險行為，這未嘗不是一項偏重於個體安全的理性選擇，如此一來，在這裡的針砭之處除了用以檢視有無嚴守正當程序規定之外，一種從自主權利到自主能力與自主責任的公民德行，能否內化以成為認知基模或心靈結構的一部分，這會是該項議題的爭議或真義所在，而這一部分的延伸性思考，更是要進一步地擴及到即將要到來的春假連續假期及其學生族群自為健康管理和有效阻絕於近距離人群接觸的基本提問。

總之，雖然面對的是尚未停損止惡的疫情發展，但是，從『前－新冠狀』到『後－新冠狀』的鑲箝關係，就不單單只是侷限在確診或死亡的量化人數，而是根植於您、我慣性的認知基模抑或是羸弱的心靈結構，能否有所調整修正，以此觀之，這一場新冠狀病毒的抗疫作戰及其所糾葛之團體盲思與社會謬誤的結構性意涵，是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其它綜合篇】（2020.03.26）

19.擺盪在「人身自由」與「集體安全」的趴趴走和種植大麻思索

關鍵字：傳染病防治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正當

法律程序

居家趴趴走以及種植大麻，這兩則乍看之下是毫無關聯的時事議題，背後所糾結之人身自由與集體安全的衡平關係，卻是有它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首先是因應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延燒，違反居家檢疫規定以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從最初＜傳染病防治法＞所處於1萬元至15萬元或最高30萬元的罰緩（若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情形，則是將可處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的罰金），到新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針對到處趴趴走的擅離民眾，處以最高新台幣100萬元的罰鍰（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只不過，該項雷厲風行的不得擅離規定，卻也有因應於趴趴走的不等時數，而出現將裁罰的金額予以分級化的罰裁基準，比如說違規時數兩小時的居家檢疫者罰10萬元，居家隔離者20萬元；2到6小時的居家檢疫者20萬元，居家隔離者30萬元；6小時到1天，各自罰30萬元和50萬元，依此類推，違規的時數越高就要罰越高的金額。

事實上，從事後止惡的＜傳染病防治法＞到提前部署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旨在於讓停損點能夠獲致有效的控管，以此觀之，雖然各國相繼都祭出包括居家檢疫、罰緩、徒刑、強制隔離、剝奪公民權等等不同的權宜手段，但是，癥結點還是在於能否達到所應該要有的抑制效果，就此而言，祭出不等時數趴趴走的情節輕重及其相對應的罰緩金額，是有其商榷的議論之處，畢竟，關鍵點就不全然在於違規時數的本身，而是任何逕自外出的趴趴走行徑，其所隱含病源擴散的風險機率及其背後的社會成本，又豈止是時數多寡自身的乘數效果。

連帶地，不一的擅離時數而來不同的裁罰金額，更是會讓當事者產生心存僥倖，如此一來，自然是背離了要求居家自主管理之防止疫情加惡的消極作用，更遑論於外顯的行為樣態如何嫁接在內隱的認知基模，使其能夠產生從認知到行為的貫通和鑲箝意義。冀此，人性經常對應於制度的框架設計裡，藉此投射出來諸如『本善』、『本惡』或『本賊』等等不同的理性行為選擇，因此，如何在文化主義、法令規章和人性誘因，得以找出一個適切的平衡點，而非只是對賭任何的特定介面，以至於出現更多難以收拾的人性後果。

另外一則也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人身自由及其社會安全議題，係來自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所規定：種植大麻為本刑5年以上之罪，即使是情節輕微，仍然無法宣告緩刑，對此，有3名法官及一名被告認為此乃是不符合所謂的罪責相當原則，而聲請釋憲，大法官的第790號解釋，也正式宣告該法部分是違憲，要求相關機關於解釋公布一年內修法，逾期未修正，法院得視情節依本解釋減刑至二分之一。無疑地，該項突顯情節輕微、顯可憫恕的違法個案，除了依法論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外，倘若是為了標舉『情輕法重』所導致罪責與處罰的不相當或不符合比例原則，那麼，理當是要將人身自由及其社會安全這兩者擺放在同一天平上，藉此思考現行二級毒品的大麻及其種植大麻的犯罪行為，從種植到持有、吸食或販賣等等所潛藏的社會成本，換言之，在這裡需要加以廓清的會是對於禁制種植大麻的法令規定用意為何？此一攸關到集體範疇的人身安危，相與對應的關懷旨趣，乃是為了宣示捍衛社會安全的基本底線，而非是某種法外施恩的『情重法輕』。

總之，從不同時數的居家擅離到不同情節的大麻種植，就其彈性伸縮的權變作為，是要回歸到不能碰觸的紅線行徑，這當中除卻殺雞儆猴的消極作用外，又有無積極以對的關懷生命旨趣，至於，是否要讓吸食大麻除罪化以另開巧門，這是一項可以理性辯護的文明化議題。

【其它綜合篇】（2020.03.26）

20.關於停班與停課之於線上教學因應對策的若干商榷

關鍵字：冠狀病毒、自主學習、學習認知基模

因應疫情確診人數的不斷飆增，這使得各級體制的學校當局，總是想法設法以嫁接在網路世界的線上教學設計，讓學子們的受教權益不至於中斷或戕害，只是，關於停班與停課之於線上教學因應對策的若干商榷，還是有它深究之處。

持平來說，遠端的線上教學，早已是一項由來已久的建置措施，只不過，因為這一次疫情所招致過去是因地制宜且有所選擇的『得』，突然轉變成為強制規定和必須要配合辦理的『應』，這多少也模糊了該項線上教學的運作真義，連帶而來是大量湧入之教學與學習的範疇規模，更會增加線上操作的爭議，以至於造成另類的形式主義，這是因為：

首先，因為停止到校上課而改採線上教學，考察的聚焦點斷然不在於學習的地點，從過往僵化的教室一舉延伸到網路的不同通路設計上，而是一種帶著走的學習態度，因無因為場域的不同，得以增益更多的應變能力；連帶地，是否是直接將體制內的校園教育模式，直接套用在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裡，藉此達到績效管理的效用主義上，如此一來，即便遠端教學是可欲、可行、可及和可近的，但是，對於學習的衝擊影響，這也會是一項嚴肅以對的變革課題，畢竟，長久以來，學校或課堂所講授的，已經不在是對於真理的追求與批判，而是一套如何虛與委蛇的處世之道，此一兼具假道學、偽君子的心靈結構，似乎早已經內化成為您、我一項根深蒂固的學習認知基模。

誠然，因為『學習』產生『習慣』；『習慣』產生『慣性』；『慣性』產生『性格』以迄於『性格』得以改變『命運』，順此思維，那麼，何以停課之際，就必須馬上要有接踵而來的線上教學，此一無縫接軌的用意為何？係為了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及其可能衍生出來那些預期與非預期的發展後果？無疑地，從這個關照視野切入，那麼，這一次因應疫情變化的學習型態調整，顯然並未能將學習的主體性或學習權利，交付還給現場的老師與學生，相反地，有的只是來自於學校行政端之於由上而下各種不成熟的規範性要求，同時，也因為欠缺由下而上且師生互為主體的表達性需求或比較性需求，以至於讓可能會因為疫情擴散而停止上課的應變措施，出現左支右絀和無所適從的運作失靈情形，就此而言，除卻工具範疇的技術操作困境外，缺乏一種自為、自主、自動且自律和自立的學習認知基模，戕害之深且廣，將遠遠超過這一場的肺炎病毒。

最後，因應於從教室到網路的學習樣態改變，相與關聯的命題思考，這會是值得進一步考察的社會工程，這其中包括：涵蓋學校學習、體制學習、真人學習、課堂學習、節數學習、學分學習、科目學習、講光抄學習、背多分學習、考試學習、文憑學習、3C學習、觸碰學習、惰性學習、線上學習、網路學習、登錄學習 AI學習、VR學習、後臺學習、自主學習、互動學習、被動學習、生活學習、適性學習、客製化學習、自在學習、動機誘因學習、終身學習以及認知基模學習在內的諸多迷思與弔詭。

【其它綜合篇】（2020.04.02）

21.疫情擴散、失業危機及其弱勢勞動人口處境的議題現象觀察

關鍵字：COVID-19、失業、勞動弱勢人口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所發布的報告指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擴散影響，全球最多將會增加近 2500 萬名的失業人口，數字之大遠遠超過 2008 年金融危機之際的 2200 萬人，連帶而來的是當發生流行病抑或經濟危機，對於工作者也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衝擊影響，對此，依據過去經驗和目前新冠病毒的訊息，國際勞工組織提醒包括已有健康狀況問題的工作者、年輕人及年長工作者、女性工作者、未受體制保護的工人以國際移工這五大類的勞動人口，更是要留心預防可能會出現的失業風險，藉此提前準備必要的因應方案，而這也是台灣社會相迎『後－新型冠狀病毒』一項重要的重建功課。

誠然，疫情所造成的各種損失，已經是從特定區域、對象的「動態風險」，擴及到全球、大規模的「靜態風險」，如此一來，思索疫情之於勞動就業或工作失業的提前部署，就有它主動以對與積極性差別待遇的必要，就此而言，因為疫情之故而可能遭遇工作不保的弱勢人口，雖然是涵蓋有生理弱勢的健康之虞或年長者、年齡弱勢的年輕人、性別弱勢的女性工作者、勞動弱勢的臨時工和零工以及身分別弱勢的跨國移工等，但是，在這裡考察真義的乃是關乎到作為一種複合性變項的『弱勢族群』，其所對應的範疇內涵及其操作性定義，是有要加以廓清或爬梳的必要，特別是要如何從單一的弱勢勞動族群，以延伸到諸如非典型就業中高齡人口之兩兩關聯的交互影響，更遑論於失業情境所牽動到也不單單只是限縮在個別範疇的收入差異情形，而是要進一步地擴及到從所得中斷、所得不足到所得喪失等等所得維持之於家庭生計及其穩健運作的整體考量。

持平來說，上述五大類型的弱勢勞動人口，之所以會成為這一波疫情衝擊影響的受害者，固然是有來自於疫情本身的失控所致，但是，背後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環境限制，致使這些人的遭遇處境，成為一種結構性被害與被迫的映照反射，也就是說，疫情當只是某種催化的加惡因子，至於，扣緊疫情爆發之前、疫情擴散之中以及疫情控管之後的疫情演變過程；及其環視包括工作意願、工作能力、工作機會、工作收入、工作穩定與工作願景的就業勞動歷程，點明出來的乃是：對於該項疫情失業的整體社會事實，是要有分類分級、分時分程以及分階分段的因應之道和處遇措施，畢竟，像是年齡弱勢的年輕人，自然是比較偏向於教育投資與職業重建的中長期策略規劃；至於，短期見效的應急之道，則是如何有效開發更多的職種或業態，藉此將女性、臨時工或零工等次級勞動人口，納入經濟復甦的產業重要後備軍；再則，攸關到身體羸弱或老化長者的就業接軌事宜，如何讓相關的誘因條件或獎勵措施，同時施行於私領域的在家調適以及公領域的就業服務兩者之間，這似乎也突顯出來長久以來國家機器對於弱勢族群的未就業、就業以及不就業等政策定調，是有通盤檢討的必要。

總之，需要提前部署的豈僅止於防疫作戰本身，而是關乎到戰後的諸多重建工程，更是要有從工具性到規範性；從戰術到戰略；從特定到全面；從復甦到蛻變等等的佈建工程，就此而言，自當不能小覷上述五大弱勢勞動族群的失業危機及其所衍生出來規避風險的應變措施，否則，這些底層勞動階級所加總惡化的社會性病毒，恐將成為下一波全球化的發展性危機。

【其它綜合篇】（2020.04.02）

22.從『肺炎病毒』到『社交病毒』的一線之隔－－

關於防疫作戰裡的諸多拉扯……

關鍵字：COVID-19、社交病毒、溝通促進

從年初蠢蠢欲動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到一發便難以收拾的肺炎病毒全面性擴散，這使得相關的防疫作戰，早已是歷經不同的戰役洗禮，致使要如何從人亡災損的重大教訓當中，以找出適切的抗疫對策，這也成為另類全球化的共通課題，如此一來，糾結於這一場防疫作戰裡的諸多拉扯，是有它深究、探討的必要。

首先是來自於巨視、整體和通盤的綜融觀點，一方面扣緊量化的論述思維，對於疫情的對抗戰術，已經是要從染病發作的事後防治，以向前部署於避免擴散之事前的防制作為，如此一來，所謂『社交病毒』的概念因運而生，也就是說，藉由社交次數、頻率的減少或降低，以期能夠讓疫情傳染或擴散，獲致較為有效的控制，只不過，該項『社交病毒』所帶來民間消費力的下降及其所造成百業蕭條的經濟損失，指陳出來此一盤根糾結且環環相扣的病毒症後群，這使得對於疫情控制的分寸拿捏，是要有多面向的論述思考；連帶地，從生理範疇的肺炎病毒所進一步衍生出來像是供需熔斷的「經濟病毒」、人人自危的「社會病毒」、意識形態的「政治病毒」、通過性儀式的「宗教病毒」、集體焦慮的「心理病毒」、認知基模的「文化病毒」抑或是內外團體之別的「族群病毒」等，點明出來對於所謂『病毒』的詮釋解讀，已經是要從單一、特定與本位的我執角度，以延伸到『疫情無國際、何必骨肉親』的另類全球化課題。

准此，在這裡需要嚴肅考的乃是：隨其全球化的全面佈建或市場競爭，關乎到地球村的全球連帶關係，並未相應而生，致使該項基礎薄弱的生命共同體，也讓『病毒』一戳就破甚或是全面潰堤，換言之，以經濟誘因為主的下層結構，要如何搭接在文化、宗教、社會或人本的上層結構，而非是讓人身的安危，逕自交託在由國家機器所一手掌控的生命政治。

其次是從微視、集體或個別的角度出發，那麼，上述的抗疫作戰，自當是不能漠視由下而上及其互為主體性的共識取得，就此而言，擺盪在科學防疫、理性防疫之一端，理應是要有人性防疫、誘因防疫之一造的對應性思考，否則，當國家機器所主導的權控防疫作戰，被不當擴充抑或是無限上綱，那麼，相關的防疫抗戰工程，還是僅淪為政府各目的主管機關之職責所在，而非是訴諸於全民總動員的中長期作戰，畢竟，以這一波防疫失控的確診人數遽增為例，從境外回國到趴趴走的群聚傳染，直指出來因為欠缺包括外出行為的禁制及其認知觀念之調整的認知行為串聯，致使訴諸於道德勸說的該項自主管理防疫，便成為不堪一擊的抗疫缺口。

冀此，相關的防疫、抗疫的戰術措施，一方面除了需要確立依法究責的公信力外，如何在其政府與民眾之間，建構應該要有的溝通促進機制，這多少點明出來當代台灣地區公民政治的羸弱所在，就此而言，肺炎病毒的疫情作戰，如何強化眾人之事之於眾人管理的公民社會成熟度，這將會是抗疫作戰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

總之，因為確診人數、死亡案例的不斷飆升，導致湧現出來人性抗疫的各項迷亂行徑，如此一來，糾結於這一場防疫作戰裡的諸多拉扯，需要的是從巨視到微視、從整體到集體以迄於從全盤到個別的全方面思考，而從這個角度切入，揆諸於肺炎病毒到社交病毒的演變歷程，說明了關涉到疫情的有效控管，著實要有進行對於慣常認知基模或心靈結構之解構、新構與重構的必要。

【其它綜合篇】（2020.04.04）

23.從『吃人一口，還人一斗』以思索疫情傳愛的時代蛻變意義

關鍵字：疫情、天主教靈醫會、非營利組織

因應於疫情快速擴散所招致的人身安全危機，這使得從個人、家庭、親朋、友伴、社會、國家乃至於區域、全球等等不同內涵的風險事故管理，成為念茲在的掛念之所在，對此，一則來自於臺灣後花園的地方新聞報導，卻也讓疫情病毒多些人情思睹的集體記憶追索。

話說：長期以來守護台灣偏鄉基層醫療的天主教靈醫會，就以義大利籍居多的神父，有感於新冠肺炎重創自己的國家，在其不捨家鄉慘狀之際，寫信向外界求救募款，希望可以籌到善款購買防疫物資以盡早送往義大利救援，當然，起心動念的同時，自然是引發各界的感動響應，這多少印照台灣人報恩回饋的認知基模，特別是彰顯『吃人一口，還人一斗』的知足造福文化，只不過，從篳路藍縷的過往歲月到步入已開國家之林的當代臺灣，藉由「疫情傳愛」的諸多善行義舉，要如何讓履行所謂的社會責任，能夠從企業、個人、政府機關到非營利組織，皆能夠產生創造性轉化的蛻變契機，這才是考察該起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

誠然，走過近代臺灣的開拓史，含蓋宗教元素的事工、志業，早已顯現於從慈善到醫療、教育、文化等等不同發展介面的人群服務範疇裡，以此觀之，歲月的痕跡所鋪陳的就不單單只是從異國到本土、從傳教士到僧侶的不同使命召喚或法身慧命，而是世俗領域的一般大眾或民間單位，要如何從這些神職人員抑或宗教類非營利組織的無私服事當中，以找出衣帶漸寬也不悔的奮發力量，無疑地，在這層次上，被突顯的不是感動行銷的資源募集，而是發自於內心深處的敬畏尊重，藉此回應『落難成兄弟、大愛無國際』的共同宿命，換言之，在這裡的論述真義也不只是侷限於『一口還一斗或半口』之對稱性質的物資關係上，而是要如何從對稱性以擴及到非對稱性的民胞物與及其相濡以沫的連帶情感關係，也就是說，對於這些宗教行止的動容感佩之處，外人如您、我要有從善行義舉的外顯行為，以思考四海一家的認知基模和心靈結構，是否有轉化重塑的可能？

無疑地，從臺灣社會過去幾年所相繼出現非營利組織的募款疑雲事件，窺見到乃是各據一方的山頭主義以及大者恆大的突兀發展，而此一脫序的迷亂現象，固然是有來自於法律規章、自律期許和他律把關等運作失能之處，但是，不盡成熟的公民社會，多少也讓『悲情傳播、綁架人性、感動行銷、資源到位』的公關手法，成為了非營利組織生存或擴充的不二法門，如此一來，擺盪在福利與牟利、非營利與不營利以及案主優先與組織為重的發展軌跡，這使得公益團體所被寄望的社會責任、社會連帶、社會創新、社會共好和社會善意，早已成為鏡花水月般不可多得。

冀此，某些翻轉性的發想作為，實屬必要，這其中包括：

一、擁有資源配置權力的國家機器，各級政府不應該只是限縮於依法行政和依法辦理的狹隘介面上，而是如何扮演稱職的領頭羊角色，藉此讓公益或民間團體的「產」、政府機關的「官」、人才培育的「學」以及評估管理的「研」，建置成為一種相互會通的穩定機制，而這也點明出來現行非營利組織的脫序行徑，未嘗不是直指政府機關進退失據的我執霸權；連帶地，政府機關及其文官系統更是要有超脫僵化主義的勇於擔當。

二、擁有話語權的非營利組織，如何超越本位主義的狹隘格局，藉此回應一本初衷的集體行動理想，就此而言，這一次「疫情傳愛」的愛心捐輸，這些大型的非營利組織自然不應該落人之後，而是基於資源共享的共好原則，主動就金流、人流、物流或資訊流，以進行跨機構間的協調整合；連帶地，非營利組織更是需要針對社會快速變遷，以提前部署應該要有之服務者、倡議者、使能者、先驅者抑或是結構限制衝撞的批判性角色，特別是要去翻轉公益行善便是履盡社會責任的偏頗心態。

三、擁有從眾力量的社會人士，如何讓溫暖之心的『慈悲』及其冷靜之腦的『智慧』，相與貫通以讓助人的善行義舉，不至於成為某種廉價的濫情主義，如此一來，多些同步思考回饋人群的第三人生，要如何有可欲、可行和可為的策略性規劃，而非只是停留在「聽聞、看到和捐輸匯款」的低階範疇裡。

總之，從『吃人一口，還人一斗』以思索疫情傳愛的時代蛻變意義，那麼，加諸於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身上及其所延伸出來將會是：從個人社會責任、政府社會責任以迄於非營利社會責任之於解構與新構的必要性變革。

【其它綜合篇】（2020.04.10）

24.關於「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抗疫提前部署思考……

關鍵字：肺炎疫情、社會處方、生命政治

一場尚未知曉停損點的肺炎疫情，隨其人們日夜拉扯的身心疲憊，這使得春假此一較長的休憩假期，仿佛找到一個情緒解放的宣洩出口，只是，假期過後的疫情變化，似乎也是超過人們所能夠掌握的有限理性，而只能聽天由命般以迎接更多的橫逆挑戰。

誠然，姑且不論防疫作戰工程的操作缺失，但是，至少是能夠將可能擴大或惡化的疫情災損，控制在某一個公共衛生的容許範圍裡，只不過，從確診人數的快速攀升，這也意指包括境外到本土以及個人到群聚的不同擴散模式，是要防疫之於戰略與戰術的多方檢視，畢竟，一方之地的台灣海島，缺乏更多的吞納空間以因應快速擴散的加惡時間，遠地不說，不到三個月的疫情發展時間，從防疫、染疫、檢疫到可能破疫的演變歷程，點明出來毀於一旦的缺口大爆發，實有它夙夜匪懈的精進作為所在，如此一來，端出不要去掃墓祭祖的道德勸說，在第一時間裡自當也是要有針對遊覽風景區的規範作為，連帶地，即使已經啟動細胞簡訊的預警機制，更是需要有預防疫情可能破口的提前部署，像是將外出旅遊者逕自視為某種居家健康自主管理的必要之惡手段。

准此、當大規模的春假群聚活動，已然成為一項既成的社會事實，那麼，防疫止惡的因應之道，就不應該只是淪為等待發病、確診、隔離抑或致死的坐以待斃；連帶地，對於接踵而來的五一勞動連假，政府的解套與配套也是要有「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變災管理機制，特別是放假權益與管制措施及其不同身心舒壓的社會性解放，這部分國家機器斷然不能只是侷限在放假與否之一分為二抑或是民粹主義的治理範疇。

事實上，台灣一地的疫情作戰，已然是要有中長期的對抗準備，如此一來，相與關聯的抗疫宣導或策略規劃，宜要有從生理病毒的『治療處方』擴及到心理病毒的『社會處方』，至於，從所謂的「悶社會」到「悶經濟」抑或是「悶時代」的對應措施，更要有由微視、由個體、由內在、由精神、由無形、由自為以迄於自反而縮的轉化工程，無疑地，當前各項的抗疫對策，還是側重在政治、經濟、物質等巨視層面的外顯行為引導，欠缺一套『定－靜－安－慮－得』的內隱認知基模新構，這也使得壓力鍋的可能宣洩，其所引爆出來的又何止是集體盲目的從眾行為，而是某種集體內在不安與困頓的直接投射。

總之，性命交關的疫情演變，對賭的豈只是少數一、二人的決策抑或是國家機器的生命政治，弔詭、迷思的是，這當中似乎好像毫無關涉到生命自主選擇的最佳利益判斷；連帶地，面對這一場去全球化或是逆全球化的肺炎疫情，剛開始毫無頭緒的亂了章法行徑，實屬必然，但是，隨其撲朔迷離的疫情發展，應該要被提升強化的除了是指揮層級和指揮官外，也包括深陷其中的一般民眾，而此一還權於當事者的基進思維，指陳出來乃是：無關涉到疫情的擴散或控制與否，一種需要不斷充權與學習的心靈結構（mind structure），將會是社會變遷進步的觀察指標。

【其它綜合篇】（2020.04.10）

25.關於出入公共場所要求強制配戴口罩的「公共性」思考

關鍵字：疫情、口罩、公共性

因應於可能失控的疫情發展，亡羊補牢之計，便是全面性強制規定凡是出入公共場所，都需要配戴口罩，至於，違反規定者，一律要進行裁罰，而此一被視為是必要之惡的權宜措施，背後所糾結的諸多意涵，宜有它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誠然，配戴口罩的作用，實乃是一項您好、我好及其大家都好的善行作為，也就是說，從消極的避免被感染，進而傳染給無辜的他人，以迄於藉由口罩的佩帶時機，以讓健康自主管理的風險意識，內化成為一項成熟的公民德行，只不過，該項從民俗、民德的觀念充權演進到法律的強制規範，以及從穿戴的行為制約轉化成為內隱的認知基模，這也點明出來即使是祭之於所謂必要之惡的裁罰措施，自當也是要有包括教化的前置作業和配套作為，而非是事到臨頭之際的訓化手段，來讓肅殺的氛圍成為國家機器用以便宜行事的駭人工具。冀此，關乎配戴口罩以出入公共場所本身所可能涉及到各項的程序正義議題，像是強制性、適法性、迫切性、必要性、充分性、正當性、適足性，理當有它綜融思辨的論述空間。

事實上，即使口罩的配戴有其階段作用的必要性，但是，逕自將違規者視同為現行犯的懲戒態度，這方面還是有它商榷、議論之處，這是因為：一方面治國之道彰顯出來的乃是不教而殺謂之虐的基本作為，更何況這當中可能牽涉到的會是諸如沒有時間排隊購買、沒有公民身分可以購買、採買的數量不夠使用以及欠缺資訊透明對稱等情境議題，如此一來，從沒有意願戴口罩、沒有能力買到口罩抑或是結構性限制未能戴到口罩等不同的類型處境，直指出來的是：倘若進出公共場所的佩戴口罩係屬必要，那麼，如何購買或擁有、是否正確配戴以及能否有效和充足使用，此一國家機器職責所在的基本提問，應該是要優先於對於市井小民的強制規定；連帶地，該項不盡合理的強制措施，也已經從政府蔓延到學校機關、公司行號，以至於演變成為某種另類的『警察國家』或『威權社會』，至於，這些表象的形式主義，是否就能夠讓口罩的配戴，藉此達到預防感染或抑制擴散的管理目標，這除了有待時間的驗證外，公共場所之於公共德行及其所應該要被塑造之休戚相關和社會連帶的「公共性」（publicness），這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真義或爭議所在。

總之，可以預見到還是會有更多荒腔走板的突兀行徑或不當規範，據實地出現在一般民眾以及科層官僚的身上，像是春假期間不設防的到處漫遊抑或是行政機關民粹思維的討好決策；連帶地，倘若背後所糾結「公共性」的核心價值，未獲有效的建構，那麼，從疫情亂象到更多的迷亂現象，依舊是當代台灣社會諸多脫序事實的癥結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4.10）

26.關於開放國人寄送防疫口罩給海外親人一事的錯置思考

關鍵字：防疫口罩、收件人、寄件人

為了配合從今天（2020.02.09）起開放國人將口罩寄給海外二等親人的另類防疫措施，國內的中華郵政建置好所謂「口罩輸出許可證」的連線系統，可以預期的是此一寄件問題紓困的當下，相與衍生的衝擊影響，直指該項的策進作為是有其制度設計及其運作失靈之處的綜融討論。

基本上，從事前的風聲聽聞到一周之後的正式上路，這當中除卻工具範疇的線上系統規劃外，有無回歸到以庶民為其本位的表達性需求，而此一欠缺有效的溝通促進機制，多少是有為德不卒之憾，乃甚至於到最後會演變成為民眾與現場同仁之於情緒對立的社會性怨懟，就此而言，任何的政策定調和決策思維，決戰千里之外的運籌帷幄，理當不應該過於將複雜問題單一扼要化，也就是說，對於將口罩寄送到海外一事的認知解讀，不能只是侷限在工具理性的技術範疇，而是要從寄件者的心理叢集和認知基模角度出發，藉此預想整個運作流程可能失控的因應措施，以此觀之，該項將防疫口罩寄給海外親人的開放措施，是要有以下的基本提問，像是；何以要限縮在二親等的家人關係，特別是如何確切保障那些未有符合二親等資格家屬之海外的台灣公民權益？何以規定二個月內只能寄送30片口罩，特別是現行以50片數量為其基本包裝的可能拆裝困擾？為何係以一名申請人只能申請一名海外親人為其收件人？連帶地，倘若是以數量和實名制其為把關的機制設計，即使標舉此為不用出口報關的簡化程序，但是，整個運作流程的思維邏輯還是突顯出口人作為寄件人及其收件人係為進口人的對應關係？最後，單純的口罩寄送事宜，又何以被提升為某種進出口貿易的買賣關係？准此，倘若要彰顯的是親等關係的消極條件，那麼，理當是由內政部為其目的事業的主管機關，而非是強調將口罩的寄送視為是某種國際貿易事務的荒謬思維。

事實上，制度上路的當天開始，便是要面臨到大批湧入的申請人潮，因此，將申請許可證及其開放寄件日期擺放在同一天，此一思維模式的本身便有商榷之處，比如：口罩輸出許可證申請書的表單為何不能提前開放下載，藉此加速或免除可能的時間耽擱？訴諸於線上、傳真以及親辦等不同的申請管道，有無具實考量到申請人之於資訊不對稱、不充分、不透明、不正確以及不完整的結構性限制？更遑論於官方申請表單上面把關不足的錯誤英文單字或不必要的格式重疊？准此，扣緊「上網申請許可證－登錄寄件人相關資料－輸入驗證號碼－填寫申請書相關資料－身分檢核－拿到口罩輸出許可證－到郵局或快遞公司寄件－輸入輸出許可證號碼－許可證標籤以黏貼在包裹上」等繁瑣的運作流程，諸多不甚方便的擾民措施，相與對應的需求評估機制，會是一項理性以對的行政變革課題。

最後，全部擠在於同一天、同一時段之同一作業的默契行徑，更會造成寄件人諸多恐慌的社會認知，而此一網路世界的搶取現象及其不安焦慮，更勝於賣場店家的物品搶購，如此一來，就不能冀望於道德勸說或技術變革，而是如何換位思考於所應該要有的多重應變機制；連帶地，順此從許可證號的順利申請與否到國際包裹的被退件與否、緊急狀況附加費的高昂攀升與否以及能否成功寄送交付給海外親人手中的諸多干擾變數，那麼，在此一節骨眼裡還是顯現出來『慢郎中與急驚風』的倆相對照，各種荒謬與錯愕的社會觀感，將會被積蘊成為某種對於執政不信任的發展危機。

【其它綜合篇】（2020.04.17）

27.豈止於單一「粉紅口罩」了得之多重論述考察……

關鍵字：疫情、粉紅色口罩、性平

報導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日昨所發起全員戴粉紅口罩，以聲援因為害怕被同學嘲笑而不敢配戴粉紅色口罩的男童後，教育部長也戴上粉紅口罩藉此呼籲「顏色沒有性別之分」，甚至於連教育部的官方粉絲專頁也換上粉色版的LOGO頭貼，除此之外，知名本土速食品的吉祥物阿勇也其在臉書粉專上配戴粉紅色口罩，無疑地，各界所紛紛掀起支持性別平等及其用以打破顏色與性別氣質的舉措，已然是蔚為一股的時尚風潮，這也為沈悶積鬱許多的肺炎疫情氛圍，帶來稍許的人性驚奇。

基本上，上述的相挺舉措主要是聽聞「有小男孩不敢戴粉紅色口罩上學」，因此，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舉行記者會上，指揮官特別率領團隊一起戴上粉紅色口罩，並且大呼配戴粉紅色口罩也很好，自此之後，各個政府部門相繼響應，不約而同把臉書粉專換裝粉紅大頭貼，一時之間，臉書更是冒出一堆粉紅泡泡，就有如過去冰桶傳愛般的一棒接一棒，這也使得對於口罩現象的經驗解讀，就不只是侷限在單一面向的論述考察，而是有它多重、深究的思辨空間，這是因為：

首先，在其所嫁接於疫情演變的口罩現象，這早已經是蛻變成為一項隱含集體意涵的整體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這其中包括有從配戴口罩次文化到不想戴口罩的對抗文化；從自主戴口罩到強制要戴口罩；從無記名購買口罩到實名制購買口罩；從1.0實名制口罩到2.0實名制口罩或3.0實名制口罩；從無限量購買口罩到限額量購買口罩；從幼幼口罩到成人口罩、透明口罩；從一周限量口罩到二周限量口罩；從一周的大人口罩到一周兒童口罩；從一周大人的三片口罩到二周大人的九片口罩；從一周兒童的五片口罩到二周兒童的十片口罩；從公務口罩到藥局口罩、網路口罩、販賣機口罩或便利商店口罩；從清點口罩、分裝口罩與販售口罩；從一般口罩到醫用口罩丶外科口罩；從一次性口罩到電鍋乾蒸口罩；從不織布口罩到布口罩；從救命口罩到政治口罩；從國內家人口罩到海外親人口罩；從郵局口罩到國際快捷口罩；從直接購買口罩到申請許可寄送口罩。

連帶地，從機器組裝階段口罩到原物料生產階段口罩、配送販賣階段口罩；從排隊購買口罩到預先訂購口罩；從單雙號分流購買口罩到不分流購買口罩；從禁止輸出口罩丶主動捐輸口罩；從白色口罩到彩色口罩；從外科口罩到濾網口罩；從低階口罩到高端口罩；從本國人購買口罩到外國籍購買口罩；從預購系統口罩到即時地圖口罩；從穿戴口罩到存放口罩、囤積口罩；從口罩社會學到口罩政治經濟分析、口罩心理學丶口罩社會心理學丶口罩生命學；以及從規範性需求口罩到自覺性需求口罩、表達性需求口罩丶比較性需求口罩等等林林總總的口罩現象，這也使得對於上述『我粉紅我驕傲！台灣防疫掀起性平粉色浪潮』的解讀詮釋，實則是有必要擺放在動態、轉折以及拉扯的整體演進過程當中，藉以思索「口罩潘朵拉」所隱含的諸多結構性意義。

總之，口罩本身的供給、需求與配置、輸送，這已經不只是救命口罩或救援口罩的狹隘解讀，亦即，不再只是限縮在「口罩」的生產或使用，而是採借「口罩」之名，逕自行使的乃是諸如政治口罩丶經濟口罩、社會口罩丶文化口罩丶心理口罩、區域口罩、全球口罩之赤裸裸且活生生的生命政治，如此一來，攸關到「有小男孩不敢戴粉紅色口罩上學」的疫情現象解讀，一方面所表述出來的固然是小男孩之於性別色彩化抑或是色彩性別化的刻板印象，但是，小男童周遭的同儕友伴和生活環境所之於性別體制和持續性別社會化的可能訓化或內化，這更是用以詮釋該項從疫情口罩到口罩色彩以迄於延伸到色彩性平的針砭所在，更確切地說，小男童不敢戴粉紅色口罩背後所糾結的乃是揮之不去的『社會力』（social force），至於，您我一己安危的人身安全又何嘗不是須臣服於國家機器的霸權主義，如此一來，一堆粉紅泡泡所映照出來的會是長期以來不甚成功的性平教育，而這方面的誤謬錯置，同樣地，也是具體回應於當前羸弱的公民政治及其諸多的社會迷亂行徑。

【其它綜合篇】（2020.04.23）

28.吹皺一池春水的又豈止於『口罩無罪，懷璧其罪』了得……

關鍵字：口罩、國家機器、丑表功

隨著新冠狀病毒之全球在地化以及在地全球化的分進合擊，這使得對於疫情的控制不僅是手足無措、不知是好，更遑論於相迎『後新冠狀』的諸多重建工程，就此而言，還原回到疫情演進的變遷歷程，是有它時空環境及其文本脈絡的考察意義。

基本上，『新冠狀』已然不只是命名為COVID-19的某種單一病毒株，而是從生理病毒以轉化成為諸如政治病毒、經濟病毒、社會病毒、心理病毒、宗教病毒、文化病毒、區域病毒、行業病毒抑或是族群病毒等等百毒皆侵的變異組合，就此而言，人類社會以及國家機器的任何因應對策，當只是從各種的錯誤經驗之中，以找出停損設置的有限止惡效果，如此一來，相與關聯的對應措施，更是要有禦敵從嚴的超前部署和超高標準，就此而言，無論是一日一報或是一爆的疫情控管進度，更是要有從衛福到經發、產業、勞動、教育、文建、司法、外交抑或是國安的全方位關照；連帶的思辨所在也是要有從究竟是要解決什麼樣的什麼問題？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以及又會衍生出來那些預期或非預期的衝擊影響出發？否則，當只會淪落成為某種「口罩－疫情－確診口罩－丑表功」的官場文化或形式主義。

誠然，扣緊此一危險因子的新冠狀病毒，就其從分類到分級、從分階到分段、從分時到分程的病毒疫情演進過程，也因為出現諸如有發病癥狀、無發病症狀、境外輸入、本土感染、居家隔離、機構檢疫、強制穿戴、院內感染、社區擴散、無記名、實名制、藥局排隊、線上網購、成人口罩、幼童口罩、振興劵、酷碰劵、戶外社交距離、室內梅花座、粉紅口罩、疫情津貼、連假出遊、敦睦艦隊以迄於兵棋推演之提前封城舉措等等的風險情境或危險處境，而讓疫情一直都是處在於時好時壞、確診人數或致死案例不多不少以及且戰且走的應對態勢，如此一來，更是指陳出來實有必要透過『定－靜－安－慮－得』的認知基模重構，藉以有效地回應於吹皺一池春水的又豈止於『口罩無罪，懷璧其罪』了得之於集體心理、社會力約制和結構性限制的解讀與解放，這是因為：

對此，揆諸於從「口罩－購買－通路口罩－資訊不對稱」到「口罩－供需－乾蒸口罩－健康自主管理」、「口罩－進出－配戴口罩－對抗文化」、「口罩－旅遊－景點口罩－細胞簡訊監察」、「口罩－親人－快捷口罩－國際貿易輸出」、「口罩－藥局－排隊口罩－下跪公訴法辦」、「口罩－生病－病毒口罩－配戴次文化」、「口罩－部署－國家口罩－市場運作失靈」、「口罩－配置－實名口罩－生命政治」、「口罩－隔離－居家口罩－孤獨死」、「口罩－規範需求－強制口罩－國家威權主義」、「口罩－自覺需求－感官口罩－社會心理集叢」、「口罩－表達需求－組合口罩－供需輸送失調」、「口罩－比較需求－對照口罩－相對剝奪感」、「口罩－顏色－粉紅口罩－性平教育」「口罩－國際－救命口罩－台灣主權」以至於「口罩－外交－敦睦口罩－疫調足跡」，顯露出來的是要如何嚴肅看待觀念態度及其外在行為、由上而下及其由下而上、供需媒合及其輸送配置、絕對有無及其相對多少、粉紅口罩及其性平教育、人道救援及其國際政治之間的貫通或落差，而這也點明出來關乎到『口罩無罪，懷璧其罪』的諸多口罩迷亂現象，這早已經是既成社會認知失調的一項預期性後果。

總之，疫情終究是會告一段落的，但是，從個體到集體、社會、國家抑或是全球的認知基模，是否有解構和新構的可能性，畢竟，糾結於全球在地化與在地全球化背後的國族主義病毒或國家機器病毒及其可能的戕害影響，更是遠勝於生理範疇的COVID-19新冠狀病毒。

【其它綜合篇】（2020.04.23）

29.從『有感』的現金入袋到『無感』的酷碰消費折抵

關鍵字：現金、酷碰消費折價券、乘數效果

經濟部針對「營業額衰退50%以上之艱困企業紓困之資格認定及他國發放現金與我國振興券兩者優缺點」在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卻也引發出來攸關到這兩者優劣對比的差異對照，這也使得擺盪在從『有感』的現金入袋到『無感』的酷碰消費折抵之間的諸多迷思、弔詭，是有它進一步深究的必要。

2008年之際所發行的消費劵及其偏低的乘數效果，指陳出來涵蓋現金、消費券以及酷碰折價券在內的這三種不同施用手段，就不只是單一種或兩兩的對比，而是有其整體的多造拉扯，如此一來，三種手段之比較或對照的構面基準為何，將會是此一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連帶地，從消費效益到社會效用抑或是運作效率，這也點明出來彼此之間的和合相應，更是用以尋求一個適切衡平關係的考察重點所在，如此一來，還原回來的根本提問，便是：酷碰消費折價券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樣問題？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至於，問題獲致解決的同時，是否也會衍生出來更多預期或非預期的衝擊影響？

基本上，現金入袋方式，理當會是一般民眾最有感和最樂於接受的，畢竟，這除了是可以有暫時不必急於花用的儲蓄作用外，來自於自覺性需求的消費主義，更可以因為消費動機以提升振興百工百業，只不過，著眼於短期效果的速成作用，這也使得對於該項直接給現金的振興手段，還是有所保留，相形之下，等值性質的消費券，也是因為容易產生替代消費，並且無法誘發出來更多的差異消費、組合消費或擴大消費，再加上現金並無使用的期限，因此，在未能確切達成得以在短期之內快速振興內需經濟的政策目標之下，就只剩下酷碰消費折價券一途的特定性選擇。

誠然，倘若發放現金的振興消費方式恐有「增加人與人接觸機會」、「得不償失」之虞，但是，酷碰消費折價券是否也是隱含面對面的碰觸危險，導致這兩者之間當僅止於程度或頻率的落差，換言之，就其感染風險來看，現金與折價券就只是不同形式、方式的使用型態，至於，兩者之間感染機率的顯著差異，也是有待實徵檢驗；連帶地，酷碰折價券的消費型態雖然是較不容易產生替代消費，但是，只限於在下次消費時才可以使用的該項酷碰折價券，因此，即便是有25%的折扣優惠，只不過，此一延宕效果的阻擾因素，除了會增加持有者的心理認知因子外，是否也要有多餘的閒錢才可以再次消費，以及是否從而也會增加人與人的接觸感染機率，而這也突顯出來該項的酷碰消費折價券恐是有將複雜問題單一、切割化之嫌。

總之，如果是訴諸於「防疫、紓困、振興」的施政次序，那麼，至少在疫情尚未獲得有效控制之際，酷碰消費折價券是不宜倉皇推動上路，至於，能否在現金、消費券以及酷碰折價券這三者抑或是在不同的復原重建階段，有其比例權重的排列組合，這點明出來除了針對這三者各自振興消費的乘數效果要有詳實的精算評估外，另外，更要值得留意的是：不同於過去的經驗現象，關乎到COVID-19新冠狀病毒的疫情風險管理內涵，應該是一項多面向、全方位以及跨範疇之國家生存、危機、應變的整體發展策略，而非只是淪為『有感』的現金入袋以及『無感』之酷碰消費折抵的無謂之爭。

【其它綜合篇】（2020.04.23）

30.敦睦艦隊群聚擴大裡的「彼得原理」反思意義

關鍵字：COVID-19、敦睦艦隊、彼得原理

上周正沉醉於台灣地區所謂『林立情愫』（無罹患COVID-19的零確診案例）的小確幸，只是，過不了多久，卻是傳來敦睦專案艦隊的磐石艦上，至少有24位官兵確診染上新冠肺炎，而且疏於所應該要有的把關機制運作，致使疫情的群聚擴散，恐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大缺口危機，這也使得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科層運作，是要有理性化論述的必要。

事實上，從年初開始國家機器便提前部署於應有的策進作為，特別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層級更迭，只不過，從三級的疾管署（署長）到二級的衛福部（部長）以迄於一級的行政院（還是由部長充任指揮官），重點就不全然在於層級的逐次提高，而是管轄和主責的業務範圍，是否有提升到相與對應的層級事務（似乎只是限縮在新增病例或致死人數的訊息報告），就此而言，不同層級之於不同指揮官的人選派任，自當是要有不同位階與執掌而來的不同角色規範，無疑地，從這個觀點切入，窺見於今年（2020年）一月所正式啟動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人選，不變的還是同一個人，但是，從『夠格』到『適任』而來的「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卻也指陳出來如何有其不同層級的不同策進作為，藉此避免將一級的最高層次，降格以求於作業範疇的低階庶務性質。

冀此，這一次敦睦艦隊群聚擴大所造成的防疫缺口，無論是否要啟動如常的敦睦作業抑或是提前返航的資訊管理及其離艦下船之後的隔離或防疫措施，在在顯現出來這不僅止於部會之間的水平協調失靈，更是一級指揮的權限未能下達於所有部會的垂直管理，特別是重之重的國防單位，事已至此，除了是對於敦睦艦隊群聚擴大所造成「遍地開花是海軍」、「海軍足跡遍臺灣」抑或是「保家衛國敦睦艦」有所感嘆外，相關聯的停損措施自當更是要有禦敵從嚴的超高部署，而此一從確診治療到機構隔離或是自為封城的應變作為，一方面突顯出來的是需要中央與地方或是跨縣市政府的協力合作，另一方面則是其所涉及到從衛生、教育、社政、警察、勞動到民政等等由下而上的臨場應變，如此一來，更加彰顯一級性質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角色定位和功能運作的重要性。

換言之，執掌部會之間的事務協調以及目標決策的行政院高層，不應該只是如同影舞者般逕自下指導棋，而是舉凡從秘書長到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抑或是兼具公衛與醫療背景的副總統，該是挺身而出以讓職權能夠相符於一以貫之的決策斷行？畢竟，從單一部會到跨部會、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從醫療公衛到其它專業，是要有從人治到法治以及從事務官到政務官的制度性養成建置，而此從指揮中心的中介角色到指揮官的能力加給，直指出來的會是國家機器的如常運行，更是要有超越政黨輪替之於文官與政務官的育成機制？

總之，從敦睦艦隊群聚擴大以反思「彼得原理」的論述真義，倒不盡然是指涉順時鐘部長的不適任，而是因其某種特質、特殊技能或順遂境遇，藉此按兵不動於層級與位階之調整和提升，及其所應該要有的整體配套措施，以此觀之，對於該項的敦睦群聚效應，更是要有從上而下的自為反思，否則，出現的就不只是一群疲憊無奈的一線人員，而是過往的努力作為和國人的安危，盡付於科層組織人治思維的運作失靈。

【其它綜合篇】（2020.04.23）

31.阿中部長超強話術的金句思索

關鍵字：防疫國家隊長、金句、政務官

時至今日，姑且不去評斷新冠狀病毒的防疫功過，但是，一路走來始終不變的順時鐘指揮官及其若干超強的經典名句，多少是可以讓處於低迷氛圍的疫情生活，多些人性投射的想像空間。

誠然，疫情爆發之際，本其職責之所在的衛生福利部長，一肩挑起疫情控管重責大任的同時，也因為在第一時間裡有效地不讓疫情擴散、惡化，致使成為防疫國家隊長的不二人選，進而一路從三級攀升到一級位階指揮官的最高層次，而此一從時勢造英雄演變到英雄引領時代風騷的月旦風華，也讓阿中部長的一舉一動成為動見觀瞻之所在，這自然是要擴及到對於超強話術順時鐘的金句思索，這其中包括：『愛有多深，距離就多遠』、『當初已經選擇了國籍，沒有選擇台灣，那現在就必須要自己做安排、自己承擔』、『我們就跟你說，這個揪危險、揪危險、揪危險，你母湯去，阿你丟偏偏欲去，去擱出代誌，叫社會來幫你分擔』、『中國是講了大家也不相信，而WHO從來不講話』、『希望未來WHO經過這一次疫情的考驗之後，能夠認清疫情是沒有國界的，沒有地方該被遺漏掉』、『這是歷史的痕跡』、『記者都很愛當福爾摩斯，對於疫情調查和相關專業那麼有興趣，可以來一起上課，上一次疫調公衛學』、『跑攤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沒跑攤沒失禮啦，不用增加別人的麻煩啦』、『其實是媽祖是慈悲的啦！在這個疫情的期間，我們應該要保護好自己，也要互相來照顧。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媽祖憂心啦！』以及『未來確診人數很可能爆量，但畢竟他們是人，他不是豬、他不是一塊肉，解決之道應該要有好的關懷系統及社會支持力量』以及『不喜歡我當這一個指揮官嗎？聽起來讓人覺得有一點熊心（傷心）啦』等。

誠然，從上述扣緊疫情演變時間序列而來的經典金句，雖然是含蓋區域範疇的全球化議題、政治範疇的兩岸議題、社會範疇的社交議題、宗教範疇的常民生活議題、選民範疇的代議政治議題以及抗疫範疇的目標管理議題，但是，面對著林林總總的範疇議題，所實有的臨場表現卻是諸如不疾不徐、幽默以對、道德勸說、統整能力、沈穩應變等人格特質和領導統御，而此一正面的印象標記，自然是可以讓疫情控管的觀念充權，臻至更多社會教育的事半功倍之效；只不過，此一穩定民心的中道力量，一方面又是再次陷入於內閣改組升官或是台北市長人選的政治渲渦，如此一來，也模糊了公民社會對於政務官的應有監督，至於，隨其疫情失控所欠缺的行政總動員，更是讓防疫國家隊長的順時鐘部長，處於提油滅火的進退維谷狀態，而這也指陳出來即使是「對的事」有「對的人」和「對的手段方法」，但是，是否嫁接在「對的團隊」與「對的資訊」、「對的決策時機」，致使到最後不盡會是「對的結局或結果」，就此而言，過度消耗「對的人」的治理危機，理當是『後順時鐘』所要思辨的公共事務課題。

總之，十年磨一劍點明出來的是不可多得的政務官人才，是需要有層級、位階、業務、職責、見地、胸襟、膽識、決策等等的建置化培力機制，就此而言，朝野的各黨各派更是要嚴肅思考中興人才的養成和勝出，而非是停留在耗材、耗用與耗損的殘補思維。

【其它綜合篇】（2020.04.23）

32.口罩購置之亂的實名制論述考察

關鍵字：口罩、實名制、溝通促進

就其對抗肺炎疫情措施的最新發展而言，本周（0422）正式啟動實名制3.0的口罩購置新制，也就是說，一般民眾可以直接到四大超商的事務機預購和付款，而且花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便可執行三個步驟和完成預購付款，僅以本周第六輪的首日銷售情形來看，雖然，使用健保APP購買的人還是最多，超商排序次之，但是，超商數量直逼APP購買量，並且超商的繳費率也是最高，如此一來，以超商為其新的購置通路設計，實有它後來居上的競爭潛力。

基本上，包括藥局、線上以及超商等不同階段的通路設計，固然是有它回歸到人工智能整體規劃運作的分殊考量，但是，扣緊購置途徑的機制設計，這使得對於從實名制1.0版本的藥局或衛生所、2.0版本eMask（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或健保快易通APP到3.0版本之超商插卡的考察針砭，理當是整體性、多面向與全方位的，畢竟，該項的購買行徑，乃是從消費者自發出發的一項理性選擇，如此一來，環視購買通路（藥局、網路、超商）、付款型態（付現、轉帳、信用卡、行動支付）、領取方式（當場領、預購制）、口罩類型（大人口罩、小童口罩）、物流費用（0元、每筆7元），不同實名制版本的優勝劣敗，便是一項高下立判的預期結果，連帶地，對於該項議題的考察真義，也就不只是侷限在工具範疇的技術性操作，而是要還原回到消費者自身、社會心理集叢以及項目服務有效輸送的相關提問。

冀此，從不同實名制版本而來的延伸性思考，即使是有其階段性規劃的結構限制，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思考，還是要從以如何能夠貼近於一般民眾的認知基模和生活常規出發，如此一來，揆諸藥局現買、網路預售、超商預購之於三軌並行的通路設計，那麼，像是大費周章排隊、預售通知繳費、預購當天付款、手機綁定，健保卡購買、拿取小白單、使用現金，數位支付，開立發票等等一變再變的購買遊戲規則，這除了不堪其擾的被迫屈從外，口罩購置的交易成本及其另謀他途的機會成本，指陳出來當前的『口罩之亂』，實乃是因為無法對市場供需的適當管制，再加上忽略了口罩販售、購買背後所應該要有的服務輸送考量，致使就只能寄望疲於奔命和窮則變通的制度翻新。

以此觀之，緊扣口罩產銷的源頭管理，那麼，相關資訊的正確、完整、透明、即時、充分與對稱；抑或是購置通路設計之完備的「可近性」、知悉的「可及性」、跨域的「權責性」、協調的「整合性」、使用的「便利性」和是否民怨的「願意接受性」，這也點明出來和社會大眾更為積極互動的溝通促進功能，將會是以民為本的首要施政理念，這方面更是要超出單純抗疫工程的應變措施。總之，在這裡的考察真義就不全然只是聚焦在實名制從1.0、20.到3.0之不同版本的位階升級，而是糾結於不同的通路設計的同時，究竟有無提供一種言談溝通的社會情境，特別是從使用者的自覺性、表達性需求切入，藉此讓實名制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口罩之亂，不至於成為疫情失控的代罪羔羊。

【其它綜合篇】（2020.05.08）

33.關於急難紓困實施方案之左支右絀及其進退維谷的人文思索

關鍵字：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社會救助、非典型就業

「急難紓困實施方案」這一項被視為是德政的濟急措施，從消息的發布到正式上路，所呈現出來左支右絀的諸多運作失靈情形，卻也道盡了『民之所欲』要如何得以鑲箝於『常在我心』的施政表現，這方面宜是要有超越我執主義的思維胸襟。

話說：因應肺炎疫情對於經濟病毒與社會病毒所帶來的衝擊影響，這使得關乎到從紓困到振興之多重路徑的解決措施，總是因為疫情的突變、失控，而必須提心吊膽於各項可否、可能或是可行的停損措施，如此一來，疲於奔命的策進作為，要不是計畫趕不上變化，便是直接跳過需求評估的機制設計，以至於讓「對的事」無法嫁接在「對的團隊」、「對的手段」、「對的決策時機」，最後導致所期待「對的結局」反而是成為某種提油滅火的進退維谷下場，此一失政亂流及其質疑執政正當性或合法性的長期影響，將不會亞於單純疫情病毒的生理戕害。

以這一次的「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為例，聚焦於非典型勞動的標地對象，自當是要回歸到此一特殊勞動族群之生態環境、問題診斷、需求評估、資源盤點及其相關解套的處遇計畫，畢竟，鎖定無社會保險身分之勞動人口的該項急難紓困政策，更是需要換位思考於底層人口從資格認定、身分查核到撥款濟助的互為同理，而這多少也指陳出來當行政院高層逕自宣布紓困方案之際，自然是讓社會大眾引來大旱望之雲霓的高度期待，此時此刻，更是無關涉到執行急難紓困方案所必須要被謹守的遊戲規則，連帶地，限縮於諸如從收入、存款到相關查核的最低生活費設算，更是讓被挑起的興奮之情多些不必要的集體焦慮。准此。規範層次的理念構思要如何達到所想要追求的目標管理效益，那麼，工具範疇的技術操作與整合服務，顯現出來行政協調的重要性，而這也指陳欠缺運籌帷幄的機制設計，更是可能會讓決戰千里的努力作為，成為民眾不滿的宣洩出口，而淪為某種為德不卒的施政反諷。

最後，扣緊該項實施方案的操作性定義，那麼，相關聯的命題旨趣還是有它自為反思的必要，這其中包括：此一偏向於福利津貼性質的急難紓困方案，卻是掉落於社會救助審核的運作迴圈，如此一來，除了背離「資格從寬、認定從簡、發放從速」的社會融合真義外，更是讓民怨四起以及行政耗損相乘以成為彼此的共輸結局；連帶地，從一萬元入袋的現金給付到方案項目的福利服務輸送、從一體適用到因地制宜、從雨露均霑的社會效果到個別差異的成本效果以及從排富到排他、從稽核成本到作業程序以迄於從資料檢附到中央聯徵，在在突顯出來：操之過急的該項實施方案，除了欠缺包括需求評估、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的績效管理機制設計外，整起實施方案本身所涉及到諸如資訊不正確、資訊不完整、資訊不及時與資料不對稱等等的資訊不充分，已然是教「急難紓困實施方案」變相成為某種「社救審查全民化」的迷亂現象。

承上，除了『拿您的身分證和存簿即可到公所請領一萬元!』的情感訴求外，『民之所願』或『民之所怨』又要如何回歸到『常在我心』的治理危機及其風險管理，特別是如何要有超越我執主義的思維胸襟？

【其它綜合篇】（2020.05.08）

34.迎接一個急難、紓困、急難紓困及其新興貧窮議題的

「後COVID-19」時代

關鍵字：急難紓困實施方案、貧窮、後COVID-19時代

雖然肺炎疫情的演變發展及其有效控制，還是處於未定之天之際，但是，相迎於「後COVID-19」時代的到來，這使得從急難、紓困、急難紓困及其新興貧窮議題的多重論述，就有它嚴肅探究的必要。

首先，就這幾天已經是被吵得沸沸揚揚的「急難紓困實施方案」來看，該項的策進作為實有它作為領頭羊的示範作用，如此一來，不管是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以至於從朝野到民間，總是用放大、顯微鏡來進行對於該項重建復甦工程的自為反思和他為檢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思忖原則，還是要回到基本的提問，那就是：此一急難紓困的應變對策，究竟是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解決到什麼程度？以及又會衍生出來什麼樣的衝擊影響？

誠然，這一波所主打以無保工作者為其標地對象的扶貧措施，姑且先不去論斷從標地族群（target population）到實際接受到補助的受益人口（serviced population），這兩者之間可能出現的落差，單就該項濟助扶貧的政策定位，便有它商榷、議論之處，畢竟，這當中從急難、紓困到急難紓困彼此之間的概念轉換，是有必要加以進一步廓清，誠然，倘若突顯的是「急難」，自當是要有達到及時雨的挹注效果；至於，若為強調的是「紓困」，更要有從長計議的請領資格規定，就此而言，標舉為「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的該項策進作為，顯然已經是將問題的本質和解決的手段，相與糾纏在一起，如此一來，即使「急難」的社會救助思維和「紓困」的福利津貼取向，同樣都是偏屬於他助性質的公共援救，卻因為一方面要彰顯止惡停損為先的「急難」，但是，又要顧及到資源有效配置的公平原則，致使該項的「急難紓困實施方案」已然是出現進退失據的父子騎驢之諷。

冀此，疫情發展所帶來對於從經濟到社會、從個人到家庭以迄於整個國家在內的全面性影響，那麼，無論是「急難－紓困」抑或是「振興－紓困」的關照視野，自當是要有從工具範疇的技術操作，以回歸到規範層次的通盤檢視，就此而言，該項的濟助方案，宜是要從具備有福利身分的低收入、中低收入，以進一步地延伸到工作貧窮的近貧者以迄於因為疫情之故招致所得不足、所得中斷或所得喪失的趨貧或新貧族群；連帶地，疫情過後重建工程的背後，其所射出來的各種新興貧窮議題現象，像是從舊貧到近貧、趨貧、新貧、工作貧窮、非典貧窮化抑或是中高齡貧窮化、老年貧窮化、核心家庭貧窮化、單人或單親家庭貧窮化以及國家財政懸崖貧窮化，點明出來從「抗疫」到「抗貧」各項棘手的重建工程，才正要開始？

總之，貧窮不會消失在人類社會之中，充其量只是藉由不同的形式、樣態、內涵，來展現貧窮本身的多樣、深邃和複雜，就此而言，該項偏向於一次性、簡易型和現金給付範疇的「急難紓困實施方案」，從領取1萬到3萬不等的公共援助金額，似乎也會讓潛藏於貧窮冰山一角的社會不均，蠢蠢欲動於更大拉扯的階層不平等，如此一來，該項的急難紓困措施是否預伏著更多的常態性貧窮，而此一「後COVID-19」時代的新興貧窮議題，將會是社會變遷的真正關注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5.15）

35.迎接一個「後COVID-19」時代的諸多重建變革課題

關鍵字：後COVID-19時代、新貧現象、心理病毒

即使目前的疫情演變還是處在於某種現在進行式的發展型態，但是，包括個資人權、財政紀律、新貧現象、心理病毒以及去全球化等所謂的「後COVID-19」時代，還是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首先，從醞釀、發微、爆發、擴散到不可收拾的演進歷程，來自於國家中心主義的自危或自為原則，這使得國家機器或行政官僚總是想方設法以快速設置停損點，以成為常在我心但卻不盡然是民之所欲的施政準則，如此一來，少了需求評估的前置作業及其多些政治權謀的利益算計，致使包括抗疫、振興以及紓困等等不同的應變措施，要不是出現提油滅火的解決困境，便是欠缺從分類分級、分階分段、分時分程以及分層分次的整體觀照，僅以急難紓困的實施方案為例，錯將疫情紓困誤置為某種急難紓困的社會救濟思維，這不單單陷入資格確認之值得救助者的審查迴圈，更因為漠視『從寬、從簡、從速』的紓困精神，導致對的事轉成為民怨四起的集體性怨懟，更遑論於從無保工作者到有保農民之類別範疇的分殊待遇；連帶地，相與關聯的配套對策，更是直接跳脫＜個人資料保護法＞或＜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最底防線，逕至包括細胞簡訊、人潮熱點等等無限上綱的電子圍籬防疫化建置。

准此，因為集體安全之故，導致疫情的控制，被放大到對於個人私密識別化的聯合徵信，如此一來，該項「個資人權迷亂」的發展性危機，勢必也讓強勢政府之於弱勢公民，惡化成為某種無以復加的民主式極權國家；其次，限縮於急急如律令的振興、紓困解套之際，這使得相關預算經費的編列，即使是完備表相的正當程序，但是，欠缺法源依據及其績效管理機制，這使得一方面抗疫工程恐有淪為某種民粹的特定意圖之嫌，連帶地，大舉的財政擴張和所招致而來的財政懸崖，這也指陳出來「財政紀律迷亂」的發展危機，勢必會是未來正常國家化和國家正常化的發展關鍵所在，畢竟，財政危機所形成債留子孫的世代會計，這會是抗疫工程過後所要嚴肅面對的世代賡續課題。

再則，疫情作為某種風險係數之惡化或控制的影響變數，也讓經濟不安全成為疫情之於衝擊勞動就業和工作收入的一項重建變革課題，如此一來，「後COVID-19」時代的新貧現象及其社會議題，更會成為一項攸關到國家安全的新興課題，換言之，除了非典勞動型態的工作貧窮化外，像是社會新鮮人的新冠世代貧窮化、青年貧窮化、中高齡貧窮化、老年貧窮化、婦女貧窮化、新住民貧窮化、核心家庭貧窮化、單人或單親家庭貧窮化等所謂的「新貧現象迷亂」，這除了用以豐富既有的貧窮概念內涵外，理當是要進一步地思考「後COVID-19」時代之濟貧、止貧、扶貧、脫貧抑是安貧的新抗貧典範建構，而這也突顯出來從短期之內的振興紓困措施到中長期規劃的結構性調整，宜是要有包括戰略與戰術多頭並進的必要性思考。

最後，COVID-19疫情病毒所牽動到的另類全球化現象，除了是讓全球化的概念實作，從趨同性發展的全球化演變為包括部分全球化、半全球化、準全球化、非全球化或是去全球化在內的全球化不同組曲外，關乎到在地化的社會連帶基礎，亦有它重新檢視的必要，畢竟，除了生理病毒外，像是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文化病毒、族群病毒、區域病毒、地緣病毒等滾動性影響，疫情其所牽動的就不僅止於上述外顯的表徵行為，更有它復歸於社交距離、人際互動、網絡關係及其社會資本的基本提問，如此一來，「心理病毒迷亂」及其有待建構之新型態的群我關係基礎，勢必會是從傳統社會到後資本主義社會以迄於後新冠狀社會，一項棘手的社會性重整課題。

總之，相迎於「後COVID-19」時代而來的「個資人權迷亂」、「財政紀律迷亂」、「新貧現象迷亂」以及「心理病毒迷亂」，點明出來更多橫逆的挑戰工程，才正要開始。

【其它綜合篇】（2020.05.21）

36.從北車嚴禁席地而坐以反思台灣大眾空間的友善、人文與公共性

關鍵字：台北車站、公共空間、移工

因為肺炎疫情而讓川流不息的台北車站暫時被控管，連帶地，也讓過往在大廳裡席地而坐的場景一時之間煙消雲散，對此，台鐵當局借力使力祭出將不予以開放在大廳席地而坐的禁令，如此一來，也引來社會大眾輿論的撻伐，雖然，主管機關的交通部首長順其民意的風向球而有不同的裁決，但是，事已至此，來自於北車嚴禁席地而坐以反思台灣大眾空間的友善、人文和公共性，這才是該項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

基本上，之所以會讓台北車站大廳的席地而坐，蛻變並成為一種隱含集體意義的整體社會事實，不外乎是台北車站本身所兼具交通匯集的客觀優勢，再加上寬闊無比的大廳空間，這使得從跨國移工到一般民眾的席地而坐，無非也是一項窮則變的因應措施，畢竟，隨著時空條件的改變，大排長龍的擁擠情形，當只能在年節之際的通過性儀式勉強出現，因此，空蕩的北車大廳之於可及、可近和方便的諸多利基，這也使得北車大廳的『席地而坐』，自然是一個取其輕且得其利的次佳選擇（secondary choice）。准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乃是指陳出來台鐵當局抑或是北車主管，未能因應時局的改變而讓大廳空間有其所應該要有的空間規劃調整，相反地，逕自漠視民瘼而來的制度性障礙設限，也讓潛伏許久之累積性剝奪、滾動性影響及其社會性排除的我族中心主義，顯露出來且毫無自覺。

事實上，關涉到北車大廳禁止席地而坐的結構性意義，實乃是深邃且多重的，這其中糾結的更是包括北車大廳、人文環境、空間設計、動線規劃、有礙觀瞻、文化歧視、社會包容、公民德行、難以觸及、弱勢族群、社會參與以及健康促進等概念內涵，誠然，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自當是有它實用性質的基本考量，但是，不變的準則還是要回歸到以人為本的精神理念，就此而言，何以讓『席地而坐』已經成為一項大家都這麼做的「民俗」或是最好不要這麼做但也是無妨之「民德」的慣性舉措，換言之，欠缺換位思考的貼心設計，而讓從席地而坐到矗立腳站等等無處可以休憩的景象，處處顯現於諸如車站、書局在內的公共空間，此一不友善的生活環境及其欠缺同理心的人文關懷，乃是當代台灣社會不文明的真實寫照。

連帶地，席地而坐的大剌剌舉措，除了有其公共秩序維護的管理需求外，潛藏於主流社會之常態性裁判的認知基模，是否也包括對於這一群移工之於不同種族的道德觀感，如此一來，關乎到席地而坐於北車大廳的解決對策，就不在於訴諸於空間設計、動線規劃、加設座椅等技術變革，相反地，是否還隱含著有礙觀瞻、文化歧視或是社會排除的潛意識結構，擴而及之的更是從主流到非主流、從我群到他群以及從內團體到外團體等等疆域界線所構築的社會性距離。冀此，面對移工族群此一早已出現在您、我生活世界當中的不爭事實，那麼，北車站及其車站大廳所展現出來的就不僅止於席地而坐的突兀景象，而是某種「他鄉遇故知」的互動聯繫和情感依歸，誠然，藉由當下此時此刻的相濡以沫，以表述一段集體移工們所共同擁有的歷史印記。

總之，席地而坐與否，這一點是可以被議論與變革的，但是，如何從對於移工的跨文化交流到對於邊緣人的社會性包容，那麼，在這裡需要被傳達的將會是一種回歸到人本思維之「尊重－多元－包容－差異」的文明化進程，又如何得以可欲、可能和可行？

【其它綜合福利篇】（2020.05.29）

37.關於發放振興券之於強渡關山的人文思索

關鍵字：疫情、振興、社會效果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趨緩演變，我國即將進入所謂的振興期，至於，備受關注的振興券方案，也是確定非做不可，並且是要採取不排富原則，也就是說，每人只要先支付一千元便可兌換三千元，弱勢族群部分則是可以免費獲取，六月初行政院將會宣布相關的規畫構思，六月中啟動實體券預約以及電子支付的綁定措施，正式上路則是會是在今年的暑假期間。

基本上，引頸翹望的該項政府德政，主要是意圖藉由政府補貼的方式，以鼓勵民眾進行差額消費、組合消費、持續消費、擴大消費和密集消費，藉此達到帶動百工百業的起飛作用，只不過，振興經濟和繁榮社會此一『對的事』，要如何嫁接在『對的政策』、『對的團隊』、『對的手段』、『對的決策時機』，如此一來，才會有『對的結局』，就此而言，即便是振興券的發行，這已經是一項箭在弦上的策進作為，但是，顧後和瞻前的自為反思，實屬必要，這是因為：

首先，民眾對於該項的振興經濟措施，並不全然是陌生抑或完全的狀況外，畢竟，早有過往消費券的實施發放和使用經驗，如此一來，目前執政黨所構思的任何提振措施，自當是會產生『他山之石（前朝）』的對照效應，特別是環視「現金」、「消費券」以及「扣抵禮券」之間的不同操作機制，這除了是糾結金額大小的人性誘因外，也包括從政府到民眾、店家等等利益或利害之相關人等（stakeholder），要如何就其供需、媒合及其輸送而來的諸多服務過程，藉此達到社會共贏以及國家共好的諸多目的。

冀此，若干工具範疇的技術操作及其所可能衍生出來的運作難題，就有提前檢視的必要，對此，振興券的規劃運用，恐是有將簡單問題加以複雜化之嫌，遠地不說，即便再怎麼程度的e化，背後所糾結之資訊的不正確、不完整、不透明、不對稱及其不充分，指陳出來：一旦正式上路，勢必會引來擾民、刁民和不便民的諸多民怨，誠然，振興券採行的是實體券和數位券的兩軌並行制，並且涵蓋電子支付、信用卡、電子票證和現金使用等等不同的交易型態，只是，這除了無法和常民社會的慣性消費行為相與搭配外，倘若在其使用過程之中，無法確切滿足即時扣抵的消費需求，這自然會有相對剝奪的質問，更遑論於印製實體券抑或是電子支付防盜門檻等等過於複雜、繁瑣的類別化設計。

連帶地，數位消費的種類多元，將會使振興券的發放成本增長，如此一來，解決一個問題，卻也衍生出更多的問題，特別是正當國家財政紓困之際，節流理應是要重於開源的財政資源有效配置。准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突顯出來：何以拋棄最為簡便的現金入袋抑或是民眾所熟悉的消費券，而是執意非要採取先支付再行折抵之所謂禮券性質的振興券，此一交易成本及其機會成本的優劣之差，早已是昭然若揭、曝露無遺。

再則，不加以排富的資格確認，固然是著眼於一體適用和與露均霑的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iveness），但是，這也忽略了台灣社會既有貧富之間的階層化，對此，一方面是忽略包括近貧者或老障等弱勢族群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則是如何正視背後所糾結的仇富情結，藉以因勢利導於中上階級可能帶動的乘數效果，而這也是當前台灣一地相迎於社會不均和世代會計的變遷趨勢，所必須要慎思的變革課題。

最後，從執政黨所標舉的『好領、好用、支付多元』到在野黨或一般民眾所訴求之『折扣低、給太少、頗複雜、發得慢』抑或是『直接、快速、簡單、有感』等意旨訴求，點明出來的乃是：倘若，該項的振興券還是不能懸崖勒馬或回頭是岸的話，那麼，更是需要留意將會是攸關到執政之正當、信任以及合法等發展性危機。總之，面對『後COVID-19』的兵荒馬亂之際，振興券的滾動式調整，實屬一項未臻成熟的不智作為，對此，『有權－任性－謀私』的執政霸權心態，這恐怕才是該項疫情紓困政策的最大危機所在。

【其它綜合篇】（2020.06.12）

38.關於『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的三倍劵另類思考

關鍵字：COVID-19、三倍劵、藝FUN券

七月起有多項民生新制小確幸上路，這其中最大好康的應屬於所謂的振興三倍券，人人可以拿1000去換3000元，猶記得今年（2020年）一月新冠狀肺炎猖獗之際，口罩之亂誘發出來心理病毒的社會性恐慌，致使民間社會也同步發起所謂『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的社會運動，一時之間，也將口罩危機換化成為某種轉機的認同管理標的，於此同時，扣緊從紓困到振興的各項濟助措施，這也使得各個部會無不摩拳擦掌以推出政府作東但卻是民眾要由買單之三倍劵或藝FUN券的福利津貼，如此一來，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這兩者之間的會通與落差，就有它嚴肅探究之必要。

首先，姑且先不去論斷是否有錯將「三倍劵」等同於社會救助範疇的急難紓困或災害紓困，此一振興性質的「三倍劵」，理當是要建基在社會促進之共好共榮的前提底下，以提供COVID-19疫情過後社會性轉化的可能契機，就此而言，「三倍劵」所要被突顯的會是某種一體適用的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iveness）而非是個別差異的成本效果（cost effectiveness），換言之，因為著重的乃是皆大歡喜的社會感受，如此一來，諸如有感、便利和好用等運作優勢，自當是對於「三倍劵」規劃設計的針砭所在，至於，個別需求的差異性給付抑或是積極性差別待遇，則是需要回歸到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的各自概念範疇，從而提供涵蓋需求評估和結果評估的整體效益評估機制設計。

誠然，面對百年難得一見的病毒疫情，除了搶救生命外，要如何為奄奄一息的社會大眾與岌岌可危的百工百業，尋求生命出口和可能生機，而這也說明了各國政府多少還是以想當然耳的認知模式，逕自撒錢、給錢和發錢的討好殘補方式，以至於忘卻了激情過後的財政危機和世代會計，恐將會成為後遺症更為甚遠的一項發展困境。冀此，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這兩者之間的分殊和合，就頗有它值得玩味之處，畢竟，前者要被彰顯的是某種非對稱性的禮物關係（gift relationship），藉此讓民胞物與的關愛情懷，得以從利己跳脫到利他且利社會的共好結局，只不過，此一個別性行善的您先領口罩，對照於制度性燒錢之都來領的倍劵，無論範疇規模、衝擊影響或社會代價，都是一項天差地別的難以比擬，特別是如何就您先領口罩之於個人和他人的單向關係，進一步地擴及到都來領三倍劵之於個人和世代的縱貫關係，那麼，這當中共好的認知基模、連帶基礎和轉化機制，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真義或爭議所在。

對此，隨其文明化的發展進程，理當是要扣緊公民資格以強調公民權利行使的權益保障，然而，代議政治欠缺所應該要有的責任政治、制衡政治和公民政治，如此一來，台灣一地並沒有因為直接選舉的政黨輪替，而讓安居樂業的福國利民，成為一項可欲、可望而且是可以實現的生活福祉，相反地，人民與政府以及社會與國家，彼此都是處於相互對立和互不相信的敵我對峙態勢，這也使得從逃漏稅的道德危險行徑到啃噬公家和後代子孫資源的福利依賴行為，導致國家機器與人民一直是站在對立面抑或已然成為某種的既得利益階級。

遠地不說，無論是一千換來三千的「三倍劵」，還是每份六百元的「藝FUN券」，癥結點不在於兌換或免費領取的金額多寡，而是放在個人手裡的三千或六百元，並是不怎麼大的一筆錢，但是，個別加總而來的公帑支出，卻是一筆要以億元計算起跳的龐大經費，更遑論於這些預算編列背後的財政紀律和乘數效益，還是有它商榷、議論之處，如此一來，要如何從花掉的三千或六百元，以加碼成為更多的組合消費、差異消費、擴大消費和不斷消費，這多少也指陳出來推動所謂的「三倍劵」或「藝FUN券」，除了是需要在外顯的消費行為上多所舖陳外，也不能忽略相濡以沫的社會連帶精神，如何內化成為一種患難與共的同舟共濟精神，更確切地說，眼前的台灣社會極度缺乏的正是一種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的打拼願景。

總之，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以迄於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那麼，台灣的願景藍圖就不應該只是淪為「三倍劵」與「藝FUN券」之類見樹但不見林的狹隘視野。

【其它綜合篇】（2020.06.19）

39.關於從馬偕一線牽到口罩我來捐的傳愛衍情

關鍵字：COVID-19、口罩、馬偕

一則溫馨的地方新聞報導，卻是有著濃濃跨時空的傳愛衍情。

話說：和淡水締結為姊妹市的加拿大安略省牛津郡，如今也遭受肺炎疫情的波及，並且出現防疫物資的嚴重短缺情形，對此，牛津郡的郡長特別寫信向姊妹市的淡水區公所求援，淡水區公所也在第一時間籌措一萬片口罩，透過空運寄出，藉以彰顯「Taiwan can help！」的人道關懷，當然，牛津郡長的寫信求助行徑，也並非是突兀之舉，這是因為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身為牛津郡子民的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到來台灣的淡水宣教和行醫教育之旅，其所鑄留的善因好緣，從而超越時空和地域環境，以讓這樁美事得以有其圓滿的共好結局；連帶地，通常都是偏向於現實或實質利益結合的締結姊妹市，藉由這一次的口罩捐輸，亦已成為超越政治範疇的新禮物關係。

誠然，非對稱協助的該項禮物關係，其所表述的乃是某種相與濡沫的生命共同體，也就是說，透過從過去的捐血到這次的口罩等等的個別性行善，以轉化成為某種的制度性善行，從而以讓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的基石更為厚實，以此觀之，淡水之於牛津郡的口罩捐贈，即使不是顯現某種人親土親一家親的在地關懷情愫，但是，透過馬偕博士宗教作為的時空牽線，未嘗不是展露出來某種落地成兄弟但何必骨肉親的民胞物與情懷，就此而言，在這裡要被聚焦提點的，就不再只是媒介物的口罩本身，而是生命輪迴裡的某種時空交錯，也就是因為有馬偕博士的自為使命，得以成就更為殊勝的圓滿；連帶地，是否要將相同的關愛情愫，一併惠及到曾經施恩於台灣一地之所有外籍傳教士的家鄉故里，當然，這其中也要包括台灣偏鄉遠地的醫療、教育等等蹲點工作，又要如何找到賡續工程的傳愛者？

生命有限，傳愛無垠，交錯於不同時空環境的應該是更多內省的自為反思，藉此告誡自己，如何讓無常的生命嫁接在第三人生的寬闊視野，藉此傳衍馬偕博士毀而不悔的使命意旨。

【家庭福利篇】（2020.06.19）

40.關於「邊境管制－商務人士、境外學生－小明們－反中情結」

的政治命題思索

關鍵字：邊境管制、小明們、反中情結

雖然國內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現逐漸緩和趨勢，並且從6月7日開始境內已經解禁，然而，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小明們』，至今依舊無法返台，對此，自救會的多位父母到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進行靜坐陳情，除了是對於政府優異的防疫表現加以肯定外，同時也希望不要忽略了還有一群被遺忘的台灣未成年子女，一直遲遲無法順利返台，不僅無法和家人團聚，連最基本的就學權益也被剝奪，乃甚至於學籍都要被取消。無疑地，對於此一靜坐跪求地的悲心舉措，是有它嚴肅以對的必要。

基本上，COVID-19爆發之際，任何的權變措施，是有它停損設置的必要，但是，一旦是回歸到運籌帷幄的風險管理運作機制，那麼，從衛福、經發、交通、教育、民政等等關涉到人民生活福祉的大小事務，就有必要相應於優先性、迫切性、正當性、適足性、公平性、比例性及其整體的綜融考量，而非是讓單純的生理病毒夾帶著意識形態及其所增生的政治病毒，以至於讓最後COVID-19的下場死因，係來自於某種的我執或我族中心主義，僅以上述的小明們事件為例，該起議題現象的針砭考察，不外乎是扣緊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及其解決對策和配套措施的論述主軸，如此一來，嚴禁小明等人的入境返台，究竟是對「事」還是對「人」？

誠然，超過半年都無法返台的『小明』是「人」，但是，讓「人」無法回台團聚的是「事」，這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癥結所在，就此而言，回應於＜兒童權利公約＞裡所揭櫫之生存發展、禁止歧視、最佳利益以及尊重意願等四大原則，那麼，如何讓『小明們』能夠順利返台，國家機器之於積極性差別待遇的各項策進作為，是有被放大檢視的必要，而這也對比出來政府高層祭之於選了"國籍"就要自己承擔的荒謬立論，無疑地，映照於歷史共業，那麼，在這裡所要被突顯出來的乃是一種「邊境管制－商務人士、境外學生－小明們－反中情結」的錯置命題，這也使得生理病毒已然蔓延成為涵蓋政治病毒、教育病毒等超級變種株，進而形成所謂的COVID-19症候群。准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指陳出來：過於將生理病毒泛政治化的對治思維，犧牲的除了小眾百姓的基本權益外，同時也斬斷了後COVID-19作為一種糾結「危機－轉機」、「戰略－戰術」、「內宣－外宣」以及「停損－獲利」的蛻變生機。

總之，正值此內地的疫情還在持續發展中，因此，任何必要的管制措施，固然是實屬正當，但是，對於底層民眾的權益保障要如何提前部署，更何況，孩子的成長是無法和不能等待的，因為：這些『小明們』的名字，就叫『今天』。

無疑地，對照於「邊境管制－商務人士、境外學生－小明們－反中情結」的政治命題，這使得希望政府高抬貴手以讓孩子盡快回家的悲情訴求，更顯現公民政治裡自以為意之轉型正義的不堪。

【其它綜合篇】（2020.07.03）

41.來自於『疫情－就業損失－階層惡化』命題意旨的若干發想……

關鍵字：COVID-19、全職工作、生命政治

報載聯合國警告指出：新冠肺炎危機所釀成的就業損失，將遠遠超出先前的估算，今年（2020年）全球第2季恐有高達4億個的全職工作會流失，這當中也表述不同的結構性意涵，像是疫情所折損的工作時間萎縮之巨，超乎想像之多，再則，受制於因為疫情所導致工作場所的關閉，也讓諸如留停、特休抑或是非自願離職與自行離職等就業危機，正處於一種持續惡化的蔓延態勢；連帶地，從美洲到歐洲、亞洲以及非洲之不同板塊的工時或工作的損失差異，更是讓這一場疫情全球化的普同趨勢，有其在地全球化的個別惡化景況，以至於讓人人自危的生存應變，又豈止於限縮在單純的個體身上，而是一舉地延伸到社會、國家、區域以及洲洋之間的自謀生路，而此一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和新構，將會是『後COVID-19』的重要考察指標之一。

事實上，即使是就疫情及其勞動型態之間的影響拉扯，也點明出來這兩者之間和合關係的深邃複雜性，將遠遠超出我們所可以想像和能夠負荷的，誠然，資料顯示出來上述『疫情－就業損失－階層惡化』的命題意旨，已經是從已開發國家蔓延到開發中抑或是低度開發、從主流種族擴及到非白裔族群、從正職惡化到兼差抑或是部分工時、從全時工作延及到非典型勞動、從中上階級擴散到普羅大眾、從優勢族群游離到新住民族群、從男性延伸到女性、從年輕世代邁向到中高齡抑或老年世代抑或是從工作穩定展延到低薪就業或者工作難以自保等等不同的發展趨向；連帶地，疫情對於就業穩定的衝擊影響，也不再只是如何繼續保有該項餬口的謀生工作，而是需要進行從截然有無之絕對剝奪到職場待遇之相對落差的整全多層考察，像是疫情勞動之性別失業化、疫情失業之性別貧窮化抑或是疫情貧窮家庭之危機化等等的深層探究。

如此一來，對於上述新冠肺炎危機所釀成的就業損失和工作流失，自然不僅止於表相的變遷趨向，而是指涉出來更為嚴峻的階層效應抑或是階層深化的衝擊影響，換言之，糾結於『疫情－就業損失－階層惡化』的命題意旨，更是有要對於包括性別、年齡、膚色、種族、地域、國度、教育程度、社經水準、家庭組成抑或是生命歷程的殊異考察，顯然，姑且不論COVID-19所造成的「生理病毒」，是否能夠被有效的控制，但是，其所衍生出來的「心理病毒」、「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政治病毒」、「文化病毒」、「工作流失病毒」、「就業損失病毒」、「家庭解組病毒」或是「發展性危機病毒」等從單一到彼此交互所產生的衝擊影響，這已經是一項迫在眉睫的處遇難題，至於，如何有其相應於國家機器或深層政府之於『生命政治』的操作手法，這一部分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都是需要有大開大闔的創新作為，藉此扮演巨靈怪獸如國家以及偏安百姓如順民，兩者之間必要的提點和引領。

總之，來自於『疫情－就業損失－階層惡化』命題意旨的若干發想，說明了『後COVID-19』各項艱鉅的挑戰工程，才正要開始，以此觀之，年底就要告一段落的振興三倍券，後續的因應對策又會是為何與如何？

【其它綜合篇】（2020.07.20）

42.新冠死亡的『老、男、病、窮』圖像勾勒和台灣一地的參照意義

關鍵字：新冠狀病毒、大數據、檢定因素

雖說是一則外國的新聞報導，但是，背後所隱含他山之石的參照意義，還是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話說：根據英國向其國內1700萬成年人所進行的健康紀錄分析顯示，罹患有糖尿病、肥胖症等各種基礎疾病者，都會增加死於新冠病毒的風險機率，除此之外，男性、長者以及較為貧困者的死亡風險也較為偏高，至於，種族方面，則是以非裔及南亞裔為最，顯然，藉由此一大數據的資料勘查而來的圖像勾勒，對於屬於抗疫成效前段班的台灣社會來說，更是有它臻於至善的策進作為所在，這是因為：

首先，衛生統計而來的流行病學，指稱出來長者、男性、慢性病患以及經濟弱勢者，無論是COVID-19的罹病風險抑或是致死機率，均為高危險人口的標地族群，但是，這也不能將上述的歸咎事由，直接嫁接在罹病致死的因果串聯，以至於忽略了從原因之「自變項」到結果之「依變項」而來的關係拉扯，比如說有無中介、前導、外加、內含、抑制或者曲解等等的其他檢定因素，而讓因果之間的鑲嵌，產生更多微妙的和合關係。冀此，在這裡的論述意旨乃是在於點明出來：如何因勢利導於諸如年齡、性別、生理狀況與收入情形等等兼具有徵別作用的重要指標，進而深究這當中所可能糾結的互動拉扯以及可行的策進作為。

遠的不說，作為徵別指稱的長者年齡變項，更為重要的考察意涵，就不單單只是訴諸於年齡在80歲以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的機率會比50多歲或40歲以下的患者高出甚多，而是先天不足的生理羸弱，再加上修補能力不佳的後天條件，這使得高齡確診者偏高的致死率，自然是一種預料之中的發展性後果（intended consequences），因此，首要的任務作為，自當是要確切落實從個人的罹病防制到家庭或機構的集體感染控制，從而讓預防性質的各項介入措施，得以達到有效防範的基本效用，只不過，此一他律性質的因應措施，對應於50多歲或40歲以下，是否因為年輕之故的掉以輕心，而讓年齡差異的罹病致死機率，產生更多難以彌補的社會成本，畢竟，同樣的確診個案及其一樣的致死遭遇，長者和年輕人，不同世代所要償付的人身代價，自然也是截然不同的。

承上，男女的性別因子、慢性疾病的生理條件及其收入水準的經濟狀況，也應該是要就其個體範疇的背景屬性，加乘至具有共通意涵的集體層次，藉此找出結構解套的整體性關照，如此一來，映照於新冠病毒確診及其有致死風險的男性族群，其高於女性近乎二倍機率的客觀事實，這更是有進行包括勞動風險、危險事件以及風險係數在內之綜融探究的必要，藉此讓性別、生理狀況與收入情形等徵別變項，不至於被過度放大成為單一因子，從而忽略了從高齡確診者、男性確診者、慢性病患確診者到經濟弱勢確診者所之於致死機率的積極性差別待遇作為；連帶地，揆諸於從白人到黑人以及從非裔及南亞裔等等西方多元文化，東方國度如台灣社會，又要如何針對從原住民到新住民、從北部到中南部、從都會到偏鄉等生存環境，以思索包括可及、可近、整合、便利和有效等等醫療照顧服務之資源配置不均的階層化議題。

以此觀之，新冠死亡之於老、男、病、窮的圖像勾勒，映照出來的還是長久以來的社會不平等課題，而這一點也是所謂的疫情台灣國家隊，在其秋天之際或下一波的『後COVID-19』所需要超前布署的變革作為之一。

【其它綜合篇】（2020.07.20）

43.從「貪嗔癡」與「戒定慧」以檢視「COVID-19」的因果論

關鍵字：COVID-19、貪嗔癡、戒定慧

來勢洶洶的COVID-19，業已造成全球1千3百萬名以上的確診罹病以及超過53萬人的致死個案，即使是酷暑夏季的到來而被認為可以有所解封，但是，第二輪或下一波的疫情戕害，多少也讓包括個人、國家抑或全球，陷入於束手無措的進退維谷困境，只不過，從有形的、生理的、醫護的到生態環境的整體布局建置，那麼，「COVID-19」所隱含的佛教因果論，似乎也可以提供作為另類反思的切入點。

誠然，姑且不去論斷COVID-19此一病毒株的究竟來源，但是，從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殆盡到人類自身的口腹之慾，多少是預伏了起心動念之際，所可能誘發的後續緣由和發展後果，因此，與其去追究造成肺炎疫情何以如此失控的第一因，倒不如從自律、他律和天律的綜融角度，以思索如何敬天畏地藉此達到天人究竟的衡平關係，就此而言，從佛教因果論而來的「貪嗔癡」與「戒定慧」，當可提供一個適切的觀點視野。

「貪嗔癡」這三種心病又稱三垢、三火，此三毒殘害身心，使人沈淪於生死輪迴，為諸惡之根源，因此，又稱做三不善根，對此，佛教認為，像是煩惱、爭鬥等等人類的種種苦難，主要是源自於本身的貪欲心、怒心和愚癡心，即是所謂的三毒，而這也是人類身、口、意之一切惡行的主要根源，誠然，貪欲乃是對於名聲、財物等喜好沒有獲得滿足的一種精神作用；怒則是對於不合己意的一種憎恨，從而使自己的身心無法獲致安寧的一種精神作用；最後的愚癡指涉的會是愚昧無知、不明事理的一種精神作用，顯然，「貪嗔癡」所肇始牽引的這三種精神作用，反映出來的是私性與物慾的不滿足、不適足或不知足，而這也說明了對於COVID-19的疫情災害，一般人所訴求的還是口罩、疫苗之類的外在作用，忽略了從內在心性出發，以思索包括物質、精神、生活、生存的生命意義，畢竟，對於喜好之過分我執的「貪」；對於討厭之過分偏執的「嗔」；以及不明實相而做出貪或嗔之反應的「癡」，又何嘗不是顯現於疫情期間封鎖列管的諸多失序行徑、解封之後的報復性消費以及疫情蠢蠢欲動的三倍券社會迷亂現象。

至於，對治於貪嗔痴的方法，便是所謂的「戒定慧」，這其中的「戒」，指涉的是無害於他人的一種生活標準或道德自律，以對治於過度的貪心；「定」，則是對於內心的專注和耐心的培養，以對治於過多的暴躁和缺乏耐心所引起的嗔恨；最後的「慧」，突顯是對於生命以及宇宙實相的如實了知，從而對治於貪嗔行為背後所糾結的愚痴無明，以此觀之，如何將穿戴口罩等自衛行為，轉化成為平常也就是如常的一種自律生活，至於，全民檢疫的封鎖列管相應於少了社交自危距離的躁進舉措，說明了從個人到整體社會，已然是處於某種集體浮動的不安心態，以至於讓報復性消費和報應性戕害，成為了不明事理的最後宿命；連帶地，尋常的凡人，倘若完備「戒定慧」的根器並不具足，是否可以採行「慧定戒」的翻轉作為，以找出可能的究竟之道。

冀此，從學習出發的靜心，從觀照己身而來的自律生活，指陳出來從「COVID-19」到乃至於「COVID-19症候群」首要的變革工程，會是如何找到一種創造性轉化的學習機制，藉此讓脆弱的心性得以安頓自在。

【其它綜合篇】（2020.07.20）

44.買口罩和領三倍券背後的『排隊政治』迷思

關鍵字：口罩、三倍券、排隊政治

從上周的周三（2020.07.15）開始，正式啟動三倍劵的購買、使用和兌換，也因為絕大多數的民眾偏好於紙本型態的直接消費，這使得從郵局到超商之於大排長龍的世紀景象，已經是從年初排隊買口罩的街頭奇觀，演進到這一次川流不息的領取紙本，只是，不變的還是關乎到『排隊政治』的迷思與弔詭。

誠然，基於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今年的年初第一次所採行實名制的排隊規定，即使是多所怨言，不過，社會大眾還是願意包容以對且相忍為己，畢竟，還是會擔心是否因為不按照規定導致失控買不到口罩，進而危及到您我的集體安危，因此，聽命於國家機器的任他擺佈，自然也是一項不得不的次佳選擇，然而，時空環境的改變，這一次三倍劵的振興對策，從現金到紙劵、從紙本到數位以及從消費行為到乘數效果，在在都還有商榷之處，這也使得一般民眾對於深層政府之於三倍劵的操作手法，是有所疑慮的，這是因為：開辦迄今就已經是醜態百出，更遑論於後續的刺激消費舉措，能否如願地達到振興百工百業的目標管理，諸此種種點明出來執政團隊是要有停損設置的應變措施，不能一意孤行於不知變通，換言之，從政黨之間的責任政治、公民社會的制衡政治以迄於防疫振興的生命政治，要如何讓『三倍劵之亂』得以找到衡平之道，這才是振興紓困手段運用的爭議或真義所在。

事實上，跳脫技術層面的評估與設計，上述排隊文化所實有的認知基模，指涉出來的無非是某種的順從文化，以至於忽略了即便是排隊買口罩或是排隊領紙券，同時，也是要顯現兼具公民德行的時代意義，就此而言，2020年被歸為「排隊年」的這一年，印照於過往街頭性質的糾眾行徑，那麼，該項被動、非自發以及無法自主的從眾行為，實則隱含的是如何得以引領出來更多良性變遷的自為反思，特別是要如何從諸多的排隊行為當中，以讓增生的公民力量得以有所進化，藉此讓過去偏向於政治意識型態且政黨對峙的民間力量，蛻變成為對於公共政策及其相關策進作為，所應該要有的理性監督機制，如此一來，排隊買口罩之於性命交關的乖乖戴口罩以及排隊領三倍券之於報復消費的可能確診染病，這兩者之間的合和分殊，理應要有進一步廓清之必要。

總之，一方面費心排隊擔心買不到口罩，所牽涉的乃是COVID-19染病之虞的風險機率，但是，另一方面寧願耗時排隊以等待紙本三倍券的兌換，則是某種想望但非是需要的人性投射，面對從此一隱含社會風險的排隊購買口罩行徑，到訴求於個別私性需求的領取紙券，背後所共通糾結之『排隊政治』的諸多迷思，自當有其解構和新構的必要，否則，從車塞、人塞到排隊塞以迄於從三倍券、三倍倦到三倍疲倦的『排隊政治』，這時候，需要的反而是能量飲料的直接暢飲，因為，它的提神作用是務實且有感的。

45.讀您千變也不厭券－－亂象的又何止於三倍券

關鍵字：COVID-19、振興、三倍劵

一場有如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般的COVID-19肺炎疫情，在掀起人類與自然間天人交戰之際，各個國家也總是想方設法以找出從生理病毒到心理病毒的可能解方，這也使得關乎到經濟病毒及其社會病毒的紓困振興對策，是有包括原版的三倍券以及像是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和農遊券等不同版本的綜融考察。

誠然，本於職責之所在，這使得從三倍券到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農遊券的構思、發給和執行效益，的確是存在著某種的必要性，但是，藝FUN券之於文化部、客庄旅遊券之於客委會、動滋券之於體育署以及農遊券之於農委會，就不應該只是淪為這四大部會相互之間的角力加碼，而是需要從單一部會到部會之間以迄於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局處，藉以思謀一個涵蓋戰略與戰術的整體解套措施，就此而言，固然是覬覦拿一千就可換到二千元的所謂『三倍』券，或是乾脆全部免費索取的兌換券，但是，從不同的部會屬性到各自的兌換功能及其最後的效益評估，相當程度上，所窺見到的還是停留在某種的競合關係，以至於忽略了發行紙券所必須要嚴肅檢視之迫切性、正當性、適法性、代價性及其衝影影響的通盤考量，換言之，政府部會丑表功的政治動作及其社會大眾貪圖便宜的從眾行徑，倆相以構足一幅各有盤算，但卻是會讓防疫與振興可能失算的荒謬景象。

遠地不說，上述四大部會彼此加碼的競價紙券，聚焦點不盡然是擺置在紙券的面額大小，而是從金額、數量、如何申請、公開抽籤時間、可以使用店家到申請資格等領取使用的該項遊戲規則設定，已經是將簡單問題予以繁瑣、複雜和困難化，以至於，耗損的將會是更多的交易成本，進而忽略了是否還可以有其它選項規劃的機會成本，無疑地，一意孤行於自我感覺良好的科層官僚心態，這使得從單純的紙券發行兌現，背後所顯露出來的乃是某種從公共政策失焦到整合服務失靈的治理危機，試想：倘若三倍券係以全民為其綜合使用的一般人口族群（general population），那麼，免費使用的藝FUN券、客庄旅遊券、動滋券與農遊券，又要如何就其特定人口族群（target population）、使用機率較高人口族群（high-risk population）以及確實使用到的人口族群（serviced population），藉此反思像是申請紙券的數位工具能力落差；以身分證號碼、年齡、次數或限定區域來作為分類與分流的使用限制；以及有限的份數及其抽籤落空的心理期待和相對剝奪感。

總之，在這裡的思辨真義所要被彰顯的乃是如何藉由這些不同名目的免費紙券，以思索參與藝文活動、浪漫客庄旅遊、觀賞運動賽事以及果園森林遊樂等的消費用意，並不在於單純是因為『好康獲得免費福利』的津貼補助心態，而是一種審慎評估疫情的自為風險管理，並且就其個人的能力所及以進行差異消費、組合消費、不定期消費抑或是擴大加碼消費的紓困身心和振興百業的多重意義，畢竟，包括三倍券在內所有紙本或數位的兌換券，均是以12月31日今年的年底為其使用的最後期限，但是，第二輪或下一波的COVID-19卻是蠢蠢欲動於更大的戕害，那麼，就只能享有一次的兌換消費及其後續的紓困振興措施，要如何是好？最後，其它的中央部會又有無帶動消費以刺激景氣的更好對策，抑或是對於『後COVID-19』的超前部署？

46.有樣學樣之大內宣的政府撒錢振興措施

關鍵字：三倍券、消費政治學、財政發展危機

報載相繼於澎湖縣發放現金五百元的領頭羊措施，彰化一縣的和美鎮、伸港鄉也不遑多讓的直接跟進，乃甚至於彰化縣的花壇鄉更是決定發給全鄉的鄉民每人1千元的現金消費禮金，藉此達到實惠有感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多重目的，無疑地，此一墊高金額的加碼舉措，自當是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誠然，從三倍券的構思、施行和效益，都尚未獲致明朗的廓清之際，包括中央部會抑或是地方政府卻反而想方設法以換位思考於民眾角度的使用立場，藉此達到『好快』（免除繁瑣的請領程序）、『好棒』（加碼多給的免費好康）以及『好方便』（不必設限的直接消費）的惠民措施，如此一來，從國家機器到一般百姓皆是如此雷同的從眾行為，而讓切割、殘補以及枝微末節的本末倒置現象，成為了當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集體認知基模，這才是此一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遠地不說，扣緊從三倍券到農遊券、藝Fun券、動滋券和客庄券的不同名目、從自付1千到加碼5百或1千的差額補貼抑或是從數位平台的資訊不對稱到直接給錢的現金入袋，相當程度上，都是直接跳過對於此一福利津貼手段之正當性、迫切性和後果性的根本討論，進而掉落於各種技術操作的工具性範疇。

如此一來，顯現出來的乃是從中央政府的不同部會到各個地方政府以迄於縣市鄉鎮市之間的大內宣舉措；連帶地，包括中央政府的國家財政危機以及地方政府的稅收財源狀況，也讓該項只限於一次的福利津貼模式，忽略了所應該要有的效益評估或世代會計問題，事實上，僅就直接發給1千禮金的彰化縣花壇縣為例，1千元的設算標準及其議會把關機制為何，係為了帶動在地百工百業的經濟發展，抑或是豐富的地方稅收而可以大開善意，至於，地方財政良窳不等的其它鄉鎮市基層單位，又該如何比照跟進或是停損有所保留？准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已經不再只是聚焦於相互競價的加碼遊戲，而是從該項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階層不平等情形，以反思三倍券之類的撒錢措施，是否也突顯了當前國家機器無力作為的施政困境所在，至於，從相同水準的三倍券到差額給付的加碼禮金以迄於抽籤入選與否的農遊券、藝Fun券、動滋券和客庄券等，諸如此類的絕對剝奪或相對落差所造成的社會觀感與醜態百出，自當是關乎到執政正當性的發展危機。

總之，有樣學樣的諸多政府撒錢振興措施，指陳出來當務之急反而不在於如何超前部署於下一階段『後COVID-19』的因應對策，而是將生理病毒的處遇計畫，窄化成為只剩下兌換券或領禮金一事上的『消費政治』，至於，帶動振興的消費作為映照於社交距離的人身安危，深層政府或一般民眾不設防且不把它當成一回事，如此一來，接踵於『消費政治』將會是被無限放大從管制、檢疫、解封、排隊、購買、消費到人身安全之全然約制的『生命政治』。

47.口罩的購買及其諸多迷亂行徑的社會心理認知叢集

關鍵字：口罩、實名制、口罩次文化

隨其第二波COVID-19的蠢蠢欲動，這使得關乎到口罩購買現象，再度成為了一項全民瘋狂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只是，糾結口罩的購買及其諸多迷亂行徑的社會心理認知叢集，會是該起議題現象的針砭探究之所在。

誠然，從今年（2020年）的一月份開始，COVID-19便以鋪天蓋地方式，吞噬了您、我如常的生活世界之際，「口罩」也成為有限理性的人類用以對抗生理病毒所僅存的唯一憑藉，剎那之間，需求創造供給而來的口罩供需失調情事，也造就了口罩經濟學、口罩政治學、口罩社會學及其口罩心理學等不同的考察切入重點；連帶地，從架上的直接購買到實名的排隊購買以迄於不同通路的限制採買，「口罩」不再只是一般般的尋常財貨，而是一種的殊價財貨（merit goods），從而表述的也是含蓋健康維護、社會資本及其生命政治的諸多意涵。冀此，即便隨其從春暖花開到盛夏之際，配戴口罩已非是一項強制性質的應為行徑，但是，穿戴口罩一事，似乎有從外顯的行為表徵，轉化並成為某種的認知態度，只不過，該種的心靈結構不單單只是侷限在公共衛生及其流行病學的狹隘生理範疇，而是蘊含更多口罩次文化的概念內涵。

遠地不說，除了特定的職種或工作屬性使然，口罩的佩戴業已成為一項不分性別、年齡、職業與情境的跨界行徑，但是，要如何從避免染病的利己止惡，以進展到健康維護的利他共好，那麼，對於配戴口罩的文明內涵，還是需要有創造性轉化的變革工程，畢竟，心思早已不再是如何精進己身，藉此避免有可能會戕害身心的不必要行為出現，而是鬆懈以對的心情和料敵之輕的態度，藉而輕忽了國家機器對於「口罩政治」的不當操弄，如此一來，任憑佩戴口罩的恣意行徑，成為了一成不變的制式作為，進而在尋常的生活秩序當中，找出變則通的生活樂趣，於是乎，從口罩的樣式、顏色、造型、規格、功能到售價，就成為一項集體意義的整體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這當中包括有從只是單純排隊的「群眾」到擁有集體目標的「團體」、從利己行徑到從眾行為以迄於諸多的社會心理學的認知發想，像是口罩製成的任何一個環節所可能會發生的運作失靈情況，像是材料、功能等，進而造成人身安危之於風險管理的「瑞士起司理論」（Swiss Cheese Theory）；害怕錯過無法擁有特殊造型口罩所產生焦慮不安症狀的「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簡稱為FOMO），固然，錯失恐懼症可能是根源於人類為了尋求生存資源或是逃避風險而採取的一項從眾行為，但是，隨其社會迷亂複雜度的不斷提升，識別資訊的真偽也變成越來越困難務，更是需要思考的乃是「欲求」與「需求」以及「想要」與「需要」之間的差別，藉此避免讓自己迷失在資訊爆炸的當代社會中。

連帶地，購買特定顏色口罩的行徑，就其有如本末倒置的荒謬行為背後，是否也隱含某種童年逆境的「深井效應」（The Deepest Well Effect）；作為擁有特殊造型口罩的一種犒賞（rewarding），此一被強化的吸引力，是否也會讓行為與成癮性兩者之間產生某種「成癮行為」（Addictive Behavior）的選擇性親近；何以購買這些殊異口罩，會成為一項具有強烈渴望並且急於想要完成的認知閉合（Cognitive Closure）傾向，進而形成所謂的「蔡格尼效應」（Zeigarnik Effect）；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來解釋COVID-19的可能影響，最終出現無可挽回之重大傷害的「黑天鵝效應」（Black Swan Effect）；訴諸於疫情之際的報復性消費行為，那麼，該項就在妳、我眼前的危機，我們卻還是寧願選擇視而不見之苟且方式的「灰犀牛」（The Gray Rhino）；一成不變的防疫生活，致使人們不會去注意到不符合倫理規範行為的緩慢變化，久而久之該項搶購造型口罩的重覆行為，導致倫理麻木和倫理困境的「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 Effect）；在意的是顏色、造型，而非是口罩的防護機能，這也代表著一種近似反諷的幽默，並可視為是對於日常生活中諸多不滿之認知排解的「莫非定律」（Murphy’s Law）；儘管每個人心中都不願意，但卻經常會做出違背個人意願之集體決定的「艾比林矛盾」（Abilene Paradox）；以及特殊造型口罩的搶購，是否也意指一個人的思維脈絡不夠寬廣，就有如身處隧道中，無法看到隧道盡頭的路徑，無法對當前的環境和處境做出正確的判斷，也未能意識到事物未來之發展趨勢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或不可思議之惡的「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總之，關於口罩的購買及其諸多迷亂行徑的社會心理認知叢集，解讀的面向、內涵極為複雜、深邃，但是，如何從供給衍生出來更多之需求或欲求的商品促銷手法當中，找出應該要有的自為反思，否則，包括口罩在內的任何社會迷亂或脫序行徑，當只會不斷地湧現在您、我的生活世界之中。

48.關於三倍券有42萬人沒領及其100億未用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COVID-19、三倍券、疫情政治

根據最新統計，在為數2356萬名的國人當中，已經有2314萬人領取三倍券，還有42萬人沒領，對此，行政院長呼籲要儘快領取並使用三倍券，以讓台灣的經濟更為成長。

誠然，在今年（2020年）的開春之際，COVID-19肺炎疫情虎視眈眈並且席捲眾人的如常生活，這也讓三倍券得以勝出，藉此達到一吞苦悶心情及其帶動消費的多重目的，如此一來，時值三倍券的領用即將結束，實則有必要讓該起政策性手段，回歸到理性思辨的公共論述，這是因為：首先，三倍券的發行意旨，斷然不在於只是覬覦3千元金額的一次性消費，換言之，期待藉由多次消費、差額消費、組合消費或是異地消費和不斷消費的運作型態，從而達到刺激景氣與帶動成長的乘數效果，姑且先不去論斷最後的政策目的是否已然達標，單就所衍生出來的各項衝擊影響，便有商榷之處，像是不去顧忌疫情可能擴散的公衛考量，卻是反其道而行的開放到處走動、大規模和不設防的社交群聚，這本來就預伏可能破口失控的風險危機；連帶地，即使是躲過疫情大規模爆發的失序危機，但是，僥倖與取巧背後的苟且認知心態，這才是令人擔心、掛慮所在，畢竟，料敵從寬與禦敵從嚴的論述真義，是不能委於滾動式修正便可以了得，因為被解封的不會是人身的自由，而是無辜性命的集體不安全。

其次，環視近一年下來國家機器的相關作為，亦有其議論之處，一方面被過度渲染的盡是「三倍券」的預期心理，連帶地，紙券面值被過度放大的「三倍券」，更是悖離了用1,000以元換來2,000元的基本數理法則，此一大內宣的醜表功行徑，也絕非是作為表率的執政團隊，應該要有的專業責信和誠信原則，畢竟，上行下效以引領良善的社會變遷，思謀之所在斷然不是如何能夠永續的萬年執政，而是從權力到權威、從口服到心服以迄於有所信任而來的託付關係，如此一來，散見於疫情以來的各項施政舉措，又豈止於像是『疫情政治』、『口罩政治』、『入境政治』、『紙券政治』、『消費政治』、『生命政治』以及『特別預算政治』的各種迷亂情形，而是如何嚴肅看待從「生理病毒」到「心理病毒」、「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政治病毒」、「文化病毒」、「工作流失病毒」、「就業損失病毒」、「家庭解組病毒」或是「發展性危機病毒」的連動性戕害，尤其是脆弱的『公民政治病毒』，如何得以回歸到公民社會及其民主政治的人本思維。

最後，高達98%的國人有志一同的領用三倍券，此一將債留子孫之於世代會計的財政發展危機，置之腦後與未來的認知心態，倒也是社會心理學範疇裡一項值得玩味的關懷旨趣，至於，不到2%的拒領族群，又是傳達那些變遷意涵，顯然，關乎到世代融合與國家認同的建置工程，台灣社會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好一個「哀莫大於心死」、「麻木不仁」抑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COVID-19疫情浮世繪寫照。

49.關於跨年晚會之於如期照辦、嘎然停辦與延後再辦的多重思考

關鍵字：跨年晚會、COVID-19、防疫政治

2020年的最後一天，卻也是叫大家心情最為忐忑不安的一年，即便是快要倒數的當下，對於跨年晚會是否要如期辦理一事，還是有它不同的發想思考。

誠然，嫁接於勞動社會的當代生活調性，這使得大夥糾眾於一起跨年和迎接晨曦的從眾行為，這已然成為一項您、我所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姑且先不去論及到晚會裡卡司依故、內容依然和橋段依舊，但是，該項從眾行為而來的集體性情緒渲染，仿佛也為苦燜的生活壓力找到暫時的出口，如此一來，如何有更為引入入勝且出奇制勝像是施放煙火等節目表演，便成為跨年晚會窮則變的因應對策，冀此，COVID-19肺炎疫情的吞噬反撲，也成為跨年晚會能否使命必達的重要變數，而COVID-19變種病毒株的侵入台灣，也造就停辦或改辦的天人交戰，即使遍地開發的跨年晚會、演唱會或煙火施放，大都改懸易轍轉為線上的直播形式，但是，背後所糾雜的政策思維和民心思惟，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思辨所在，這是因為：

首先，倘若煙火的施放，是有其相迎於元旦而來的通過性儀式，那麼，該項煙火施放活動的停辦，是否有延期再辦的必要性，這一點還是有待議論的，畢竟，在不對的時間點去完備對的事，實乃有其突兀之處；再則，各個縣市政府大張旗鼓且相互較競的跨年演唱，固然是兼具有匯集人氣和拉攏民心的多方作用，但是，一成不變的演唱會節目內容，到最後，只是淪為大卡歌星到處跑攤的搶錢戲碼，如此一來，各個地方政府基於『防疫政治』正確性的嘎然喊停，並且改採線上直播方式，這一點也有是商榷之處，畢竟，少了人山人海大批群眾的現場互動，這使得該項線上的直播娛樂、集氣勉勵的效果為何？准此，是否有必要縣市之間採行區域協調的整合方式，集中辦理所謂線上直播的跨年晚會，藉此讓演唱會的時間、卡司和內容、橋段，達到統整表演的多重效益。

最後，值得玩味的是，從年初開始的COVID-19肺炎疫情，到年底蠢蠢欲動的可能大爆發，對賭的就不應該見招拆招的消極對應，如此一來，對於跨年晚會的考察針砭，就不全然在於晚會本身的喊停或延辦，而是何以有非辦不可的可行性；連帶地，即使是跨年的演唱晚會，這已然是一項行之多年的集體記憶，但是，預算經費編列的同時，是否更要有滾動式修正的因應權變，以此觀之，從恣意率行的辦理跨年演唱會到臨時喊停的線上直播替代，某種討好、民粹的施政思維，這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癥結所在，更遑論於跨年演唱這早已經是一項集體意涵的整體政治事實。

總之，靜心淡定看待跨年晚會的辦理與否，畢竟，正值疫情的控制尚未告一段落之際，變種病毒株更是來勢洶洶，如此一來，何以各個縣市政府還是以非辦不可，致使忽略了集體狂歡、剎時煙火所之於生存發展、永保安康的貫通性意義，更遑論於作為重要轉折意義的「跨年」，相與對應的鑑往知來所之於一元復始的轉化作用；連帶地，就要過往雲煙的跨年煙火，又要如何超前部署於即將到來的走春、元宵抑或是四月份的春假大連假？

走筆至此，台北市政府還是宣布跨年晚會要照常舉辦，此一料敵既不是從嚴，也不是從寬，而是如何從精、從準、從廣、從深以看待COVID-19的後續發展，這才是公民社會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50.關於COVID-19之「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綜融性討論

關鍵字：COVID-19、人類行為、社會環境

打從去年2020.01.23大陸內地的武漢宣布封城開始，COVID-19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有如打地鼠般到處竄出，即便是一年過後，還是以風雨欲來的態勢，蠢蠢欲動於全球化布局的全面性戕害，對此，扣緊「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關懷意旨，相與關聯的綜融性討論，是有它值得深究之必要。

基本上，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關懷旨趣，指涉的是環視生理、心理、認知、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到其他的不同面向，藉此申述相與關聯的構造影響和相互牽動，以此觀之，回應於COVID-19的演變歷程，從大陸一地逐漸蔓延至全球各地的惡化情形，其所指涉出來的乃是該項的瘟疫，已然超出過去封閉社會所之於地域主義的傳統觀念，甚至於一舉擴充並且蛻變成為世界各地同樣遭遇且同屬遭殃的另類全球化樣態，如此一來，回應於生理範疇的觀察指標，一旦是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除了會有擺盪於流行性感冒與新冠肺炎之間的天人交戰外，也因為疫情的瞬間擴散及其疫苗的未能有效研發，而讓單純的生理病癥，被放大成為人際之間某種的社會標記或身分汙名。

連帶地，此一從生理以延展到心理的認知基模以迄於社會範疇的集體行為，一方面被要求的是形式上的社交距離，但是，該項人與人之間互動模式的實質改變，也讓人際關係與社會資本產生了從形式到內含的諸多變化，更遑論於包括職場、求學、就醫、娛樂等生活場域的結構性調整。准此，在這裡所隱含之於「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考察意涵，所直指的乃是因為唯恐疫情的傳播感染，而讓存在性孤獨的個體，轉換變成孤獨性存在的網中人物，如此一來，因應於從國境、場域到自我的封鎖或封閉，長久下來，對於涵蓋價值、態度、觀念及其外顯行為的全人發展，究竟會帶來那些深層的衝擊影響，這也是社會心理領域一項重要的關注課題。

再則，放大對於疫情演變歷程之集體、整體抑或是中介與巨視的結構性考察，那麼，該項「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意旨針砭，已然是超脫個人或個體的微視層次，而是直指包括『疫情政治』、『口罩政治』、『入境政治』、『紙券政治』、『消費政治』、『生命政治』以及『特別預算政治』等等的疫情政治經濟思辨（the politics of COVID-19）；連帶地，如何嚴肅看待從「生理病毒」到「心理病毒」、「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政治病毒」、「文化病毒」、「工作流失病毒」、「就業損失病毒」、「家庭解組病毒」或是「發展性危機病毒」的連動性影響，那麼，嫁接於包括一組層層環繞相連之繁複結構的「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當他人給予不戴口罩之偏差行為標籤時會產生並且修正自我形象的「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即使是有再縝密的預防控管機制都還是可能會產生運作失靈的「瑞士起司理論」（Swiss Cheese Theory）、對於疑似傳染病患者以隔離和檢疫措施來進行消極保護的「隔離檢疫」（Quarantine）、面對疫情視而不見並且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來解釋這些重大衝擊的「黑天鵝效應」（Black Swan Theory）、沒有被直接創傷而是藉由各種了解以同理類似受害者傷痛的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危機就在您我的眼前但卻還是寧願選擇視而不見方式之灰犀牛（The Gray Rhino）、人們經常不會去注意到不符合規範行為之緩慢變化的「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 Effect）、當人們感受到外部威脅時會採取自以為是的方式來加以回應的「認知閉合的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以及重要的不是現在怎樣而是將來會怎樣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等的一套新興風險管理機制設計，這也會是包含社工專業在內的一項災變照顧管理課題。

總之，從COVID-19到後COVID-19所掀起的生活樣態和世間百態，也讓包括基本需求的滿足以及事故風險的規避，產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如此一來，「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命題考察，自當是要有整全多層的重新建構，特別是糾結於人、制度、環境所顯現出來的疫情整體社會事實（COVID-19 of holistic social fact），更足以說明：發展性的多元社工取向，這會是值得深究的人群服務新領域。

51.關於台灣燈會32年以來首度停辦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台灣燈會、台北燈會、通過性儀式

因應新冠肺炎出現醫院的群聚感染及其唯恐引發大規模擴散，對此，行政院宣布要停辦今年（2021年）的台灣燈會，這也是32年以來的首次停辦，連帶而來因為停辦所損失的觀光產值，也有近百億之譜，這也使得對於首次停辦一事，背後所糾結的思辨論述，是有進一步的探究空間。

自1990年起於每年元宵節所舉行的台灣燈會，原本僅是由台北市單獨舉辦並且取名為「台北燈會」，不過，2001年起則是改由交通部觀光局和各主辦縣市政府共同輪流辦理，換言之，此一「台灣燈會」已然成為跨年迎春一項重要的通過性儀式，也就是說，燈會的舉辦所糾結的是諸如風土民情、觀光產值及其縣市彼此叫陣的多方共好結局，如此一來，唯恐防疫出現大破口，對於確定取消的該項台灣燈會，其所相與衍生出來的針砭考察，也就不單單只是聚焦於31年以來的首次嘎然停辦，而是如何將此一「台灣燈會」擺置在當代台灣的社會變遷脈絡底下，藉此去追索這當中『變』與『不變』的運作法則，這是因為：

首先，燈會的辦理固然是兼具傳統與現代的交互會通，但是，隨其文明的進化，除了出奇制勝以引人注目外，大型規模、龐大人潮及其巨大商機的燈節盛會，點明出來商品化的商業操作手法，已然是掩蓋了燈會背後所要傳達的民俗或民德意涵，更遑論於人與燈籠所之於互為主體性的相乘效果，以此觀之，擁擠的人潮及其可能的疫情破口，自然成為是否停辦的主要考量因素，至於，縣市地方政府所輪流舉辦的燈會佳節，又有無達到地域、經濟、宗教與人文的多重作用，這部分的效益評估或自為反思，反而不再是關注的重點所在，充其量只是用以回應輪流辦理的儀式主義或所謂的『燈會政治』；連帶地，如何從台灣燈會的停辦以進一步思索相關聯的議題現象，這其中包括有從特定燈會到全國旅遊；從台灣燈會到台北燈會；從實體燈會到線上燈會；從觀光之島到科技之島；從體驗行銷到網路包裝以及從產值效益到社會成本等深邃、複雜的『燈節政治經濟分析』（Taiwan Lantern Festival of Politics）。

誠然，倘若是為了避免因為人潮而招致不必要的COVID-19染病危機，那麼，該項的新風險控管機制，理應是要一體適用於所有的大型、群聚活動，如此一來，癥結所在就不全然僅止於台灣燈會或台北燈會本身的停辦，而是一套攸關到社交距離的人身危險控管，要如何從春節到燈會、從他律到自為抑或是從不須冒這個風險到殃及無辜他人的理性思考，如此一來，當可趁此燈會的停辦與否，進一步反思作為通過性儀式的年假或佳節，所關涉到究竟是休息還是休憩、是全家團圓抑或各自單飛的基本提問，畢竟，除卻人擠人以及車堵車所造成的假期症候群外，流失的年味和變調的燈會，直指出來的將會是停辦之後的再次恢復辦理，能否找出燈節應有的文化傳承，這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思索真義。

總之，倘若燈節的停辦，係為了保住脆弱的人命，那麼，羸弱的文化命脈，又要如何找到創造性的轉化契機？

52.關於人人自危且自保的封境行徑考察

關鍵字：COVID-19、封境政治、社會連帶

因應於國內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升溫，相繼於澎湖一縣，苗栗縣政府也宣布自即日起縣府及所屬的機關員工，若非屬必要的話，勿至桃園洽公、出差，可以預想的是，一旦疫災不斷擴大的話，對於人人自危的封境圍城行徑，是有其進一步考察、探究之必要。

基本上，澎湖縣政府該項打第一槍的自保作為，固然是有它超前部署的預防性介入考量，只是，該項作為比較是偏屬於概念範疇的公衛教育，還是有其徒法難以自行的結構性限制，畢竟，澎湖縣之於桃園市固然是有來外島與本島的地理環境阻隔，但是，前往本島的其他縣市洽公，依舊還是存在著可能疫病感染的人身風險，更遑論於苗栗縣之於桃園市的全台生活共同圈及其無所不在的各種感染源管道，以此觀之，從澎湖縣到苗栗縣的相繼表態，自然不應該只是淪為某種本位地域主義的發想或發酵，否則，圖謀於無確診個案的同時，其所招致產生的衝擊影響，將會是各個地方縣市政府所無法自力以對的棘手難題，更何況這當中所糾結的相關迷思或迷亂之處，還是有待進一步商榷與廓清的，像是從親洽到電詢的變通措施；從縣府機關員工到一般社會大眾的比照要求抑或是從政府洽公到民間旅遊的一體適用等等的技術性操作，就此而言，這兩個縣市政府的公告作為，形式上的宣示意義，顯然是遠大於實質性質的防制效益。

事實上，面對澎湖縣與苗栗縣政府的相繼打槍，無論是當事者如桃園市抑或是利害關係人如中央政府，更是要勇於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可能疫情災損，就此而言，化被動為主動的積極應對，屬於必要，否則，淪陷的就不只是桃園市政府這幾棟的建築體，而是桃園全市幅員廣大的生活機能；連帶地，從單一縣市的「桃園市」到區域之間的「北部」以迄於所有縣市政府都相繼中標的「全台離島」，這也會是一項指日可待的疫情事實危機。准此，在這裡的針砭之處，無非是如何讓中央政府之於地方政府、單一縣市之於區域縣市、國家機器之於一般民眾在面對疫情演變一事上，倒不如就其疫調足跡以進行資訊正確、充分、及時、透明、完整及其對稱的機制設計；再則，針對疫情風險區域的感控建置，更是要有包括從高度風險之『紅燈區』、中度風險之『黃燈區』以及低度風險之『綠燈區』的不同因應措施，畢竟，一年下來的防疫措施，無論是民眾個體疫或是機關行號，多少還是存在著邊際效用防範遞減的身心疲憊，如此一來，現有的防疫措施，更是要有從戰術到戰略以迄於從黑天鵝（防疫前段班）到灰犀牛（變種病毒株）的不同策略性規劃。

總之，一葉知秋以窺探上述這兩個縣政府的自保行徑措施，透發出來的結構性意涵，斷然不僅止於從染病、確診到疫區與否的兩廂對照，而是所謂反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業已轉化成為國境之內的某種地域主義，此一『封境政治』的命題思索，會是該起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特別是疫情致命所拉扯衝擊到人人自危與自保的社會連帶關係（social solidarity），又要如何得以重新拾回那種相濡以沫的生命共同體情愫。

53.關於『同島一命共悲』的迷思、弔詭……

關鍵字：COVID-19、隔離、搶購

部立桃園醫院的院內群聚和社區感染事件，已經是讓全台拉起人人自危的疫情警報，相形之下，近日開幕的日本唐吉訶德店面卻是出現人擠人的擁擠景象，這也引發了是否有觸犯社交距離的憂慮，對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明白指出「有些非常擁擠的店面應做人潮分流」，畢竟，擁擠的畫面對於正在隔離或治療病患的醫護來說，「看起來真的是會有點心酸」，而這也使得關於同島是否一命共悲的關懷旨意，背後所糾結的迷思與弔詭，頗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誠然，醫院與店鋪的兩廂對比，映照出來的是「風險」（risk）與「需求」（need）的殊異情懷，弔詭的是，醫院端裡的治療抑或是隔離，表述出來的乃是某種與死神交戰的人命拉扯，這也使得攸關到疾患或死亡等事故風險，要如何得以有效規避或停損設置，這就不僅止於病患自身的個人命運，而是有其避免擴大傳染的集體健康安全意涵，至於，人山人海的店鋪搶購行徑，雖則是用以滿足食、衣、育與樂等等個體福祉的需求滿足，但是，就其需求的優先、必要和迫切性來說，還是無法與性命交關的風險控管相提並論，特別是無法做到人潮妥善分流與社交一定距離的有效管制的話，那麼，單純用以滿足一己私欲的偏頗行為，其所衍生出來的公衛危機，盡付的將會是全民買單的社會性成本。准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指涉出來的是從就醫到採購、從風險到需求以迄於從個人自由到集體安全的層次性轉化，也就是說，倘若未能體認或領悟到所謂『同島一命共悲』抑或是欠缺層次性轉化的認知基模，那麼，對於防疫的作戰，當只是個別、殘餘、消耗與道德的消極作用，這不僅無助於防疫工程的安全守護，乃甚至於隨時都有可能找到擴大疫情散播的其他破口。

事實上，此一『同島一命共悲』的關懷意旨，是有必要進一步地內化以轉換成為集體性的社會認知基模，畢竟，一命或共悲的人身遭遇，豈止於醫療、商場、疫區或遊樂空間的物理環境，而是如何比例原則於所有住民身上的人文思維，遠地不說，自覺身子的有些微恙，如何自為管理以避免己身的二次感染抑或是參加之後的殃及無辜；連帶地，非關乎到重大事項的需求滿足（比如聚會）和風險規避（像是就診），更是要有自為的防制之道，如此一來，重點就不在於群聚活動的是否參加，而是有來自於生理條件、健康狀況、緊急重大、危險事故、風險係數及其預期或非預期發展後果（intended &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綜合考量，像是上述的排隊採購、大型晚會或是密集、密閉與密切的貼身社交活動等；最後，除了當事者本人的自律作為外，與疫情感染或擴散相關的利害人等（stakeholders），又要如何有其從中介到他律所相與鑲嵌的守護體系，就此而言，當官方性質的大型聚會或民俗活動紛紛喊停之際，商業屬性的銷售行徑或演唱晚會，是否也要有衡平關係的防制機制，這一點的社會責任是值得嚴肅看待的。

總之，從醫院隔離的孤獨自處到賣場搶購的擁擠人潮，癥結點就不僅止於不同物理環境底下的個別境遇，而是處於新風險的疫情世代，任何人都不再是單獨的存有，而是稍有不慎的任何風吹草動，其所誘發出來的會是性命對賭的自命自悲，甚或是要有恐會擴及到全台同命與同悲的心理準備。

54.關於部桃事件之於『個案－制度－環境』的考察意涵……

關鍵字：部桃事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政治

因應於衛生福利部的部立桃園醫院（部桃）群聚感染再添兩名的確診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將部桃全院宣布為紅區，並且一舉擴大居家隔離的施行對象，初估會有近五千人要接受強制隔離，這也使得從隱匿、疫調、隔離到另類封院的部桃事件，是有其多重論述深究之必要。

基本上，有近五千人必須要進行居家隔離，這實乃是一年多下來，台灣抗疫工程演變歷程的重要轉折點，也就是說，一方面是不能再有身為防疫前段班的自得意滿，而是告誡台灣社會，現行的防疫作戰，是要有解構、重構與新構的必要，遠地不說，僅就部桃醫院感染失控的醞釀、發微到爆發，這也絕非是短期之內便可一次到位的突發事件，而是糾結著過往和平醫院的塵封經驗，以至於讓該項驅離、淨空的另類封院舉措，欠缺包括「有進－有出」、「只進－不出」、「不進－只出」以及「不進－不出」的不同選項策略及其配套措施，誠然，倘若第一時間採行封鎖院內的可能感染消息，對賭的乃是能否全然脫身的順利過關以及免於被標籤化的身分烙印，但是，如今加倍奉還的加惡情態，又有無回到『個案－制度－環境』的基本提問。

這其中包括︰究竟部桃醫院感控機制設計的那一個環節是失靈？何以在失序情況尚未能被相對掌控底下，率然做出院內全員驅離以各自回到住家或是移轉其他醫院決定，背後的決策思維及其機制設計，有無回到疫情管理之於制度設計是否良善和內部監督的必要性思考？連帶地，肺炎疫情的諸多變種病毒株，所招致的衝擊影響，也不應該過於停留在以往的因應措施，而是更要有禦敵從新、從嚴和從重的對治策略，如此一來，以衛福部長位階銜命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的重責大任，實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也就是說，將疫情指揮官提升到行政院之院長、副院長或祕書長的三長層級，藉此達到行政協調和業務統合的因應功能，畢竟，從國防部祭出要求官兵不要前往桃園市到若干地方縣市政府也訓令所屬的機關員工不得到桃園洽公等等脫序言行，這何嘗不是指陳出來關乎到抗疫工程，早已超脫單純生理範疇的減損防治。

准此，對於這一次從院內感染到社區擴散的議論針砭，即便是有其事後諸葛的後見之明，但是，鐵錚錚的殘酷事實便是包括同溫層、團體盲思及其疫情政治的錯誤決策，償付的盡是全民買單的社會性成本，職是之故，相迎於即將到來的農曆年節，國家機器又要如何得以讓民心有所安頓自在於資訊正確、完整、及時、充分、透明和對稱的前提底下，如此一來，方能共體時艱於更大的疫情風暴危機；連帶地，回應於可能更為嚴峻的疫情發展和嚴苛的人身限制，那麼，相關的要求規定，背後所涉及到的則是從『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關懷意旨出發之捍衛最為基本且最重要的「保護生命原則」、尊重其自由自主的抉擇但不可以傷害或奪取自己或他人生命的「自主自由原則」、保障當事者相關資訊的「隱私保密原則」以及傷害最小和有其最適當生活型態的「最小傷害原則」，只不過，此一部桃事件所涉及到的也是更大公共利害關係的新風險事端，如此一來，進行相關決策的專業倫理順序或抉擇兩難，自然也是要有典範移轉的另類發想。

55.從「防疫保單」的搶購到「防疫素養」的建構

關鍵字：防疫保單、道德危險、防疫素養

因應於衛生福利部的部立桃園醫院從院內感染到社區擴散的加惡性發展態勢，這使得由民間業者所推出的防疫保單，剎那之間，成為了搶手的熱門、熱賣商品，大排長龍的購買人潮，也讓該起的部桃事件，增添幾許延伸性的人文思考意涵。

基本上，該項防疫保單的評估、規劃、設計和銷售，實乃是一種在商言商的對價行為，只不過，因為部桃事件所引發出來的全台搶購熱潮，這應該也是當初業界或其他業者所始料未及的，畢竟，部桃事件所誘發出來的人身安危，小自部桃醫院的特定區塊以迄於大到包括桃園一市的北部區域，實乃有其生活共融或共同圈的必要性考量，因此，防疫保單的購買，也讓自保以對的疫區民眾，多了一層的保障，然而，南北串聯和東西竄走所之於該項防疫保單的搶購情形，多少說明了此一超前部署的集體從眾行為，也讓唯恐感染擴散所招致的生活不便和生命安危，已然成為某種危險意識的社會認知基模。

准此，在這裡的考察論述，就不全然只是聚焦於銀貨兩訖的對價行為，而是該項匪夷所思的個別性舉措，要如何因應於所謂集體意涵的危機意識，藉此因勢利導並且轉化成為面對危機事故的應變知能，以此觀之，無論是從搶購本身的外顯行為到內隱的認知態度抑或是扣緊態度、技巧及其專業知能而來的「防疫素養」，在在點明：民間業者對於防疫或抗疫一事及其所隱含市場商機的洞悉能力或破口生機，國家機器或政府機關在這方面的覺察知能，顯然，還是有待提升、增進。

冀此，即使是範定在商業保險的運作範疇，該項保單的評估與設計以迄於最後的上市銷售，指涉出來的是包括主觀的心理投射、客觀的公衛盛行率、短期的事件加惡演變、中長期自維的應變對策等的設算參數；連帶地，防疫保單的規劃如供給端的這一造，更是需要回應於買方大眾的這一方，其所糾結風險認知和危險分擔基模的對應性思考，如此一來，顯現於這一波防疫保單的搶購熱潮，就不盡然只是關注在於諸如從單純隔離到染病確診的不同保險產品設計；或是從「彩券樂透般」以小博大的隔離給付到「吃角子老虎般」的確診治療給付，而是訴求於『一張保費500元，不用確診，只要收到疾管署隔離通知書就可以理賠10萬元』的防疫保單，簡單、扼要、便宜和高理賠金額等文字說貼，致使誘因條件及其脆弱的人性結構，已然是引導出個體理性的次佳選擇，而無直接關涉到道德行徑或理性決策的成效評估。

總之，就其疫情恐有爆發之虞的存亡之秋，恐慌如一般的社會大眾，嫁接於500元保單並以樂透般的單純居家隔離來換取10萬元的保險理賠，乍看之下，頗為划算、有效，但是，大排長龍的搶購行為，對應於社交距離應有的人身安危保護，那麼，「防疫素養」的知能涵養及其公民德行，這才是從在商言商以進化到生命共同體的關鍵所在。

　好一個從「防疫保單」的搶購到「防疫素養」建構之落差或貫通的社會變革工程。

56.關於部桃湧進大批物資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部桃、實物、禮物關係

近日以來，每天還是有多起確診案例的部桃事件，引發了民眾捐輸解厄的紓困舉措，這其中從熱食、冷飲到口罩等不一而足，除了是發揮資源運作的及時雨效果外，相與對應的議題思考，是有它嚴肅看待之必要。

基本上，每逢天災或人禍所招致基本需求（need）無法獲得確切的滿足，民間團體與社會大眾總是基於人飢己飢的文化主義和一呼百應的從眾效應，藉此成就這一段的捐贈授與因緣，只不過，該項的『禮物關係』（gift relationship）除了是作為某種通過性儀式的消極作用外，相對應的變遷意涵，會是類似議題現象的針砭、思辨所在，以此觀之，對於大量湧入的部桃物資，就不應該只是停留在個體層次的善行義舉，而是要有對於社會大眾之於觀念充權的機會教育，畢竟，未經由需求評估的前置機制，隱含的是大量、重覆、浪費以及處理的善後事宜，這對於已經是處於人力吃緊的部桃團隊來說，有如雪上加霜般成為額外的加重負擔，更遑論於單一的部桃醫院及其背後所牽動的是包括地方、中央在內的支援網絡和輸送體系，這早已是被建置完備的一套常規運作機制。准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也直指出來部桃院方須善用公共關係的相關管道，針對充分或不足資源的相關資訊，以提出完整、可行和安全的挹注計畫，而非只是祭之於最為直接且人身接觸危險的贈與方式，藉此達到某種的感動行銷效益。

誠然，出錢出力早已成為國人慣常的行善認知基模，如此一來，官能刺激的感動行銷和衝動助人，多少還是無助於問題的結構性解套，反而是增生出來包括金流善款、物流食材抑或是輸送端的供需失調，職是之故，相關的命題旨趣便是有拉高思惟層次的必要，這其中包括：即使是各項物資有其短期紓困的必要，但是，資源之需求、匯集和輸送的機制設計，依舊還是抵擋不過某種的競善心理，以此觀之，個別化行善之於制度性善行而來的乃是包括人流、金流、物流等等實物服務（in-goods services），便有大眾資源之於開發、整合和有效運用的基本提問；連帶地，上述以部桃為其標地主體的濟助行為，要如何從零散到常規的實物布建；從部桃醫治到居家隔離的物資援助；從完全免費到部分負擔的比例原則；從食物、物資到捐血的資源統整；從互惠的對稱性到陌生他者的非對稱性關係；從企業、店家到民眾、個人的行善多元主義；從停損設置到超前部署的分階分段處遇；由從眾到自為的類別範疇；以迄於從枝微殘補到制度再分配的相關思索，否則，事情告一段落的激情過後，像是議題重現、問題依舊和手法不變的『行善社會』，又要如何提升應有的文明化內涵。

總之，公共資源的捐輸，不外乎是資源如何達到應有的分配效益，就此而言，人飢己飢之『對的事』，如何嫁接在『對的人』、『對的手段方法』以及『對的施行時機』，方能產生『對的結局』，這未嘗不是一項有待突破的社會變革課題。

57.從「防火牆」、「保護傘」到「金鐘罩」的抗疫思考

關鍵字：防火牆、保護傘、金鐘罩

針對部立桃園醫院所發生的院內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居家隔離的人數業已增加至3,262人，但是，也因為並非是部桃的所有人員都皆列入所謂的隔離名單，因此，防火牆的建置是否完備抑或是縫隙仍舊存在，如此一來，關於從「防火牆」、「保護傘」到「金鐘罩」的抗疫思考，是有它嚴肅以對的必要。

基本上，因應於部桃疫情幾乎是天天都有新增的本土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也一改過去對於部桃防疫只是出現小隙縫的說法，畢竟，擺置在眼前的是包括醫護、病人和相關家屬，目前已累計15名的確診案例，至於，在隔離與規模部分，雖然會有悲觀的高推估、保留的中推估以及樂觀的低推估之不同的列管人數，但是，相較於去年（2020年）一整年下來台灣的秀異表現，這一波的疫情已然是擴及到社會、經濟、生活各個層面，換言之，這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專業問題，而是一項攸關到國家安全的發展性危機問題，如此一來，扣緊從防疫到減災的演變歷程，這當中所糾結『個體—制度—環境』的結構性意涵論述，是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這是因為：

首先是關於從「防火牆」到「保護傘」抑或是「金鐘罩」的命題意旨：這方面指陳出來的乃是包括真正實際受到列管、高風險人口、標地人口及其一般人口等等不同對象族群的控管機制設計，對此，所謂真正實際受到列管的人口族群（serviced population），指的是像是確診患者、住院一般病患到一線的醫護人員；至於，高風險人口族群（high-risk population）則是意指確診患者的家人或接觸者、病患的陪病或探病、醫院第二線清潔與行政同仁抑或是包括必須和醫院打交道的藥廠業代、物流人員等；連帶地，從特定的院內感染一舉有轉換為社區擴散之虞，那麼，疫調足跡的可能接觸者，便成為標地人口族群（target population），也就是說，從受到列管和高風險人口的「防火牆」，一舉延展到標地人口的「保護傘」以迄於所有民眾之於一般人口族群（general population）的「金鐘罩」，如此一來，除卻要有層層堆疊的防衛機制外，關乎到防火牆的『隙縫』、保護傘的『破口』以迄於金鐘罩的『穿孔』，這將會是「防疫管理」需要超前部署的應變課題。

其次是關於從「同溫層」到「團體盲思」抑或是「認知閉合」的命題意旨：這部分是可以從這一年以來的各項防疫措施，看出若干的端倪，像是『疫情政治』、『口罩政治』、『入境政治』、『紙券政治』、『消費政治』、『生命政治』、『特別預算政治』抑或是這一波的『封院政治』，固然是隱含某種的疫情政治經濟考量（the politics of COVID-19），但是，歸根究柢，還是欠缺一套動態、過程、持續、修正的抗疫機制建置，以至於對賭的經常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催眠式作為，更遑論疫情資訊本身所關涉之正確、完整、及時、充分與對稱的基本提問，就此而言，在這裡的考察針砭斷然不在於工具範籌的技術性操作，而是要如何找出同舟共濟以抗疫的全民集氣，如此一來，小自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揮體系，要不是層級不夠高，便是有太多「同溫層」和「團體盲思」的人治思維，更不用說，值此另類國難的當下，朝野兩黨卻是藉由台北和平醫院的封院歷史糾葛，以找到各自的戰略制高點，而無視於不佳的社會觀感，或許，在這裡需要的乃是針對政黨政治之於科層體制的組織動力，以找出從中央到地方、從執政黨到在野黨、從國家機器到一般大眾以迄於區塊族群之間的換位思考，特別是如何去除自以為是的「認知閉合的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

總之，COVID-19疫情已經是邁入更新和更為棘手的發展階段，倘若不變的還是目光如豆的僥倖思維，那麼，在無法避災、防災的預防前提底下，減災、止災或抗災的災變和災損，又豈止於該項的「生理病毒」，而是據以衍生出來諸如「心理病毒」、「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政治病毒」、「文化病毒」、「工作流失病毒」、「就業損失病毒」、「家庭解組病毒」以及「發展性危機病毒」的連動性影響。

58.關於「武漢肺炎」之於『稱謂政治』的針砭性思考

關鍵字：武漢肺炎、COVID-19、稱謂政治

兩則互為關聯的新聞報導，背後所糾結的針砭思考，卻是嚴肅且值得加以正視。

話說：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簽署一份的備忘錄，指示聯邦機構須加強打擊日益抬頭的仇外心態，特別是禁止將新冠病毒與特定地理位置，這兩者做不必要的連結，像是對於病毒特意冠以「中國」與「武漢」等地標，藉以避免『武漢病毒』、『中國瘟疫』或是『功夫流感』等種族歧視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反撲，對於該項新冠病毒的正名工程，國內行政院在其跨部會的新聞稿裡，也開始避用引發爭議的這些稱謂，只不過，身為閣揆的行政院長卻還是堅持使用『武漢肺炎』，此一不超脫『稱謂政治』的鬥氣，究竟可以引領出來那些進步的文明化意義，這一點是頗值得台灣一地的公民社會加以深切反思的。

事實上，早於去年（2020年）COVID-19新冠狀肺炎蠢蠢欲動之際，世衛組織便已經揭示不得使用特定的地理區域，以稱呼某一被標記的病菌毒株，藉此避免標籤、烙印化，誠然，該項去汙名化的正名舉措，實則無關涉到政治立場的敵我意識，而是一種對於一般人抑或是區域住民應該要有的基本尊重，換言之，倘若這是一種國際公民必備的基本素養，那麼，該項的公民知能就不應該因人而異抑或因為身分的不同而有所選擇，特別是那些權高位重的主政者，又該如何避免將個人的我執偏見，有意、特意、執意、故意、恣意和公開且粗暴的無限上綱於某種的歧視行為？冀此，該項從外顯行為所延展出來的認知態度，就其身分角色而來的另類責任政治，便有商榷、議論之處，畢竟，連基本尊重的分寸拿捏都已失格，那麼，一旦兩軍對峙之際，又要如何可以多些的清明，藉以決戰於千里之外？

誠然，無論是地緣關係政治或是國際市場分工，區域之間的合縱連橫自然也包括海峽兩岸的各自治權，如此一來，理當是要避免自曝其短於可能的偏見或歧視，特別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或疫災尚未被有效控制之際，確診與致死的人數不斷的攀升，那麼，如何進行區域之間諸如疫情、疫調、疫苗或是防疫、減疫與抗疫的策略性合作，這一點自然是要有『意識型態擺兩邊、民眾安危放中間』的定調主軸，如此一來，該項『稱謂政治』背後所被突顯自以為是的認知閉鎖需求，恐有被進一步導入『病毒政治』、『入境政治』以及『生命政治』等等更大的人身風暴，甚或是難以收拾的境遇下場。准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是有必要將兩岸關係擺回到中長期的歷史脈絡哩，藉以思索這其中『變』與『不變』的發展法則，以此觀之，如何在現實的國際局勢裡找出生存之道，這一點更是要有爭氣但不鬥氣的應變能力；連帶地，要如何在同中存異的區域政治裡，塑立華人社會的治理典範，台灣一地在這方面的公民政治素養，是可以被期待或自許的。

總之，施政之道，無它，僅在於以民為重、為要和要先的念茲在茲，如此一來，姑且不去論及此一「武漢肺炎蘇揆堅稱」的弦外之音，但是，從疫情演變的輕重緩急來看，在這個節骨眼的用字遣詞，更顯現上位者之於才能與德性的重要性。

對於已經是擺在眼前的『部桃事件』，又該如何自處？

天佑台灣。

59.關於延後開學及其啟動防疫照顧假的延伸性思考

關鍵字：COVID-19、延後開學、防疫照顧假

報載考量到國際疫情的持續嚴峻發展，再加上為了確保開學前校園環境的衛生安全、完備清潔消毒的防疫作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到2月22日才開學上課，至於，在其延後開學期間（2月18日至2月21日），家長的其中一人如有照顧12歲以下學童以及國中、高中、五專1到3 年級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子女，將可申請不扣全勤獎金的所謂「防疫照顧假」，這也使得關於延後開學及其啟動防疫照顧假一事，是有其延伸性思考的必要。

誠然，倘若報導實屬的話，亦即，係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加以定調，那麼，攸關到延後開學上課等事宜，理應是要回歸到本於職責之所在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此一彷如越俎代庖的行徑作為，是否是要一舉墊高指揮中心的權力，這一點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多天前所出現的「部桃事件」及其國防部所逕自發布的避桃令舉措，這何嘗不是突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層級、分工、統整與運作，還是有待廓清，遠地不說，即使是相關的宣示，有必要回歸到由上而下的一體適用，但是，是否可以由指揮官偕同包括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教育部、勞動部等，藉由聯合記者會的公開形式，從而達到資訊正確、一致、完整、充分、透明、公開和對稱等基本提問，畢竟，從延後開學的教育部到啟動防疫照顧假的勞動部抑或是衍生出來的相關事宜，這一點斷然不應該是淪為擠牙膏式、打地鼠般的東西各一塊和南北兜不攏，這除了擾民之嫌外，如何換位思考於民眾自身觀點和切身利害關係，顯然，這方面的行政作為，政府單位還是欠缺應有的同理心。

至於，該項的延後開學舉措，背後決策思維的考量判準為何？特別是回應於：究竟延後開學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讓問題解決到什麼程度？以及又會衍生出來什麼樣的衝擊影響？就此而言，從原定的2月18日延後到2月22日才正式開學，四天期間的防疫效果為何？而多了四天的假期，會增生了那些社交接觸的群聚感染風險？特別是這其中所涉及到的上班日，除了自行排休或乾脆請假之外，這些應到班但人不在的職場勞動，又豈止於從家長角色出發，就可以全然概括承受的。准此，先不去論及延後開學上課本身的迫切性、必要性和正當性，單就用以捍衛兒童最佳利益的命題發想，何以被彰顯的經常都是親屬照顧責任，而非是國家機器有其最終父母的角色責任發揮，如此一來，是否非得延後開學，攸關到公共旨趣的這一件事，其所窺見到依舊是國家機器之於行政霸權的恣意作為。

總之，延後開學及其配搭的防疫照顧假，不在於疫情嚴峻發展以及完備防疫消毒，因為，倘若是疫情係屬於一發不可收拾情境，那麼，要延後開學的又豈止於單純的四天而已，這一點是需要有因地制宜的個別性考量，至於，環境清潔消毒的防疫作業，更是一項念茲在茲的動態性作為；連帶地，覬覦不扣全勤獎金的示好措施，這一點似乎是忽略了利弊相關的權衡得失，這是因為：一片哀嚎的家長心聲，應該是會多於不扣全勤獎金的少許收入。

懸崖勒馬，這也是一門危機管理的執政治理課題。

60.「注射疫苗，我ok，總統您先請!」

關鍵字：COVID-19、總統、疫苗接種

千呼萬喚的新冠肺炎疫苗，最快會在二月底前抵台，這也使得總統是否要帶頭注射，引發了各界的關注，如此一來，相與衍生的議題論述，是有進一步發想、思辨之處。

基本上，對於總統是否要身先士卒注射疫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由於總統負責國家的重責大任，因此，對於是否要率先接種，這部分會由醫療小組判斷，如此一來，從剛開始能否買得到疫苗到總統是否要優先注射接種，便要有整體衝擊影響的多方評估，畢竟，先不去論及到好不容易盼來的新冠肺炎疫苗，單就美歐先進國家的注射經驗（自產、量足、疫苗保護力），主事者如美國等國家元首，早於第一時間哩，便公開接種注射，藉此達到從眾的尤效作用，這是因為，倘若接種的風氣不盛行或不普及，勢必是難以達到一定涵蓋率的保護效力，如此一來，將無法做到集體性保護的防範效果。

相形之下，台灣疫苗的接種環境卻還有存在著諸如進口、量不足及其控制妥當的社交保護力等限制與優勢的發展條件，如此一來，祭出一國之尊的優先注射一事，自當是要有不同的思考，畢竟，如果購置疫苗的數量有限，那麼，又何止是總統一人，而是閣揆以降的所有文武百官，都應該暫緩施打，藉此保有倖存的性命以繼續保家衛國，只不過，親力親為的這些高級文官，又要如何規避日理萬機以體察民膜和苦民所苦的社交感染風險。

冀此，在這裡的論述真義，就已經不在於位階尊榮的高低，而是攸關到疫苗的劑量、品牌、冷鏈保存抑或是保護效力等等所謂的『疫苗正確』，在在都有回歸到醫護範疇之於工具理性的基本提問；連帶地，價錢、到貨時機點抑或接種對象的優先順序，這已然不是議題的聚焦所在，更不是要去論及到總統與行政院長是否帶頭施打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說，先就疫苗本身的安全性以進行專業評估，如此一來，上位者是否身要身先士卒以進行疫苗接種，這已經是一件再明白不過的事，換言之，扣緊人身接觸的感染風險出發，以規範那些人口族群應該是要優先注射，而此一因應於疫苗安全所牽動到優先接種的政策定調，理當是要優位於總統之尊的道德性指稱。

准此，基於眾生平等和禍福與共的社會連帶情感，那麼，無關涉到社會地位而來的『注射政治』，而是要就其風險程度、保護效力與疫苗劑量等客觀指標，以思考從一般人口族群、高風險人口族群、標地人口族群到強制施打人口族群的優先順序判準，至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個人所言之＂*如果大家都想打、疫苗不夠打，他絕對不跟大家搶，但若接種意願不高、疫苗有剩，他一定率先代表打*。＂、＂*若疫苗有剩，自己一定率先接種，每一種都想打打看。*＂之類的取巧話術，這除了是不足為道外，更是讓單純的疫苗注射，多少些不安的人性想像。

總之，從疫苗的採購到接種，窺見到的是處處充滿盤算的機鋒，如此一來，重點的反而不是接踵而來的搶打疫苗，而是社會大眾且戰且走的多方觀望，如此一來，從疫苗的有或無到要打或不打，抑或是形成某種「注射疫苗，我ok，總統您先請!」的社會氛圍，這也會讓執政當局陷入父子騎驢般，進而少了福國利民的應有定見。